

领导艺术全书
外国杰出政治家的领导艺术
世界顶尖级政治家的政坛纵横策
何晓燕

吉林摄影出版社
阳景苑康园西原康园康园·圆

领导艺术全书

外国杰出政治家的领导艺术
世界顶尖级政治家的政坛纵横策

何晓燕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摇摇录

第二部分摇摇中外历代的领导艺术

第四篇

外国杰出政治家的领导艺术

- 第一章摇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领导艺术 (员)
- 一、力挽狂澜摇转危为安 (圆)
- 二、大刀阔斧摇实施新政 (缘)
- 三、蛟龙潜水摇待机而动 (怨)
- 四、炉边谈话摇暗授天机 (员园)
- 五、抓住重点摇各个击破 (员怨)
- 第二章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领导艺术 (圆缘)
- 一、巧建班子摇紧握权柄 (圆园)
- 二、以强制弱摇利用内阁 (猿园)

三、笼络国会摇图谋合作 (猿猿)

四、改组联邦摇打击官僚 (猿愿)

五、维持均势摇稳住苏联 (源缘)

六、高瞻远瞩摇访问中国 (源愿)

第三章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外交领导艺术

..... (缘愿)

一、才华横溢摇不辱使命 (缘愿)

二、威慑制衡摇与狼共舞 (远猿)

三、双向互动摇异中求同 (远愿)

四、兵来将挡摇以强制强 (苑缘)

五、斡旋穿梭摇中美言和 (愿愿)

六、舌战八方摇签署协定 (愿苑)

七、夜空茫茫摇明星闪亮 (怨圆)

第四章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领导艺术 (怨苑)

一、初涉政坛摇欲擒故纵 (怨愿)

二、纵观全局摇改换门庭 (员圆)

三、明察秋毫摇反对绥靖 (员远)

四、争取民心摇坚固国防 (员猿)

五、不计前嫌摇化敌为友 (员圆)

六、煞费苦心摇劝美参战	(员圆园)
第五章摇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领导艺术	(员圆园)
一、烽烟四起摇勇承责任	(员圆园)
二、处变不惊摇稳健明智	(员圆园)
三、避实就虚摇开拓非洲	(员圆园)
四、软硬兼施摇联美挟英	(员圆员)
五、不卑不亢摇灵活外交	(员圆愿)
六、加强权力摇结束动乱	(员圆缘)
七、顺应潮流摇改弦更张	(员圆愿)
八、振兴经济摇发展科技	(员圆园)
九、争雄夺利摇智抗强权	(员圆源)
第六章摇前西德总理阿登纳的领导艺术	(员圆愿)
一、初主科隆摇因势利导	(员圆怨)
二、善解民意摇众望所归	(员圆园)
三、务实求实摇争取主权	(员圆缘)
四、独具匠心摇双层政府	(圆圆远)
五、西出东进摇重返国际	(圆圆怨)
六、借风行船摇重新武装	(圆缘缘)

第七章 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领导艺术	
.....	(圆题)
一、初出茅庐摇坚强如钢	(圆题)
二、挑战强者摇问鼎相位	(圆缘)
三、处事果断摇铁腕手段	(圆怨)
四、实施改革摇号脉治“ 病 ”	(圆题)
五、扼制工会摇一箭双雕	(圆缘)
六、英美联姻摇外交旋风	(圆怨)

第二部分摇摇中外历代的领导艺术

第四篇摇外国杰出政治家的领导艺术

第一章摇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领导艺术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出生于美国的上流社会家庭,父亲是百万富翁。罗斯福幼年时曾多次跟随父母游历欧洲国家,16岁入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1905年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后任律师。1913年罗斯福初入政界,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1915年连任,1917年17岁时任海军部次长,表现了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1920年罗斯福以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美国大选,虽然败北,却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政界人物。1921年罗斯福在加拿大参加了一次扑灭森林火灾的战斗,由于过度疲劳后又下水游泳,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致使下肢瘫痪。1925年至1932年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政绩优异提高了威望。1932年罗斯福以“新政”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当选为美国总统。任期内进行许多改革,使美国资本主义走出危机。1937年、1941年和1945年罗斯福多次当选

为总统 ,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获得四次连任的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罗斯福站在反法西斯势力一边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临终前他仍致力于创建联合国。1945年 1月 20日罗斯福在伏案工作时突然患脑溢血与世长辞 ,终年 78岁。

一、力挽狂澜摇转危为安

1929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 ,在这年冬天到了最低点。1930多万人失去了职业 ,他们从这家工厂的大门奔向另一家工厂的大门 ,一个个都是忧郁和绝望的神态 ;倒闭的银行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 ,势不可挡 ,几家作为台柱的大银行虽然照常营业 ,但惊恐的人们成群结队争先恐后提取存款 ;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 ,农场主把售不出去的牛奶倾入大海 ,没有销路的玉米、小麦被付之一炬。而在芝加哥 ,饥饿的人群却在垃圾堆里觅食 ;失业的工人发动骚乱 ,大城市爆发了反饥饿的示威游行 ,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是这个制度就要崩溃了 ;“革命 ”一词风靡一时。

在危机的笼罩下 ,人们绝望、恐惧、愤怒 ,并把罪责归咎于胡佛总统 ,贫民在城郊搭起的棚屋被称为“ 胡佛村 ” ,出了故障由骡子拉的汽车被称为“ 胡佛车 ” ,把空无一物的衣袋的里面翻到外面被称为“ 胡佛旗 ”。还有不少刻薄的笑话讽刺胡佛总统 :有一次胡佛总统主持一个纪念碑的落成仪式 ,礼炮鸣二十一响 ,一个老头说 :“ 天啊 ,一炮也没有打中他。”胡佛对这个局面已经是厌倦和无能为力了。

在危机笼罩下的 1930年大选 ,人们自然不会再选共和党的胡佛 ,选民们寄希望于向传统观念挑战 ,在挽救危机、救济

贫民方面有独到见解和成就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当选为美国第34任总统的。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要挽救这个国家,要维护这个制度,新总统罗斯福选择了“恢复人们的信心和勇气”。1933年3月4日,华盛顿阴沉的天空,不时飘刮着寒风细雨,人们一大清早就聚集到国会大厦广场,等待着罗斯福发表就职演说,他们期待新总统给他们带来希望,在各城市和乡村,人们都挤在收音机旁,等待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罗斯福在首席大法官主持下,手扶圣经宣誓就职,然后发表了他的首次总统演讲。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说真话,勇敢、坦率地说出全部真话。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这个国家将和过去一样坚韧不拔,将会获得新生,繁荣昌盛起来。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应该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这段演讲反映了罗斯福的人生观,他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他的勇气是十分惊人的。他初出茅庐之时,权势压不倒他,敢于向纽约州的党魁宣战;身残也阻挡不了他为目标奋斗,一个瘸子居然当选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现在面临大危机,他希望所有的美国人也像他那样,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战胜危机。他的演讲成功了,观众们希望的就是一个信心十足的总统。

接着他公布了将要采取的对付危机的措施,并要求“国会授予我最后一个对付危机的手段,即对非常情况作战的广泛的行政权力,就像我们真的受到外敌入侵时应授予我的那样大的权力”。他说,美国人民“要求直接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有领导人来实施纪律和指引方向。他们授予我当前这个

职务以便实现他们的愿望。我把它作为一件礼物接受过来了”。

要像对待战争那样来对待危机,罗斯福的这个决心赢得了人们的最热烈的反响。人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敢于向混乱的局势发动进攻的总统。演讲后的一个星期中,表示支持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白宫。支持来自各方,有挨饿受冻的穷人,有失业的工人,有平原地区想造反的农民……

就职演讲只是消除人们恐惧的口头允诺,罗斯福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宣布实行《银行紧急状态法》,使混乱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改善,验证了人们恢复信心的实际程度。金融危机是这场危机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最致命的破坏。罗斯福就职的前一天,美国所有的州长都宣布全州银行休假,以防止更大规模的提款冲击,这个大国的金融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萧条使人们产生对银行的疑虑,大家都贮备现金,外国人则把存款换成黄金带走。这种金融恐慌若不迅速抑制,危机将会愈加无法收拾。

罗斯福就任后,立即召集其内阁成员研究挽救金融危机的办法,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利用《与敌国贸易法》宣布银行休假,禁止金融外流和兑换外汇;二是迅速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讨论银行紧急状态法。财政部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银行的全部资产作保证金发行货币,恢复人们对银行的信任。这个意见被罗斯福采纳,并作为银行紧急状态法的中心内容。四天后召开的国会特别会议,进行了不过半小时的辩论,就在一片呼声中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罗斯福在白宫办公室签署了这第一个法令。

银行紧急法能否奏效,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确实不托底。

罗斯福则以他担任纽约州长时常使用的一种“炉边谈话”方式，像唠家常一样向公众发表讲话，解释银行法的目的意义，敦促听众把钱存回银行。他说：“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同美国人民谈谈银行业问题。我要告诉大家过去几天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做，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他劝人们“把钱存到重新开业的银行比放在床垫下更保险”。最后，他又回到就职演说的话题：“让我们团结起来消除恐惧。我们已经成立了恢复我们的金融体制的机构，现在要由你们支持这个机构使其发挥作用”。

罗斯福的演讲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扫清了人们心中的疑云。谈话的第二天，银行一开门，人们蜂拥而至，他们不是来提取存款，而是把藏在家中的现金重新存入银行，各个城市的存款数都超过取款数。几天时间，全国所有国家银行中约有 90% 重新开业。罗斯福的助理国务卿莫利兴奋地说：“资本主义在八天时间里得救了。”

二、大刀阔斧实施新政

“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众所周知的“凯恩斯革命”同“罗斯福新政”虽然不是因果关系，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凯恩斯的许多主张在“新政”中已有体现。

罗斯福上台后，以近乎魔幻的力量控制了金融危机，为缓和整个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他使充满恐惧的美国发生了转变，为萧条所困的美国人阴沉忧郁的脸上，开始出现了兴奋和乐观的表情。罗斯福紧紧抓住这个势

头 ,实施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百日新政”。

在接受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演说时 ,罗斯福就向美国人民作了许诺 :我向你们宣誓 ,我为自己宣誓 ,要执行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新政。让我们全体在场的都成为未来那种富有成效和勇气的新秩序的预言者。这不单是政治竞选 ,这是战斗号令。请你们帮助我 ,不光是为了赢得选票 ,而是要在恢复美国固有的伟大的这次进军中取胜。”他当时提出新政的主张并没有深思熟虑 ,只不过是迎合美国人厌恶旧的治国方式的心理。“新政”新在哪里 ,它包括哪些内容 ,都没有考虑过。但作为竞选纲领 ;“新政”已经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罗斯福就任总统后 ,一方面是要向美国人民兑现诺言 ,另一方面则是混乱的经济秩序迫使他快刀斩乱麻 ,立刻采取对策 ,实施“新政”。确切地说 ,罗斯福从猿月上旬到远月中旬的“百日新政” ,就是“百日立法” ,向国会提交了十五篇咨文 ,十五项重要法案得到了通过。在这一百个日日夜夜里 ,罗斯福的新政设计师们都在紧急地工作 ,他们点灯熬夜 ,起草各种法案、条例和备忘录 ,处处都提到救济、复苏和改革。尽管罗斯福没有一整套理论作指南 ,其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从整体上看是杂乱无章的 ,但当时的局势帮助罗斯福获得成功。美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 ,没有别处可去 ,只能往上攀登。美国人都希望新政成功 ,不仅民主党内全力支持 ,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也希望新政能给国家带来希望。罗斯福向国会提交的法案 ,都一一获得通过 ,这些法律的制定 ,对于医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

立法的高潮是从通过《农业调整法》开始的。农业部提

出的这项法案,建议通过政府计划和政府奖励的办法,恢复和稳定农场主收入。农场主限制耕种面积将得到政府的津贴,其目的在于减少农业剩余产品,稳定农产品价格和收入。罗斯福称之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

罗斯福最喜爱的一次规划:成立一支民间护林工作队,将缘万失业人员安排到国有林区工作,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还批准拨付缘亿美元作为失业救济金。罗斯福一生中对森林和保护自然有很大的兴趣,现在通过法律如愿以偿,同时,也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去处。

《国家工业复兴法》是罗斯福百日新政中最辉煌的成就,这是罗斯福智囊团实业政策的核心。这次法案的出台,本不在计划之内。罗斯福上台的头几个星期,几乎没有考虑如何促进工业的回升,他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样一项广泛的计划。但国会几次催促总统采取行动,罗斯福召集有关的团体在白宫开会,会上争得一塌糊涂,毫无进展。盛怒之下,罗斯福指定一个起草委员会,命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关起门来,不拿出一项满意的法案,不准出来。就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下产生了工业复兴法。这项法案把《反托拉斯法》和自由竞争学说统统抛弃,允许企业家团体拟定行业价格、工资、劳动条件、生产和销售的准则,并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纳入政府计划。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最重要的一项法律。该法的第二部分还规定成立“联邦公共工程署”,拨出猿亿美元由总统支配兴建公共工程,以便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购买力。当这项法案被通过之时,罗斯福宣称:“通过我刚才签署的这项法律,是为了使美国人民重新找到工作。全国工业复兴法大概将作为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载入

史册。”这项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休· 杂· 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这项法律的全国复兴管理局局长。

在罗斯福的“ 百日新政 ”中 ,还有下面这些法案被通过 : 银行法和证券法 ,房主贷款法和紧急农场抵押法 ,紧急铁路运输法 ,联邦紧急救济法 ,长期禁止出口黄金 ,放弃金本位制 ,实行受节制的通货膨胀 ,等等。

“ 百日新政 ”的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一切都不受传统所制约。这充分体现了罗斯福的性格 ,他从来就不愿意循规蹈矩 ,是个乐天派 ,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担心。西方世界这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 ,各种灵丹妙药都不见效 ,人们对传统的东西已经厌倦、失望。与其在旧框框中苦心寻觅 ,不如尝试一下似乎“ 离经叛道 ”的新方法。《工业复兴法》实行行业计划 ,政府干预 ,真有点“ 计划经济 ”的味道 ;放弃金本位制 ,使美元不再含黄金 ,把全世界保守的银行家吓得目瞪口呆。预算局的局长惊呼“ 西方文明完蛋了 ! ”然而 ,上帝却愿意帮助这位新总统 ,这些“ 离经叛道 ”的新法发生了神奇的作用 ,衰退了四年的美国经济开始了复苏 ,工业的轮子转起来了。《纽约时报》每周商业指数在罗斯福就职时为 ~~缘圆~~ 缘圆 ,远月中旬达到 ~~愿~~ 愿 ,这是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工厂的烟囱又冒烟了 ,农场主的产品又运到市场出售 ,而不是把它烧掉。人民对前途满怀希望 ,萧条虽然并没有结束 ,但对萧条的担心已经解除。

“ 百日新政 ”为罗斯福执政定下了基调 ,在这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新政的长期效果如何评价 ,罗斯福把它交给选民去表决。在新政出台一年之后 ,~~愿~~ 愿 年远月 愿日 ,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向公民提问 : “ 你们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 ? 你们的债务负担减小了吗 ? 你们的银行存款安

全了吗？你们的工作条件好些了没有？你们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多数选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夏天乘船旅行，所到之处受到盛大的欢迎。这一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大获全胜，普遍认为这是对新政和罗斯福政策的响亮支持，他的助手威廉·艾伦·怀特宣称：“人民几乎把他立为国王。”

三、蛟龙潜水摇待机而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崛起，逐渐掌握了一些国家的政权，从而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争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奉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的侵略方针，于1931年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意大利和德国首先把侵略矛头指向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欧洲英法等国制造了“慕尼黑阴谋”和远东“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苏联，扑灭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先后分别与德国、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反侵略斗争赢得准备时间。1939年轴心国集团形成，1939年9月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欧洲主要列强对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阵营开始形成。美国奉行中立主义原则，既不给反法西斯国家以有力的支援，也不给侵略国以有力制裁，继续向日本供应钢铁等战略物资。罗斯福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主张早日参战，反对威尔逊的中立主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却尽可能地学习威尔逊的外交方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采取了隔岸观火的

政策。

美国人虽然反对德、意、日的侵略行径，但更不愿卷入任何对外战争。中立法案明确禁止给任何交战国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他们只是尽可能地利用战争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极力以现金交易方式把他们的剩余产品销售出去。美国普遍笼罩在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气氛中。罗斯福却不是这种思想的信徒和支持者，但他不作任何努力向这种孤立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甚至让人感到他根本不重视对外政策，似乎他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这都不是罗斯福的真实面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这样的现实对美国和他个人都有利。他不愿在战争双方未分出任何胜负或者还看不清它的发展趋势时盲目投入战争漩涡。他在对外问题上采取的做法是：一面密切注视战争进程和发展动向，一面积极做好参战的内政外交方面的准备，为参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认真等待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

他首先认真关注交战国及战争的发展状况。罗斯福亲自选派驻外使节，让他们直接向他汇报和负责，而不通过官方渠道，甚至不相信国务院，认为他们更容易泄露情报，宁愿自己花大量时间同有见识的各种来访者谈话。依靠伯纳德·巴鲁克、埃文斯·卡尔森上尉一伙人直接向他通风报信，他甚至不制订各种易于引起议论的政策，而只是把自己认为必须办的重要事务直接交给财政部或海军部或其他具体部门去执行。后来任命哈里·霍普金斯为他解决重大外交问题，只向他本人负责，他根据所掌握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判断国际形势，作出重要决策，而不去在思想和政策上直接触及美国人的中立思想，他在中立主义的掩护下做自己的外交和参战准备。

罗斯福的内政方面的参战准备措施主要表现在恢复经济和逐渐加强海空军及战争物资生产和生产基地的建设上。罗斯福首先全力推行“新政”，使全国经济走上复兴轨道。他支持霍普金斯的社会救济工作和以工代赈政策，用 150 亿美元解决了将近 1 千万人的生计问题，特别把公共工程由扫枯叶、维修房屋引向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工程管理局三个半月兴建和扩建学校 1 万所，铺设污水管道 1 万英里，建造飞机场 1 个，扩建机场 1 个，修理和建造公路 1 万英里，兴建和扩建机场，公路都是直接为参战准备的，同时还制造航空母舰“企业号”和“约克敦”号积极备战。后来美国国会通过文森扩充海军法，此后 1940 年开支 15 亿美元，建立了一支强大到可以对付德、意、日联合舰队的海军。

罗斯福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脚踏两只船，他一面逐渐增加对盟国的支持，又同时与德、意、日及法国贝当政府保持联系，甚至继续出口废钢铁给日本。中国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对日本制裁，停止交易，罗斯福根本不予理睬，他不愿放弃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大客户，他不可能不清楚这种交易给日本帮了多大的忙，但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市场和利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生死存亡。他的外交有三个重点，一是与英国的关系，英国逐渐成为抵抗德国的唯一的国家，急切地需要美国全力的支持。罗斯福知道德国征服欧洲将对美国不利，但当时英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大国，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拥有霸权地位，支配着国际联盟，是美国心上一块石头，是美国走向世界霸权的重要障碍，因而罗斯福既不希望德国获胜，也不希望英国立即获胜。他不会在英国还比较强大的时候实质性地支援英国，他希望两国认真“切磋”，只要不伤及美国的利益，他看

准了大英帝国的钱袋子。罗斯福对欧战的反应除了一个强硬的声明外,就是 1941 年 1 月 1 日,即英、法对德宣战后的第 1 天发布的正式中立声明。他实施中立法中的武器禁运条款,取消英、法价值 1 亿美元的战争订货,仅允许英、法等自由购买原料和粮食这些经济危机中极度过剩的东西,对所有在美国购买的物资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1 月 1 日签署新法案取消禁令,把现货自运原则扩大到武器,他要的是钱。直到 1941 年丘吉尔准备用自己的“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争取胜利,请求罗斯福宣布非交战状态,供给英国 1 艘旧驱逐舰,供应英国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军火时,罗斯福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拒绝了丘吉尔。同时他却要求国会加速备战运动,计划到 1941 年陆军增加到 100 万人,1941 年 1 月增加到 100 万人,1 月增加到 100 万人,每年生产 10 万架飞机和大量的坦克大炮。他还请求增拨国防经费,实行义务兵役制。法国投降后,英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丘吉尔一再警告,美国若不立即支援,英伦三岛可能沦陷。罗斯福再次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却下令陆、海军部“翻箱倒柜地清查”,把所有“一战时贮存的和库中现有的可用的枪炮弹药修理并移交私营公司,转卖给英国”。从 1 月到 1 月约有 100 万支步枪、100 余万支左轮手枪、100 万支机枪、100 门 105 毫米口径大炮、100 门迫击炮和大量其他军火卖给了英国,其中没有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直到丘吉尔表示英国再没有现款可购买美国的军火时,罗斯福才放开了英国的钱袋子,实行租借法,要英国战后用物资和劳务偿还租借物资。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利用战争,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但他更不愿引火烧身,一旦当火势太猛,危及他的国家利益时,才转而实质性地支援英国。他不是不

得已,而是他不愿美国同德国一决雌雄。

罗斯福外交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在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推行侵略时,他意识到苏联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而苏联似乎未受到影响,继续持续发展,市场广阔。罗斯福要真正作到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又必须面对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这就必须寻找一种“力量的平衡性”,借助一种强大的力量来遏制德、意、日等国法西斯力量的膨胀。在英法等国极力纵容法西斯的扩张时,苏联呼吁各国共同对付侵略而采取一致步骤。苏联是法西斯的公开敌人,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1933年,罗斯福政府在日本、德国侵略行为的压力下,在国内局势的压力下,表示愿与苏联建立关系,结束19年来对苏联的不承认政策而承认苏联。但罗斯福却没有表明自己的战略考虑,即“俄国可能在稳定局势方面提供巨大的帮助”,用苏联来对抗德国和日本,保卫民主和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告诉人民,承认苏联将能收回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所欠的15亿美元债务,活跃两国贸易对美国各阶层的利益极有好处。美苏两个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未取得实质进展。罗斯福一面力图打开苏联市场,一面尽量回避贷款问题,同时参与“慕尼黑阴谋”和远东“绥靖政策”,试图让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他与双方联系,真正坐收渔利。

罗斯福坐收渔利政策的另一重点就是巩固后院。自从走出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美国多次召开美洲国家会议,反复重申门罗宣言,既要充当美洲的保护伞,又把美洲视作美国的囊中之物。他以睦邻政策为旗号,推行“互惠贸易”政策,与古

巴等拉美七国签署了贸易互惠条约,巩固了与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联盟,打破大英帝国各自治领地的贸易壁垒,同加拿大建立了贸易关系。美国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几乎垄断了整个美洲市场。

罗斯福隔岸观火、后发制人的政策,使美国在欧洲列强苦苦战争,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乘机巩固发展了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争取世界霸权,甚至不惜乘人之危,他支持英、苏、中的抗战斗争,很明白地包含着让这些国家牵制法西斯侵略者,为他坐收渔利创造机会,使他在各种矛盾中游刃有余地扩张美国利益。罗斯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四、炉边谈话摇暗授天机

在 1944 年大选来临之前,罗斯福是否连续竞选第三次连任总统似乎是一个谜。内阁中除伊克斯外几乎没有人支持罗斯福作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其它的阁员几乎都准备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罗斯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请免开尊口。”罗斯福未必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英国很快投降德国,罗斯福竞选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只要英国还能坚持战斗,罗斯福竞选总统才有一线希望,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他宁愿光荣地见好就收,把困难留给继任者来处理。英国坚持战斗坚定了他的信心,罗斯福决心第三次竞选。他刚刚第三次连任总统,丘吉尔就发来一封长达 1400 字的长信,紧急信声称:“我们不能再用现款支付运费和购买其他供给品的时刻即将到来,英国经济和战争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紧急请求美国拨出几千架飞机,几百万吨船只,丘吉尔表示“只要给

我们武器 ,我们会做好这件事 ,毋需美国一兵一卒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根据美国中立法和其他立法条款 ,交战国必须用现款购买武器 ,并且不准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但是 ,自从 5 月中旬以来 ,德国一直在对英国进行持续轰炸 ,对伦敦进行闪击战 ,希腊、北非战局恶化。

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问题 ,深思默想了两天 ,他清楚地意识到 ,英国财政枯竭 ,不仅不能持久战斗 ,美国的货物和商品也无法进入英国 ,他已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刻 ,而美国长期受孤立保守的中立主义影响 ,普遍反对参战。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攻击罗斯福是好战分子 ,并警告美国人民 ,选举罗斯福意味着“ 为他们的儿子、兄弟、爱人树立十字架 ”。罗斯福不能不告诉全国人民 ,他主张和平 ,并在 1941 年 1 月 8 日的费城演说中向选民保证 ,他并没有为了将美国卷入战争 ,或为了其他目的签订秘密协定 ,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演说中强调他加强国防的长期努力的原因是 ,只有使欧洲的侵略停止 ,才能使战火不致烧到美国的海岸 ,并保证“ 我从前说过 ,但我还得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 ,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 我们防御的目的是防御 ” ,而现在的他 ,在发表这些讲演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后 ,却不得不作出新的抉择。在 1 月 16 日 ,他向记者们说 :“ 保卫美国的最后办法是英国人保卫自己 ” ,主张贷款给英国使英国购买美国货或把钱赠给英国却是陈词滥调 ,表明他并不打算直接和中立法案冲突 ,然后讲了一个平淡无趣的寓言 :“ 一个人邻居失业 ,而他的花园内有一个浇花的皮带管 ” 罗斯福用这种平淡的比喻来摆脱他的尴尬局面 ,从而提出了一条重要谋略——救邻自救 ,但并没有

引起他所企望的反应。

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再次用“炉边谈话”将严重的战争局势及他的想法告诉美国人民。他把鼓吹姑息纳粹的人痛骂了一番：“我们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去回避危险或对危险的害怕。”“一个国家要想同纳粹和平相处，决不是什么和平，它只能是又一次休战，会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备竞赛，最富有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我们南北美洲各国所有人，可能就要在纳粹的枪杆子威胁下过日子。”“想要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是极其愚蠢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军火库”，但“也有一些美国公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身居要职，尤其是在国务院里，他们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地支持和怂恿第五纵队的间谍活动”，并断言轴心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成为“民主的军火库”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美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尽管德军用空袭伦敦来抵消“炉边谈话”的影响，但成为“民主军火库”已成为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不论反对派是如何攻击租赁法案，它还是被通过了。

救邻自救的租赁法案既克服了直接投入战争派遣军队要遭受的巨大压力和反对，又使美国政府和人民逐步摆脱了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案的统治性影响而逐步走向战时体制，同时有力地支持了英国、苏联、中国等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使美国把战争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这一法案的实施，有力地牵制了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使美国实际上也明显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一边。

1941年12月8日参议院通过租赁法案，正式“授权并提供足够资金增加军火和许多种作战物资，准备交给那些正与

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这些东西将在战争结束时用物资与劳务归还”。罗斯福总统立即签署并请求国会拨款 40 亿美元作为生产与输出租借物资之用。通过这个立法,尽力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合格的兵工厂,从而美国从中立国变成非交战国,而德国正在疯狂地进行潜水艇战,在大西洋上将各种运送军需物资到英国的船只摧毁,1941 年 5 月有 12 艘万吨的商船被摧毁,大西洋战斗成为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罗斯福一面下令修理英国船只,一面将 10 艘警备队汽艇转让英国舰队,帮助反潜艇作战,一面扩大海上巡边范围,开始将大量物资运送英国并部分护航,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反对派认为英国的抗战毫无希望,美国应当用它的武器保卫自己,他们宣称罗斯福租赁法案是把钱扔向大海,一分也没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将毁掉四分之一的美国青年。史汀生部长建议罗斯福下令海军为英国与同盟军商船进行全程护航。罗斯福既没有向反对派妥协,也拒绝了史汀生的建议。面对希特勒的“海狮计划”,英国只留下 10 架战斗机和 10 架轰炸机,要保护数千里的海岸线十分困难。德军潜艇为切断英国大西洋上的生命线,击沉驶向英国港口的商船 10 艘,打坏 10 艘,损失相当于英美两国造船厂补充能力的两倍,形势异常严峻。罗斯福清楚,对现代战争的突然打击力有一定了解的人,等待敌人取得立足点是愚蠢的,必须防止敌人取得立足点。严峻的战争现实正迫使各国从单纯自保出发,作出新的严峻选择。对罗斯福来说,对大西洋战斗不是采取不采取行动的问题,而是采取哪一种方式参加的问题。

罗斯福比任何美国人都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比任何美国人都清楚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意义,清楚美国在这场战争中

的处境,更清楚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在“新政”时期就支持霍普金斯的以工代赈工作,致力于修筑全国的公路、飞机场、恢复船厂等军工生产。到了法国投降,他仍不急于投入战争。他不想仓促参战,甚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也不急于向德国宣战。他要彻底等待美国人民放弃任何中立和和平的幻想。他为夺取战争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要使军工生产全面恢复并大力发展,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工生产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而租赁法案是最好的办法,既支持同法西斯作战的国家坚持抗击侵略军,又为美国赢得最多的备战时间。他首先支持英国等抗战国家,德军侵入苏联,罗斯福就把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运往苏联;当蒋介石以对日谈判要挟他,他立即增加了对中国的租赁物资的数量。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赁法案援助同盟国家的物资达 100 亿美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也成为各抗战国家的真正朋友,在国际事务中,自然地居于中心地位。从 1941 年 1 月开始,罗斯福建立生产管理局,从生产优先制帮助汽车制造商向生产坦克和飞机过渡,到当年春夏完成向战时经济转变,接着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使战争物资生产由 1939 年的产值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944 年的 400 亿美元,相当于德、意、日三国总产值之和,飞机从 1939 年生产 1000 架发展到 1944 年达 10000 架,商船 1944 年建造 100 万吨,1945 年达 150 万吨。

正是在这种坚实的经济实力之上,美国参战才具有真正决定性影响的意义,为美国军队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为盟国坚持战斗直至胜利提供了物资保证。而租赁法案正是启动这种战时生产体制的关键步骤,从而真正实现了救邻自救

的政治目的,使美国成为唯一在战争中保持经济发展的国家,为美国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奠定了基础。

五、抓住重点摇各个击破

罗斯福执政时期,正是德、意、日三个国家走上法西斯扩张道路的时期,是亚欧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时期。罗斯福几乎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国内事务上,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新政”,以渡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国际事务上,他跟随英法,在欧亚推行那种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的绥靖政策,纵容和助长了德、意、日的侵略野心。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轴心,迟早会把侵略矛头指向英、法、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他尽可能地了解各国动向,尽可能作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他选择了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政策,并开始考虑美国参战的时机、地点,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效应。最终他制订形成了一个先欧后亚、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

在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罗斯福正忙于他的竞选准备。1938 年轴心国集团形成,德、意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罗斯福正忙于对付国内的工人运动,国内保守势力正以强大的压力使美国避免卷入欧洲冲突。1937 年 7 月,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罗斯福却于 8 月 1 日派遣 100 名海军陆战队,增援在中国的 100 名美国兵。作为仅次于日本的在华投资国家,1941 年,罗斯福提出了“隔离”政策,号召并主张召开国际会议,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立即得到英国人的积极响应,英国更担心其远离本土的东方利益会被日本夺取。强有

力的反侵略国际会议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但美国民众反对与英国合作,把总统称为战争贩子。罗斯福看到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缅甸、太平洋各岛及新加坡、香港及其在华的巨大利益,态度立即从强硬变为消极,以至美国代表团不愿为会议提出一个行动方案。而日本对此的答复是炸沉了长江中美国炮舰“佩纳”号和三艘油轮,但美国也只是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甚至要撤退所有驻华美军及侨民。罗斯福觉得美国人还吞不下太厉害的政治药剂,他只好放弃原计划。因为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他悄悄地以另一种路线前进,表示如果加拿大遭受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石油、废铁,而没有这些供应,日本是难以发动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罗斯福这一时期确实关注日本的侵略超过了欧洲,他要求加强关岛防务,众议院怕东京认为美国挑衅而否决了它。捷克危在旦夕,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办法应付危机。罗斯福要求拨 10 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得到同意,又派霍普金斯调查太平洋沿岸各州情况,了解普通飞机场改为军用机场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感到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罗斯福公开表示美国需要 1000 架军用飞机,相信有了空军就有胜利把握。罗斯福相信美国与德国难免一战,但他希望这种可能最好不要出现,或者通过支持和供应英国武器等待时机,坐收渔利,而亚洲战争对美国关系更为密切,他无法确定中国能支持多久。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在德国进攻苏联前更可能把目标选择在太平洋,日本是把美国拖入战争漩涡的主要敌人。直到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对日宣战,但拒绝对德、意宣战,仍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

但大多数美国人更关心欧战,随着欧战的升级和纳粹的胜利,美国人日益认为德国是主要敌人,特别是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加强在拉美国家,甚至在美国的活动和大西洋海战的严峻形势,使美国后院处于危机之中,罗斯福支持美洲议会警告欧洲交战国不得在这些国家的海域作战。特别是日本陆军主力陷入中国战场无力自拔后,罗斯福感到亚太战场比欧洲战场危险性要小,而德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了日本,使罗斯福真正意识到德国才是美国未来的主要敌人。在1941年10月美英参谋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大西洋和欧洲才是决定性的战场,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随之到来。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舆论一致要求美国对付日本,把德国交给英俄对付。罗斯福立即对日宣战,陆军部下令美国各港口已经装船的全部租赁物资暂停离港,冰结原来拨给中东和欧洲的重要物资,转拨给太平洋方面。当丘吉尔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马上从位子上跳起来,要外交部立刻办理对日宣战的手续;“连迟一分钟都不行!”英国人担心美国战略思想又可能有急剧变化,会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对付日本。哈里曼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要他帮忙,即影响罗斯福坚持优先对付德国;丘吉尔立即要求到美国与罗斯福举行会谈,外交大臣艾登直奔莫斯科。12月10日,丘吉尔到美国后,用尽全身解数与美国阁员、军事参谋人员套近乎、拉关系,与罗斯福更是广泛交换意见,但罗斯福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他的战略意图。罗斯福在议会讲演时,首先向抗击法西斯的国家致敬时,当他先向英国、苏联致敬时,会场几乎没有共鸣,但当他向单独抗击日本侵略者四年半的中国人民致敬时,议会掌声雷动达15分

钟之久。罗斯福不会不考虑人心向背,然而当他犹豫不定,丘吉尔忙得不可开交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帮助了丘吉尔,替罗斯福下定了决心。德国首先向美国宣战,而日本几乎把太平洋上任何可供美国立足的基地全部扫荡一空。罗斯福经过审慎思考,终于与丘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确定了先欧后亚,各个击破的重大战略决策。

先欧后亚的战略决策,是罗斯福影响二战进程的最重要的决策。它直接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尾方式,直接影响到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它并不是罗斯福上了丘吉尔的当,而是当时世界大战进程中一项重要而明智的决策,因为当时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必须有胆识和远见的。第一,是日本这个经济上远没有美国强大,军事上没有美国先进的国家首先打击美国的,它给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和太平洋利益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要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咽下这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实在是历史上绝无前例的,若没有全局战争的总体战观念是难以承认这一失败、放弃这个当面之敌的。第二,美国当时社会舆论无不以日本为主要敌人。圓題名军人死于珍珠港,愿艘大型军舰和许多驱逐舰被击沉或击毁,美国人民愤怒之中忘掉一切党派之争,辩论起长期对立的外交政策,决心坚定不移地打赢这场由日本发动的战争。参议员惠勒恶狠狠地说:“现在只有狠狠地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无数的美国人包围了日本大使馆,有的人甚至砍掉了华盛顿的樱花树;罗斯福愤怒得一天都吃不下饭,他和他的三军参谋长怎么也想不通这样大的一个海军基地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国务卿赫尔见到日本大使气得浑身发抖,把日本大使赶出自己的办公室;白宫的广场前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美国的群情

激愤是针对日本的,罗斯福要把德国摆在首位必然要说服这些愤怒的人们和议员。第三,把战略重点放在德国发动的欧洲战场,就意味着太平洋战场必须继续忍受耻辱和失败,即使最终能战胜日本,但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罗斯福对这必须做出准确的判断。第四,日本下一步进攻方向在何处,战争期间有没有进攻美洲西海岸、进攻北美洲的可能性,连丘吉尔都相信美洲西海岸不时可能会遭“冒犯”,罗斯福也认为日本利用航空母舰袭击西海岸或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很大。日本人若袭击西海岸,对美国人心和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影响极大;袭击巴拿马运河,直接把美国海军隔在大西洋而无法控制太平洋局势。罗斯福一度反复强调:“只有在本半球以外的地方取得军事胜利,才能全盘实现国策。”罗斯福开始“疏散”西海岸的兵工厂,设法用粤北战区将日本圈在一定范围,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几乎不可能。一旦日本突出包围,占领澳大利亚切断太平洋与印度洋,或经印度洋进军中东与德、意会合,后果就不堪设想。

马歇尔在这个关键日子,提出了他的重要建议:“我们必须在这里决定一个行动方针,而不能指望在战场上去决定。我赞成由一个人当家,但要根据我们这里所发的指令行事。”“如果我们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十有八九都可以解决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统一指挥就必须从全世界的战争大局出发,罗斯福决策的基点不得不发生根本转移。罗斯福看到:用美、英、荷、澳战区包围日本,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用俄、英、非洲、土耳其包围德、意,堵住缺口把握更大;英国作为战略基地可立即使用,非洲广大的区域即将具有重要意义并投入使用,而中国、太平洋战区随着美国太平洋舰

队的毁灭,几乎无法使美国找到安全并可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基地,全世界只有苏俄战区不久可能转入反攻,苏、美、英合作力量远远超出德、意,而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美、中、英、荷的力量虽可超出日本,但英、荷战斗力极弱,中国立即反攻的条件还不成熟,美国面对宽广的太平洋,陆军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海军、空军也没有把握尽快控制太平洋;从战后政治格局来看,英、荷、法在太平洋和亚洲的力量尽快会被日本摧毁殆尽,亚太地区迟早要成为美国支配的地区,但在非洲和欧洲,一旦德意失败,这些地区将被英、苏分割,若美国不投入主要精力,美国将失去这些地区,对美国的世界霸权不利,一旦德意胜利,美国将面临比日本强大得多的敌人。罗斯福思来想去,既不能让英国失败,也不能让英国独享胜利果实,不能重蹈威尔逊的覆辙,美、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必须根本改变。罗斯福基于这些原因,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终于作出了决定,先欧后亚,各个击破,争夺世界霸权。他虽没有改变全国人的企望和目标,没有公开他的这一决策,但已把绝大部分的作战规划工作集中于欧洲方面,主要目标就是从阿尔汉格爾到黑海,经过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北岸和欧洲大陆西海岸连接起来加强和紧缩对德国控制地区的包围圈,把缺口堵起来,支持苏联战场,武装和支持土耳其,增加中东力量,占领整个北非海岸。

历史证明,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不仅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论在东半球,还是在西半球都居于重要的支配地位。罗斯福作为一名伟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和民众保持一致,什么时候必须审时度势,作出决断,他不但清楚什么是美国的尊严,什么是

美国的利益 ,更了解什么是可能 ,什么是现实 ,知道部下的哪些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而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政策。

第二章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领导艺术

理查德·尼克松(员愿猿年员愿缘)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达镇 ,属于爱尔兰后裔。员愿肆年 怨月尼克松自公立中学毕业后考入惠蒂尔学院 ,员愿源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入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毕业后回老家当了律师。员愿源年加入海军 ,复员后于 员愿源年和 员愿愿年两次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 ,员愿缘年当选为参议员 ,员愿猿年至 员愿远年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在 员愿远年总统竞选和 员愿远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接连失败 ,曾心灰意懒地宣告退出政界。员愿愿年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重入政坛 ,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 ,当选为美国第 猿苑任总统。尼克松任职期间 ,对内实行“ 新经济政策 ” ,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 ;对外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 ,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存在 ,结束与中国的多年敌对状态 ,打开中美关系僵局 ,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来到北京。

员愿圆年尼克松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员愿源年 愿月 愿日晚因水门事件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此后尼克松无心于“ 担任官职的政治生活 ” ,专志于著书立说 ,曾出版《回忆录》、《领导人》等书 ,员愿愿年 苑岁生日时又完成《员愿愿:不战而胜》一书 ,分析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形势 ,以特有的形式发挥着自己的影响。

一、巧建班子摇紧握权柄

如何使集权与分权并行不悖,这是总统有效地维护和扩大其权力的前提,尼克松的做法是在他周围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白宫工作班子。他认为,一位领导想要成功,必须建立一个作为核心的忠诚工作班子,他们分担他对工作的考虑,提前向他提出警告,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并有能力使他少犯错误。尼克松曾问艾森豪威尔,在工作人员中他最重视哪种品格。艾氏回答说:“无私。”毫无疑问,谁能针对公务的责任感置于他们自己私利之上,谁就是理想的工作人员,但是这种人很难找到,尼克松认为大多数人跳不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所以他选择工作人员的宗旨是,必须考虑三个条件——智力、思想品质和魄力,他要求他的下属既忠诚又有能力。在择用人员时他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工作人员同自己的见解愈一致,便愈能为自己所重用。尤其是当国会为反对党所控制时,他需要一个精干、忠诚的白宫工作班子,来对付比前一代更为专横的国会和官僚机构的争执不休的议事日程和他们扩张权势的奢望。因此,不想成为国会和官僚部门的傀儡的尼克松把任命高级白宫官员看得比任命内阁成员更困难也更重要。

尼克松在原有竞选班子的基础上组建他的白宫新班底。在他设置的四个高级职务中,就有两个由其心腹担任,鲍勃·霍尔德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埃利希曼任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尼克松愿意用旧人的倾向特别明显,这与他重视强化总统行政大权直接有关,在他看来,授权的关键是要信任所委托的人。对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他知根知底,可以委他们以重任而毋需担心他们会越权或滥用权力。另外,这些老部

下为他登上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以高官厚禄犒劳他们,将会增强他们对他的忠诚。尼克松最为倚重的内臣当属霍尔德曼,他们的关系在埃利希曼的笔下得到了形象的描述:他(霍尔德曼)深信尼克松有朝一日将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后来他认识到自己所崇拜的政治偶像远非完美无缺,但他心甘情愿地运用自己的才智来补偿尼克松的缺陷。当尼克松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时候,霍尔德曼就成了他的主心骨,为他雇用和解雇人员,果断行事,要求工作人员沉得住气。当尼克松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时候,霍尔德曼就说服他办些必要的抛头露面的事情。当尼克松感到精力不支的时候,霍尔德曼保护着他,使他免受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以免伤神。他们两人相互依赖,难解难分,很难区分哪些是尼克松办的事,哪些是霍尔德曼办的事。

在筹组白宫班子时,尼克松不只是任人唯亲,他还毫不犹豫地选用曾反对过自己的有才华的人,他对基辛格的启用便是典型的为取其谋而用其人。听说尼克松要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些最忠诚的尼克松分子纷纷提出异议,因为基辛格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还以洛克菲勒派的身份严厉地批评尼克松,这种任命似乎不合情理。但尼克松不计前嫌,坚持用基辛格,理由很简单,基辛格最适合做这个工作,而且他与自己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相同。事实证明,把基辛格拉进白宫为自己出谋划策,是尼克松出奇制胜的一着。

基辛格接受尼克松的任命,无疑表明了以洛克菲勒为首的东部财团对当选总统的认可,尼克松新政府的基础因此而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同时,基辛格的哈佛教授身份是尼克松白宫班子的最好点缀。自约翰·肯尼迪以来,延请学者教授

入白宫任职已蔚成一股政治风气,尼克松的亲信、至交虽然都出自美国各大学,但因多年活跃于政界,已与学界无甚联系,所以在许多人眼中,他们不是标准的文人学士,更配不上“智囊”人物的称号。《纽约时报》公开讥讽尼克松是“庸人领着一帮碌碌之辈”。当然,尼克松重用基辛格不光是为了装点门面,更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组织政府就打算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他希望找到一位高明的搭档来辅佐自己掌管外交大权。因此,他认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很关键,如果选一个二流水平的助手,他会对其工作总是放心不下。尼克松向来持有这样的看法,即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的标志是他愿意挑选一批比他精明的人,他们会以他们的理想和各自的才智向他挑战并激励他,反过来他又影响他们的意见,使之适合自己战略上和政治上的见解和直觉。尼克松正是依照这一理想模式选择建立他与基辛格的合作关系的,他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认为后者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最佳人选。

由于尼克松执意要把内政外交大权转到白宫、进而集于他之手,所以组建白宫工作班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便是如何调控和发挥该班子的功能。

每个总统都得有一个自己的“杂役”,尼克松牢记着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忠告。“杂役”原意为狗娘养的,艾氏所言是指专门替总统干得罪人的事的人。尼克松在他的随从中找来找去,最后决定由霍尔德曼来充当这一角色。名义上,霍尔德曼负责大量的非实质性活动,类似一名打杂人员,实际上他是一个总助理,从邮件收发室到政治活动的一切事务都归他管。在他忠实地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他满足了尼克松的一种特殊需要,这就是如同媒介所描绘的,他在尼克松周围建筑

了一堵“柏林墙”。通过霍尔德曼,尼克松得以挡住那群没完没了“非见总统不可”的政府官员,在尼克松的意识里,内阁等官员都不可信用,不给他们抓到实权的最好办法是对他们避而不见,所以他要求这些人把问题写成书面的东西交上来,或是找能比总统更好地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某些办公厅人员去进行交涉,于是霍尔德曼就专门负责对他们说“不行”,而且不是以委婉的口气。

其实,被尼克松启用的“杂牌援手”远不只霍尔德曼一人。尼克松的政治哲学是,有时为了一个伟大目标,可以使用令人不愉快的手段。正如自己所信奉的那样,他为了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把政府官员挡出白宫、监视政敌、搞对手的情报,诸如此类的特殊需要又造就了更多的“杂牌援手”,霍尔德曼后来承认:“时至1970年,尼克松使用着三个下级——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为的是在某些问题上,能够采取三种不同的对待方法。我扮演的角色是使用直截了当、当头一棒的战略。诡谲多端的埃利希曼作耍花招之用,科尔森则留着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乍看起来,白宫班子的四位人物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和舒尔茨权倾朝野,他们各自独挡一面,与总统单线联系,对美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但实际上一切权力的终端都在尼克松处。尼克松分权给他的四位幕僚,目的有二:一是经他们之手把本该归属于内阁各部的权力收回到他这里;二是借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各系统的功能,保证白宫班子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同时尼克松也知道,他手下这四员大将各有神通,又占据关键职位,年长日久,他们会不会僭越职权,谋取私利呢?他们的不

忠行为不但会使白宫陷入瘫痪 ,而且一切政治毁誉将记在总统名下 ,作为肇事者的他们则用不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因此 ,尼克松在放权的同时也不得不留一手。为防止下克上的局面出现 ,他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和舒尔茨之间采取相互牵制的策略 ,利用他们中间的相互竞争甚至嫉妒来维持他们之间的平衡。另外 ,他通过引入新的“杂牌军”来制约他们。白宫班子运转近一年之后 ,查尔斯·科尔森来到白宫 ,此人善于观言察色 ,领悟上司的旨意 ,尼克松很快就从他身上发现了新的辅助作用。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老人马熟知尼克松的脾性 ,如果总统的某些命令在他们看来是不明智或有损于他本人的 ,他们往往拒绝执行 ,而科尔森却是尼克松能随时召来处理一些别人不愿处理的棘手事务的新伙伴 ,白宫里的第五套班子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表面上 ,科尔森要受霍尔德曼领导 ,但实际上他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霍尔德曼力图把这套班子抓在自己手里 ,但尼克松常常绕开他 ,后来连基辛格、舒尔茨和埃利希曼都发现 ,根据总统的具体指示 ,科尔森把手伸进了他们管辖的一些重要领域。

二、以强制弱摇利用内阁

尼克松还记得 ,~~1952~~1952 年大选之后 ,杜鲁门总统向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移交权力时对内阁不听他的指挥很有怨言。八年副总统的经历也使尼克松相信 ,内阁成员是总统的天然敌人 ,所以 ,他上台执政后 ,没有忽视内阁问题。如何给它摆位 ,尼克松作了一番筹谋。

在他内心的天平里 ,白宫工作班子重于内阁 ,他把忠诚与能力兼备的佼佼者优先考虑放进白宫班子便是明证。如此一

来,内阁的实力就相对地薄弱,自然便于总统集权。尼克松采取这种以强制弱的作法,是基于他对内阁的特殊看法。他认为:“内阁政府”根本不符合美国现行体制,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期望,人民希望总统能领导而不是追随下级,内阁可以执行政策,但它不能也不该制定政策。内阁本身不是经过公众选举出来制订政策工作的。而且内阁官员们是被动的、甚至能力欠缺的,他们完全依靠非经选举的行政机构为他们提供各级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信息和指导,否则他们也做不了这件事。

然而,对内阁的偏见并没有妨碍尼克松对它的利用,除了决策以外,他尽量推动内阁充分发挥其他功能,他对阁员的任命就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1970年尼克松挑选阿格纽为副总统候选人,完全是冲着后者那南部出身而来的,尽管他对这位副总统有诸多不满,但到1972年大选时他仍然不得不利用这块招牌来吸引东南部州的选民。至于国务卿人选,尼克松要找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办事人,这个人首先要擅长于外交谈判,其次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足以保证国务院支持总统的政策,最好还要与国会相处得不错,能缓解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白宫之间那种几乎已经定形的敌对关系。比尔·罗杰斯正好具备了这种种素质,尼克松相信他的这位老友一定能够在最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同他合作共事,可是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不久,罗杰斯便无可奈何地离去。尼克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由基辛格来补缺,国务卿一职从有名无实恢复为权力的要害关节。尼克松设计这种转变,是成心让外交奇才基辛格放开手脚,干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以把美国人的视线从被媒介愈炒愈热的水门事件上吸引过来。尼克松

遴选国防部长的标准不是去计较军衔、军功之类的,而是看谁在国会有市场,必须具备国防拨款事务方面的专长。他要求财政部长不但是专家出身,而且更要紧的是该人不能属于东部财团。为实行有效控制,尼克松还把他的两位亲信鲍勃·芬奇和约翰·米切尔塞进内阁,分别委以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的职务,他们构成了尼克松内阁的基石。

尼克松对内阁最初采取笼络的策略,想方设法营造出他与内阁之间协调合作的乐观气氛,以便让人们感到,把内阁晾在一边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把新总统及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安排在早上八时,为的是向所有的人,包括内阁成员们表示,尼克松班子要一早就工作,要经常地、勤奋地工作。尼克松当众宣布:“鉴于我们在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工作,我们将称它为工作内阁。”他甚至提前一个月把内阁成员及其家属集中到华盛顿,让他们在总统就职仪式时戏剧性地出现。第二天,尼克松又在电视观众高峰时刻把他们介绍给全国。尼克松夫妇还参加了专为部长夫妇们举行的关于怎样做个内阁官员的讲座和讨论,当时尼克松作了一个漫谈式的讲话,他激励他的内阁勤奋工作,把他们领导的部从懦弱的官僚控制下接管过来,为他们的家庭挤出时间来,同美国人民保持联系。这番话听起来好像他打算授权于他的内阁以管理他们部门的完全自由,不受白宫的干涉。

但是,没过几星期,总统与内阁的蜜月期就中断,此后尼克松一直试图把内阁操于掌股之中。首先,他采取有限隔离法,在他和内阁之间设立一堵墙。他借口某些阁员的言行使总统很尴尬,指示内阁阁员们:凡事要通过他的高级助手,如霍尔德曼、基辛格等人。然后他让他的高级助手对内阁成员

区别对待。“你应该依靠那些好的部长们,而管好其他的部长,”尼克松亲口对埃利希曼说:“我就是这么干的,他们送来的文件,有些我只签个名;有些报告在我决定签署之前,我总是要多读几遍。”如果内阁不服,尼克松自有办法,他与其高级助手干脆越过内阁,直接向有关部门下达命令。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拒绝执行总统一些关于指挥越南战争的命令,特别是一些关于空军作战行动的命令,尼克松大为光火,他原本希望莱尔德在国会上能起到他所需要的滑轮作用,来取得一个健康的防务拨款和在越南的自由行动,没想到莱尔德反而成了他行使权力的阻碍,尼克松一气之下,甩开莱尔德,直接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一些军事命令不是通过国防部长发出,而是由基辛格绕过莱尔德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阁员不服从总统领导已成为多数现象时,尼克松就采取他的最后一招:撤换。他对其助手说过,在他的内阁中没有一个人是被选举出来的,只有理查德·尼克松是选举产生的,只有他要经受下届大选的考验。如果他必须为他的内阁部长们的错误付出政治代价,那么老天作证,他有权利和义务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尼克松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他放弃创造历届内阁任期最长的记录的打算,大刀阔斧地改组内阁。他认定自己要的是既能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意见、又能在他一旦作出决定后全力支持他的那种人,而那些过分自行其是、难以共事的人只会给内阁带来灾难。尼克松频繁更换阁员,目的在于纯洁内阁,使它更服从自己的领导。

三、笼络国会摇图谋合作

经过近四十年^①的政治演化,由美国开国元勋们所确立的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已不再是等边三角形。对总统权力进行制约的两要素中,最高法院的力量相对削弱,实际上能与总统抗衡的只有国会,因此,不等边权力三角形的变形就在于总统和国会这两条权力轴线,时而前者倒向后者,时而后又倒向前者。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国会权力轴线不断向总统权力轴线倾斜,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是与民主党在大部分时期内控制白宫政权有重要的关系。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在其任内都程度不同地淡化了总统权力,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其他各种因素外,也是得力于他们所代表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议席中占据了多数。民主党因新政的成功使它在美国社会的中下层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故有多数党之称。它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经常占据优势。罗斯福等诸位民主党总统正是利用本党控制国会的有利时机,敦促国会通过了多种改革法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政治抱负,他们那名垂青史的业绩让尼克松羡慕不已。

“ 全国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实行变革 ”,尼克松上台伊始曾踌躇满志地说:“ 我们不希望以谨小慎微的名声载入史册 ”。但是,现实很快就使他冷静下来,他是 1969 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均被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任职的总统,这意味着他的政府将面临国会的重重阻力。他不可能丢开国会而独自行事,须经国会同意,他的各种法令提案才得以成立并付诸实现,同时尼克松也认识到,他不可能得到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

尼克松从作好国会内部共和党议员的工作入手。相当长时期内,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惯性,他们长期

扮演忠实的反对派 ,很少提出重大的立法提案 ,作为少数派 ,他们对国会所做的事情也不负多大的责任。现在 ,形势完全不同了 ,共和党成为执政党 ,它要求自己的议员在国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尼克松的指示下 ,约翰·埃利希曼、布赖斯·哈洛、帕特·莫伊尼汉等白宫顾问负责与国会联络 ,对共和党的议员施加影响 ,推动他们调整心理 ,改换角色 ,在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杰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周围团结起来 ,共同促成尼克松提出的成套立法提案。

在同国会打交道时 ,尼克松想方设法同资深的保守民主党人结成联盟 ,以赢得立法所需要的关键性投票。尼克松任总统的第二年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这位民主党要人有酗酒的不良习惯 ,尼克松通过警方和特工机关弄到有关艾伯特因酗酒而引起种种麻烦的材料 ,准备利用它对艾伯特进行讹诈 ,以迫使其与总统合作。民主党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长期任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 ,他对尼克松关于税收、收入分成和福利改革的立法提案能否获得通过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 ,尼克松要求他的经济事务助理乔治·舒尔茨常与米尔斯呆在一起 ,他自己也经常约见这位主席 ,甚至亲自打电话慰问病中的米尔斯。尼克松笼络人心的举动最终收到了成效。

对普通的国会议员 ,尼克松也没有忽视。当时设有一个“款待”办公室 ,专门负责为来自议员们的选区的选民们安排参观白宫。白宫还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程序 ,保证每个议员的来信都能得到迅速的处理和详尽的答复。总统的社交秘书协同院外活动人员、基辛格和埃利希曼 ,保证把所有该请的议员一个不漏地请到总统的招待会和宴会上来。每次社交活动之

后,尼克松要与埃利希曼等助手开碰头会,把他头天晚上从议员们那里收集来的问题和牢骚话提到桌面上来,要求埃利希曼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几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尼克松再打电话回复那些议员,并保证彻底追查。

尽管如此,尼克松和国会对某些问题还是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为根深蒂固的党派政见无时不在起作用,议员手中宝贵的赞成票只有在对本党派有利时才会投给尼克松。当某项极端重要的立法提案必须被通过,而采用惯常的政治战术仍不能逾越国会的障碍时,尼克松往往使出他的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越过国会和新闻媒介直接和人民见面。他利用对全国发表有效的电视讲话来改变政治舆论,而公众舆论直接影响着国会议员的政治利益。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他们对各自的选区负责,他们在政治上很谨慎,如果公众支持,他们就投票,如果公众反对,他们绝不会采取自杀性的行为而导致自己议席的丢失。大多数国会议员是现实主义者,无论他们眼前关心的是什麼,当总统表现坚强时,他们不会轻易采取错误的政策立场而使自己完蛋。尼克松很了解议员们这种害怕选民会找他们算帐的心理,所以他不强求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牺牲自己,而是走上讲坛用有说服力的演说,使不受欢迎的东西成为受欢迎的东西,到那时,他就能从国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尼克松取悦于国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曲意逢迎,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面对着一个反对自己的国会,也从未放弃过改变由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格局的打算。在与国会的周旋中,他使用胡萝卜兼大棒的伎俩,对国会议员一方面笼络有加,另一方面迫其就范。尼克松往往通过他手下人向国会议员施加压

力,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不是那些为总统工作的职业院外活动家,因为他们还兼为某些私人大公司服务,他们的去留不随某一位总统,所以他们为个人利益考虑也不敢得罪国会议员。替尼克松做恶人的是埃利希曼等忠臣,他们不打算一辈子都在华盛顿度生涯,他们只为尼克松服务。为了总统的利益,他们大胆地和国会议员在投票问题上做交易,或玩弄一些雕虫小技在这些立法者中引起某些恐惧心理,敦促国会议员按照总统的旨意行事,他们还无所顾忌地对国会提出非常尖刻的批评,埃利希曼甚至利用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抨击国会议员的懒散或财政超支。尼克松本人也因一项提案在参议院未获通过,亲自召见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休·斯科特,将他狠狠地刮了一顿。尼克松想使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意图在 1974 年国会选举中破灭,他在连任总统之初,便撕下温情的面纱,对国会及其他官僚机构发起攻势。此举激怒了国会,它对水门事件重新进行调查,结果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

除了上述种种院外活动外,尼克松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手段来达到他强化总统行政大权、占用部分国会立法权力的目的。他采取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行使否决权。对国会提出的法案,尼克松如果认为不满意,就拒绝批准,如关于对总统战争权利进行约束的法案就被尼克松采取此法否决过。二是发布咨文。按照宪法授权,尼克松在每年的 1 月至 12 月间向国会提出咨文以报告国会情况,咨文中包含了他的立法建议,有时甚至是草拟好的法律草案,这类法案通常容易得到国会的通过。三是发布带有法律性的指示、命令和训令。作为行政权力机关的首脑,尼克松经常向下级机关发布各种各样的指示、命令、训令,这些指示和命令的法律效力实

实际上与国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相等,尼克松充分利用这一点,并且经常超出调整纯粹问题的范围,对只有美国国会才有权决定的问题作出决定。

四、改组联邦打击官僚

精简和改组联邦机构是尼克松倡导的新联邦主义主张之一,早在1968年竞选中他就宣称:“从现在起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权力流向华盛顿的趋势将要被扫除”;“精简联邦制度,把一些权力转到州、地方和社区手中,这样的目的不仅使政府更有效率、更负责任,而且能集中联邦的注意力在那些只有联邦才能处理的职责上。”1970年大选前,尼克松对记者说,在今后的四年中,他的这届政府将以主张进行1933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不过,他解释说他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在那时,这或许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改革,……这会使政府比较精简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会使政府更加强有力一些,一个臃肿不堪的政府毕竟是软弱的,在处理问题上是无力的。”

尼克松执意要改组联邦政府机构,似乎是为了贯彻实行新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改变联邦政府集权的趋势,还权于州,还权于民。实际上他欲趁机给长期控制国会和官僚机构的民主党反对派来个釜底抽薪,新闻界对此反应最敏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70年11月11日以“尼克松对进行改组的意图”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他们把总统调整政府职责范围的这种方式叫做‘经营

管理层的革命’。他的目的是 :使政府按照他要求的方式工作。

“接二连三地对政府各个最高级职位进行大调动的意图是 :在他任总统的第二届任期里 ,理查德·尼克松下决心对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和政策指导。

“总统采用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受过四年尼克松工作方法训练的可靠的白宫助手安排在政府工作部门的关键职位上。”

在尼克松看来 ,美国正面临城市危机、社会危机及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其原因是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中 ,权力和责任集中于华盛顿 ,造成了一个运转不灵、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庞大官僚机构 ,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的所见所闻证实和加深了他对美国领导阶级所怀有的这种忧虑。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 ,甚至在工商界和宗教界 ,都盛行着一种很成功、很时髦的消极态度 ,依他看来 ,这反映出根本原因是他们丧失了意志 ,背离了传统的美国观点和态度。越南战争破坏了传统的爱国观念 ,从而使这个阶层得以完成其异化过程。当一个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都由于自己怀疑自己和犹豫不决而瘫痪时 ,除非把这些机构加以改革 ,替换或甩开 ,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存在下去 ,尼克松感到美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美国需要一种积极自豪的新意识和新精神。

这种新意识和新精神不同于传统的东部自由派权势集团历经“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延续下来一直到 1964 年的思想和意识 ,它是“新多数”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 ,将更能如实地反映全国的要求。他希望到 1972 年美国立国 200 周年新总统当选时 ,他已为美国开始建立起一个

新的领导阶级 ,这个积极的领导榜样会成为重新产生乐观主义的决断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和动力。

尼克松感到他在创造新意识和新精神方面能有所作为的机会到了 ,因为蝉联总统如愿以偿 ,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他感到美国人中的“ 沉默的大多数 ”主要以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为基地 ,从来就没有人鼓励过他们 ,在控制国家的关键机构方面同东部自由派上层分子作一番有力的竞争。如今他要进行一场“ 新的美国革命 ” ,要在全美国实现“ 新多数 ”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 ,要在第二任期内打破东部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控制 ,他准备利用总统的权力来做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 这将使那个权势集团大吃一惊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使我们能把政府置于控制之下 ,不让它变得如此庞大 ,以致会把个人完全淹没 ,破坏使美国制度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那种动力。”

尼克松深知其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计划将遇到来自国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强大抵制。首先是两党竞争将因此而更加激化 ,民主党的机构当然要抵制共和党的总统 ,何况他们提出的计划和纲领威胁到他们几十年来通过历届政府积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权力的特权。1970年 ,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共和党人 ,百分之四十七是民主党人 ,百分之三十六是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于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显然 ,对联邦政府机构的调整将招致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他们对尼克松政府所抱有的敌意肯定会因此而增强。其次 ,与民主党的势力相比 ,共和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控制力太弱。尼克松感到很遗憾 ,在第一届任期中 ,他的政府在一项基本工作上做得很差 ,而这项工作

无论对哪一党的新上任的政府都是最根本的工作 ,这就是 我们没有在各部和各机构的所有关键职位上都安插上忠实于总统和他的纲领的人。在这些由总统委派的职位上如果没有这种人员担任领导 ,总统休想动一动官僚机构 ,而这对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来说尤其是如此。

事实上 ,尼克松早已感受到了改革的阻力。第一任期内 ,他改组联邦政府的一切尝试均遭失败 ,国会和政府官僚机构对他进行联合抵制 ,尼克松被迫接受——国会不会进行任何重要的组织改革或自动地限制财政开支——这一现状 ,但这一方面更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 ,另一方面使他能作更多的筹划准备。如欲打破东部权势集团对联邦政府的控制 ,建立以西部财团为主的统治 ,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打一场包围歼击战。尼克松决定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第一是重新分配国家预算 ;第二是改组联邦政府 ;第三是打破旧的税收制度。当然 ,他的最终落点是对联邦政府进行大换班 ,为美国建立“新领导阶级”。

联邦政府权力的核心部位之一是国会 ,~~1964~~1964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失利意味着尼克松任职期间将始终面对着一个反对他的国会。到 ~~1966~~1966年 ,他对国会再没有耐心了 ,觉得它已变得碍手碍脚 ,无法驾驭 ,倾向孤立 ,在财政问题上不负责任 ,公开屈服于有组织的少数人的压力 ,而且过分听从舆论界的摆布。他认为 ,从他来到华盛顿以后的 ~~1965~~1965年中 ,国会已发生剧烈的变化 ,它与总统的分裂进一步加深 ,民主党正是在国会山上构筑了反对他的坚固堡垒。打击国会等于击中民主党的神经中枢 ,所以尼克松首先把矛头对准国会。~~1966~~1966年 11月 11日 ,他在第三届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

说：“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但如果你要有权，你就必须负起责任来，而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任的。”尼克松以如此方式向国会发出挑战信号，亦想采取先声夺人的手法，从气势上压倒对手。因为他成功地取得了连任总统的资格，在未来四年时间内，他要利用手中的行政大权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能够放开手脚干了，所以他计划迫使国会和联邦官僚机构公开站出来，在公众舆论面前，把他们的阻挠破坏和在花钱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等行为说清楚。

尼克松通过改革国家预算和税收来打击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及其幕后的东部权势集团。他知道，国会之所以能发挥很大的政治功能，关键在于它掌握了决定国库收支的大权，为联邦政府制定预算和管理税收。既然国会为民主党人控制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国家预算项目是自由派势力多年来逐渐增加的，它们为东部财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西部财团不但捞不到油水，反要付出高额税予以支持，尼克松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改组和削减预算项目，要求国会对联邦开支定一个最高限额，与此同时，他还对预算经费的来源——税收进行改革，提出税收分享计划以打破联邦机构对税收的钳制。此举直接触犯了东部权势集团的利益。作为国会议员，他们已习惯于迎合本选区和本党领袖的意愿就某一拨款计划进行投票，因为无论该计划怎样造成政府赤字开支，他们毋需对此承担责任而又能博得选民的支持，这种两面沾光的美差已成为一项非常舒服的特权。尼克松控制预算无疑是对这项特权的挑战，国会议员们不得不为自己能否再次当选而发愁，因为他们竞选连任靠的就是他们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多少联邦拨

款。对东部财团来说,尼克松的改革实际上是断其财路。多年来他们积极扶植国会中的自由派势力,通过遥控国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从大量预算项目中获取暴利,他们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自由派议员靠东部财团撑腰,东部财团借助民主党的国会谋利,他们彼此找到了利益的契合点。面对盘根错节的东部权势集团,尼克松从经济上卡其脖子,使它动弹不得,以便于把打击的重拳伸向联邦行政机构。

在他再次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早上,尼克松宣布行政部门的每一个非职业雇员都必须提出辞呈,通过这一惊人之举他向外界表示新政府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下决心要在第二届任期中打破东部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控制。他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要一个充满着“新多数”精神的政府,内阁成员,尤其是新成员完全有挑选他们第二届任期中的工作人员的自由。他计划把白宫的工作人员调一些到内阁各部中去,以确保他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他建议向西部和中西部去寻找新人来充实行政机构,他给下属明确了四条选用人员的标准:忠诚、宽厚、有创造性和有胆略。他还要任用工会领袖、妇女和在过去的政府中没有适当代表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

根据尼克松的旨意,新上任的预算局长罗伊·阿什和总统助理埃利希曼成立一个工作组,并跟宪法专家们一起研究,可以对政府机构进行哪些合法的改组。经过讨论,决定把内阁13个部中的六个部和几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组织起来置于四个总管理口之下: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经济事务口。由原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主管经济事务口,再从现有的内阁部长中选人分别担任其余三个总

管理口的总统顾问。这些人对主管的所有计划对尼克松负责。这种改组的目的之一,是减少官僚层次和提高工作效率。例如,某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城市改建计划为了要买一项建筑器材就要经过 苑个人签字。为了雇用一个人,有时需要五个机构和 缘个人签字才行。有九个联邦政府的部或局和 圆个其他机构都对教育计划负有责任。一个地方上的给水和排水计划要牵涉到七个不同的机构。在尼克松的改组计划中,主管各口的总统顾问将负责消除这种重复和无效率的现象。

大选后尼克松立即开展的一项工作就是大肆削减行政部门的人员。员年他就任时,总统行政办公室人员达 源人。他准备削减其中的百分之六十,大约有 源名倾向民主党的司、局长以上高级官员被撤职。尼克松如此大刀阔斧地改组政府机构和整顿人员引起了强烈的地震波,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就此作出评论:“尼克松所想做的是实际上把政府管起来,这是 苑年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试图做过的事。”最强烈的反对无疑是来自国会和联邦政府官僚机构,尼克松得到报告说,国会上的不满情绪是前所未有的,不久,他就被国会重新掀起的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缠住,最终被迫辞职。尼克松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在实行政府改组计划时操之过急,他没有估计到让白宫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内阁成员辞职这一行动会造成怎样令人寒心的影响,那些在大选中出过力的人们本来希望有一个机会来好好地尝一尝巨大胜利的滋味,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辞职的命令,他们非但没有很快受到总统的犒劳,而且反倒要担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了。

五、维持均势稳住苏联

处理美苏关系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长期全神贯注的中心问题。尼克松对苏联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这样几个认识基础上的。

第一,苏联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需要同它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同苏联人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新关系中,我们将能够诱使他们停止侵略。”退一步说,“美国和苏联之间如不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世界就不能有真正的和平。”

第二,不要盲目追求美苏两国的共同点,相反承认两国之间存在实质性分歧,美苏关系的核心问题不是要在两国之间取得一致意见,而是要设法减少分歧。只有“努力设法减少这些分歧所造成的紧张才是我们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第三,要与苏联实行清醒的缓和。“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是“把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结合起来使用”;“清醒的缓和,既要用胡萝卜,也要用大棒”。从实力地位出发,明智地进行谈判,要以谈判代替对抗。

第四,充分利用经济的有效手段,以利益作诱饵;“我们必须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可以给出去,或者收回来”;“我们使苏联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网越深,我们就越能增加和平对于它的利害关系——从而也就增强了促进它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因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尼克松与基辛格研究了跟苏联人打交道的方针——“连环套”。所谓连环套,就是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美

国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内的进展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其实质就是强迫苏联为从美国得到利益而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正是美国想从苏联那里得到的,从而正中美国下怀。以此来约束苏联,维护美国的地位。

尼克松对苏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议,限制对方进攻性武器的发展,以维持美苏间大体的均衡。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美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谈,达成《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还达成《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同时,在经济上给苏联一点甜头,达成《美苏贸易协定》、《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等三十几个协议。在谈判中,尼克松贯彻了连环套方针,把战略武器会谈同其他政治问题和中东等地区性冲突联系起来,同苏联进行讨价还价。如此,美苏关系一度出现缓和景象。

美苏缓和的主要内容是军备控制,缓和的重要途径是首脑会议。但尼克松认为匆忙、仓促的首脑会议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最后时刻的最高级会谈所能产生的结果,充其量只是一种“精神”,像约翰逊 1969 年在新泽西与柯西金会谈后的“葛拉斯堡罗精神”,或者是艾森豪威尔 1959 年与赫鲁晓夫会谈后的“戴维营精神”,都是虚幻的东西。首脑会议不能全是精神,而必须有实质性的东西。这就需要为首脑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要有对对方情形的了解。有外交行动上的进展。1970 年美苏首脑第一次会谈即是在美国打开对华大门,美苏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安排的。正像尼克松所说:“1970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议,是在 1969 年苏联人同意了柏林问题解决办法以后才安排的。我们认为,既然对

于一个猿年来一直困扰着东西方关系 ,有时甚至把我们带到战争边缘的问题 ,我们都能够达成一项协议 ,那么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

有人说 ,尼克松是踏着中国人的肩膀走向莫斯科的。尼克松承认 ,美苏最高级会议之所以最后成为可能 ,是由于两方面的成就 :在发表对中国接近的消息以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了进展 ;在发表该消息以后在解决柏林问题方面也获得了进展。这两个成就为首脑会议奠定了基础。

员年 缘月 日苏联首都莫斯科机场迎来了乘“空军一号”到达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迎接场面虽然显得冷清 ,但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见面 ,让尼克松感到还不无友善的气氛。勃列日涅夫直接了当地说 ,正在美国在越南加紧行动的情况下 ,这次会谈能如期举行 ,实属不易。这完全是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 ,才有这种可能。接着他说 ,苏联人民铭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 ,因为他是 员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而且他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这番话点出了苏美曾经有过的友好关系。尼克松接住话头说 ,他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以及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 ,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尼克松说 :“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尼克松可谓不失时机而又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他来苏的中心目的。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 ,争夺激烈 ,矛盾尖锐 ,至使各怀心计的两国首脑在走到一起的时候 ,其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玄机。当天 ,在 员世纪修建的葛拉诺维特大厅里

举行的国宴上,勃列日涅夫指着对面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的壁画说,那是当年的政治局。尼克松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此话引得勃列日涅夫大笑,双方握手示意。

第二天上午举行正式会谈。苏方参加人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尔内、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尼克松早已决定在这次首脑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使用坦率的调子,因此他一开始就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重冷战和反共出名的。我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不过同时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存和合作的。但是靠脆弱的感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下午,尼克松、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以及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举行了两小时会谈。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双方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是,苏联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苏联提出距莫斯科 1000 公里,美国坚持 500 公里,最后同意美国的要求。在限制战略武器的有效期上,苏联主张十年,美国主张五年,最后同意以五年为限。此外,美苏还达成联合探索太空的协定。

尼克松在苏联期间,还到了列宁格勒,参观了波斯卡尔叶夫公墓,那里埋葬着牺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枪炮下的几十万人的亡灵。尼克松为公墓里 18 岁姑娘丹娘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感动,在留言簿上写道:“向丹娘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

从列宁格勒飞回莫斯科后,尼克松向苏联人民发表电视

广播演说,谈到了无限制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阐明美国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描述了参观列宁格勒公墓的感受。最后呼吁要让丹娘的悲惨经历不再发生,让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和太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段结束语使勃列日涅夫“热泪盈眶”。

六、高瞻远瞩访问中国

1972年7月14日,尼克松以总统身份第一次出国,到欧洲作为期八天的工作访问。这一次远行最重要的是与戴高乐的会谈。尼克松对戴高乐十分尊敬,把他看作是20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说:“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与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算同共产党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同河内和北京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我们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

戴高乐作为一个极有远见的战略家给尼克松许多忠告,尼克松也丝毫不回避地说:“不论从我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戴高乐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而,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他告诫尼克松,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这种缓和思想中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影响导致的新的世界格局的模式了。戴高乐应尼克松要求谈到中国:“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

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尼克松深有同感：“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戴高乐为此说出他那句名言：“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这给了尼克松极深刻的印象，使他头脑中的中国观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尼克松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第一次提出是在 1970 年 5 月《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从长远看来，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 4 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这意味着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社会中来，是作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国家回来，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回来。”1970 年 5 月 20 日，尼克松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不久，对一家杂志重申：“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就像同苏联对话一样……我们不仅要注视着变化，而且必须设法促成变化。”他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7 月 1 日，尼克松又指示基辛格，竭力主张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尼克松对华关系有着想法，在戴高乐清晰简洁地点拨后，尼克松如获知音，两人一拍即合，互相佩服起来。尼克松从戴高乐身上一下

找到了灵感 ,表示“ 无论困难多大 ,也决心去北京 ”。尼克松微妙地透出了信息 ,对华巴黎秘密渠道自此建立了起来。

尼克松这个人真不可思议 ,他是一个靠反共起家出名的人物 ,如今却对大洋彼岸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如此讨好 ,是不是让人迷惑呢 ?尼克松一语道破天机 :“ 从 1949 年——1972 年期间中美两国间的敌意是政治的产物 ,而不是个人的产物 ,两国的敌视起源于民族利益的冲突 ,而不是民族文化的冲突。因此 ,随着政策改变 ,利益改变 ,敌视可以很容易地为尊重、亲切、甚至友谊所取代 ”;“ 大国是根据利害关系、不是根据感情行事的 ”。尼克松现在正处于这种形势和位置上。

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改变基于三点 (员)利用中苏矛盾 ,以接近中国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和牵制的杠杆 ,诱使苏联对美国让步 (圆)同中国取得谅解就很难结束越南战争 (猿)鉴于中国力量和影响的增长 ,中美对立的时间越长 ,美国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不利于美国稳定亚太地区的形势 ,更难集中力量对付主要对手苏联。显然 ,这要求美国在心目中 ,把苏联当作主要对手、最大威胁和头号敌人。由于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特别是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 ,美国需要联合西欧、日本和中国来抵御力量日益膨胀的苏联 ,以建立世界新的均势 ,重建和平结构 ,代替旧的已不适应国际新形势变化的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哲学的实质 ,也是他们感到必须改变对华政策的出发点。由此 ,他们提出的美、中、苏大三角战略才能构成。一个孤立状态的中国 ,与美国隔绝的中国 ,只能使世界混乱。尼克松已经看到了大三角均势是新世界格局的框架所在 ,脱离了其中一极的中国的世界是

不平衡的 , 可能导致危险的世界局面。尼克松这个典型的政客早就嗅到了新世界的气息 , 迫不及待地积极向改善对华关系靠拢。

尼克松对华政策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于要结束中国的“愤怒的孤独” , 第二个转折点的出现在于当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 直接把中苏的尖锐对立暴露在天下人面前时 , 尼克松和基辛格冷静理智分析后带来的对华态度的根本转变。

1969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分裂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震动很大。中苏边界上发生了双方军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 战斗达数百次之多。缘月和远月 , 苏联在边界一侧调集重兵 , 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美国的官员和专家围绕着谁是进攻者吵嚷不休 ; 然而 , 尼克松和我(基辛格)都认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有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 , 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但是 , 愿月中国新疆和哈萨克之间爆发流血冲突 , 紧张程度骤然升级。基辛格看一份详细地图 , 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 , 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这使他意识到 , 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愿月员原日 ,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 尼克松明确提出 : 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 ; 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 , 那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苏联对中国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 , 而且也会打破世界上的心理平衡。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 , 有了战略机会 ; 机会在于 , 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 , 这就要求它缓和以前对美国的敌视” ; 为了弄清楚这种可能性 , 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 , “如果我们行动太快 , 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我

们行动太迟缓 ,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苏美勾结 ,这可能驱使他们只好同莫斯科作现实的交易 ” ; 历史表明 ,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 ,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 ,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 ” ; 对苏联来说 ,我们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 ;但是 ,我们又必须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而刺激它对中国先发制人的战争。”从此 ,美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将苏联规定为主要威胁 ,把中国的独立存在当作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因素。

“ 乌苏里江冲突使一切朦胧不清消失 ,国际关系结构清楚起来 ” ,这个关系就是借助中国力量维持美、苏均势的三角政治关系。这就是对苏联打所谓的“ 中国牌 ”。基辛格有过回忆 ,“ 可以理解 ,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是三角外交 ” ; 这决不是一种想要挑拨中国去反对苏联的拙劣图谋。我们并不想玩弄 ‘ 中国这张牌 ’。中苏敌对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 ,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 ;事实上近十年来 ,我们对这种敌对的激烈程度根本不了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争吵都不是为了讨好我们 ;是因为它们吵架才向我们讨好。我们不能 ‘ 利用 ’ 那种敌对关系 ;是它们自相利用。如果我们企图加剧这种敌对关系 ,我们在其他方面就会造成损失。那样做反而会使北京感到不安。一谈起中国这张牌那就意味着 ,我们不打这张牌就要付出代价。中国人常表示一种恐惧 ,即我们与莫斯科打交道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时是拿北京作为牺牲。毛泽东警告我们说 ,不要 ‘ 站在中国的肩臂上去接近苏联。 ’ 任何想要操纵北京的企图都会驱使中国与我们疏远 ,也许会使它重新考虑 ,选择与苏联接近 ,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 ,任何想要玩弄中国这张牌的动机都会促使苏联人决心结束那场腹背受敌的恶梦 ,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 ,从一个方面出击 ,很可能是对中国 ,因

为中国比较弱 ,而且没有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以保护 ” ;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作均势。我们并不想与中国联合起来与苏联进行挑衅性的对抗。但我们同意有必要遏制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的野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想使自己在外交上多一些选择的余地 :北京想要摆脱文化革命给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 ,华盛顿则想加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 ,使国际体系的稳定少依赖美国的经常干预 ”。因此 ,到了 1972 年底 ,美国同两个共产主义的大国的关系慢慢演变成了三角关系了。尼克松并不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路就一定是反苏。他认为要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 ,不应把同主要共产党国家的接触局限于苏联。同中国的接近并不是美国想要赎 1949 年代后期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 ,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它并不是要勾结起来反对苏联 ,而是使美国以均等的地位用来从事建设性的目的——使两个共产党大国都能同美国保持较好的关系。这样一种均衡可以保证大国之间的稳定 ,甚至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实行合作。美国没有永久的敌人 ,对其他国家的判断 ,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 ,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三角外交给尼克松带来了对外政策选择的更大自由 ,处理事务也更为灵活 ,尤其是确立了政策的核心 ,为遏制苏联找到了最佳办法。这是三角外交带来的好处。此外 ,尼克松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越南。改善对华关系可以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的苦恼。尼克松一直以为中国是北越能进行战争的主要援助者 ,还有苏联 ,直到打开中美外交大门 ,才发现不仅仅这么简单。中苏冲突为河内获取援助提供了更大便利。河内通过对两国不同要求来考验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诚和中、苏

对越南的争夺来显示两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地位。但河内也有一个苦恼,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很多都要经过中国大陆由火车运输,因此,需要中苏之间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合作。中苏的不和给美国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还有助于平息国内的舆论,转移人民视线。这件事对全球和平前景的会意,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并且重新使人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所能够完成的事情,因而证明,美国“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够大胆而技巧地采取行动,以促进美国的目标和一切仰赖美国的人们的福利”。

但是,这一切并不都是尼克松一厢情愿。固然,三角外交中,美国得利不浅,对中国也有其益处。尼克松对此分析得头头是道。他指出,中苏分裂和中美打开外交大门,改善关系是形成全球战略平衡的两大外交事件。导致中苏破裂发生论战的原因,他以为,归纳起来不外是哪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应居第一位这个问题。苏联是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第二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苏联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后,其领导人要求中国在外交上也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因为中国需要苏联核保护伞的保护。苏联领导人也把核垄断当成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胁。苏联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国的保护伞,又是悬在它们头上的剑。因此,中国想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为奇的。中国人要求苏联给予技术援助,苏联开始时勉强同意了,后来索性撕毁了协议”;“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与苏联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关系都无异于向野蛮人叩头”。中苏分歧公开化了,直至发展到公开对抗。他继续分析,“由于中苏分裂,到了20世纪60年代

末期 ,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 ,而且被敌对的强国所包围 ” ; 中国的东北方是日本。它对中国并未构成军事威胁 ,但日本的经济力量可能在将来成为对中国的可怕的潜在威胁 ” ;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 ,日本曾入侵并占领过中国 ” ; 南面是印度。自从中国派遣军队参加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以后 ,周恩来对印度人只有蔑视而已。然而 ,他懂得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大国 ,有了苏联的支持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 ; 北边是苏联。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以在 15 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苏边境 ,苏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 14 多个师 ,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 ;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也认识到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 ,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 ,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 。 “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 ” ; 中国人有理由想同我们改善关系 ” ; 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 ,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稳——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 ,我们也需要他们 ” ; 我们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 ,而不是扩大分歧。中国领导人想要摆脱由于中苏分裂而使自己受到敌视和包围的处境。我们也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急于结束这种 ‘ 愤怒的孤立 ’ 状态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将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 ” ; 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表明的是 ,我们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对自己的利益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有保卫这些利益的充分决心 ,而能够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此外 ,必

须使中国人相信,作为一个社会,美国具有值得长期信赖的实力和精力”。所以,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为美中走近说教。当然他心里更加明白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地位相对衰落,是多么需要从战略和策略上改变对华政策。从美国全球利益考虑,美国非常需要中国以便遏制苏联,实现全球有限收缩,为美国重振争取时间,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新结构。“中国牌”成为这个格局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必然的。美、中、苏三角均势外交自此确立,尼克松主义实施的关键一环被圆满解决了,国际关系的大框架被奠定了。对此,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有总结:“北京需要借助于我们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它的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我们需要借助于中国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灵活性。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干预世界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始终参与世界事务的,但是,无论在物质上或道义上,我们的优势地位都不如以前了。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对华主动的精神还使我们的国家政策恢复了应有的比例感。”

从美苏两极对峙到美、中、苏三角均势,再到 1975 年 1 月堪萨斯城提出的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日本五极力量中心说,尼克松将其外交理论逐渐调整、改变、完善。尼克松主义也随之而更加完备。但不管怎么变化,对华政策始终是导致整个格局迈入新时代的关键。美苏是对头,西欧缺乏统一,日本只是经济力量赶上来了,唯有大陆中国才有能力确定新时代的基本格局。正是尼克松访华才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1974 年 7 月,尼克松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那就

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尼克松想在总统任内结束美中隔绝 20 年的不正常状态。无论从历史、现实和个人的角度来说,尼克松都感到了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就此而言,他不失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然而,理论归理论,现实是现实,尼克松在着手对华改善关系中确实是费尽心思的。

1972 年 7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尼克松一行庞大的七百人代表团乘飞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旅行。在喜庆的美国和企盼的中国之外,孤独痛苦的苏联难堪地看着这一幕;“很不情愿地处于三角关系中”等待时机。国际新格局就要到来,尽管它姗姗来迟。为了不使外交上出纰漏,基辛格两次受总统委托去北京做准备,还派出了由黑格率领的先遣小组做技术上的安排。白宫要利用电视收看的黄金时间对尼克松访华活动作充分报导宣传。特意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是 17 日上午 15 时 30 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 15 时 30 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历史时刻终于来临,尼克松许久以后还以那激动的心情回忆道: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

一个时代开始了。”

第三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外交领导艺术

亨利·基辛格(1928~),美籍犹太人,现代著名外交家和战略思想家;国际“级”大谋略家。1950年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系。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4年起致力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发表过大量有创见的著述,在美国朝野享有盛誉。1973年基辛格就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出任国务卿,并为福特总统留任,直至1977年政府换届。下野后,基辛格还就任里根总统的战略顾问,并作为专家和学者多次出访。197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

一、才华横溢摇不辱使命

1973年11月初的一天,在美国有名的皮埃尔饭店,刚刚在大选中获胜并即将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的尼克松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尼克松正式宣布他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高度评价基辛格:“多年来通过他的著作,在政府内的服务以及其他活动中,对国家安全事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尼克松之所以委基辛格以重任,是因为他觉得,基辛格在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能够针对七十年代动荡多变的世界形势,代替已经过时失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他不妨用来一试的摆脱美国困境、重振美国地位的唯一良方。

基辛格果然不负重任 ,他很快搭好了自己的班子 ,在白宫动手干了起来。

根据美国国会 1947 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 1949 年对该法的修正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 : “ 统一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 ,以便军队和政府各部、署 (局) 能更有效地合作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 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问 ,协助总统进行决策。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 ,是协助总统谋划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主要顾问 ,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主持它的日常工作。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杜鲁门在位时设置的 ,但无论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约翰逊 ,都没有使安全委员会起到真正的作用。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 ,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重视。尼克松发现基辛格是自己的忠实信徒 ,同他一样主张由强有力的少数人统治 ,一样不信任官僚机构 ,因此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 ,使它发挥重大作用 , “ 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最高组织 ”。基辛格无疑是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庞大机构复活的一个理想人物。在去皮埃尔饭店应聘之前 ,基辛格对这个决策机构急待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考虑很久了 ,他主张用一种防患于未然并预谋对策的办法来代替 “ 危机外交 ”。他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是最终处理送呈总统的所谓 “ 选择方案 ” 的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七个小组 (或委员会) ,它们是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处理一切重要问题的高级研究小组处理秘密情报的 100 号委员会、监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查小组 ,和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指导的情报委员会。所有这些有关军事、外交与情报的小组 ,都由基辛格负责来抓。 “ 国家安全

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 ,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在处理某一个问题(或应付某一“危机”)时先由一个在助理国务卿领导下的部际小组进行研究 ,确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分析各种不同行动方针的利弊 ,然后向总统提出报告。这个报告先要送到基辛格的手里 ,由他的班子加以核实情报、收集意见、权衡得失、作出取舍 ,然后提交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通过 ,总统点头批准 ,才付诸行动。此外 ,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上送给白宫的文件 ,都要经基辛格过目 ,由他决定轻重缓急 ,不管内容简繁 ,一律压缩到远页以下 ,加以批注 ,然后送交尼克松。

据《纽约邮报》报道 ,基辛格对于自己的职责 ,曾经归纳如下 :

“首先 ,我要向总统提供采取行动的最大选择范围。

第二 ,总统一旦作出决定 ,我要按照他的意图精神去贯彻执行。

第三 ,当他问到我的意见时 ,我有几分像顾问。”

《纽约时报杂志》也引述过基辛格的话。他说 :“我的职务是要向总统提供最大量的选择机会。我坚持每人的意见都得到听取 ,我没有涂改提交给总统考虑的文件的本。我把提出各种办法的人面前摆出的各种抉择、各种各样的意思 ,都收集起来后 ,我并它们综合起来。我也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判断。但是 ,我是公正的。”

话虽如此 ,可实际上这位总统助理在上交呈文、转述意见、提供选择、监督执行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由于他处

在美国这部庞大的军事、外交机器的总枢纽的重要地位，同尼克松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就不仅仅起一种咨询和协助的作用，而是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其实，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往往都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由于处理的问题不同才安上不同的名称。但是，很少有哪项外交政策不是通过这个精心设计的体制而后决定下来的。结果，由于基辛格控制了这个体制，他也就控制了决策的全过程。“人人向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一人向总统负责”，这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历来工作方法的一针见血的概括。正如卡尔布兄弟写道：“基辛格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比邦迪、罗斯托都大得多。尼克松发布的关于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把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的一切行政大权都集中于基辛格之手了。”

基辛格维护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做法，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解释说，总统“对组织工作有非常坚定的看法”，不想让副国务卿主持高级审查小组的是总统本人。把这项工作交给基辛格做，事情就简单多了，免得有时要否决一些决定。总统希望权力掌握在直接由他领导的主管外交政策的人手里，也就是说，他的顾问手里。明明讨了便宜的基辛格却又说：“我对组织机构没有什么定见，因为我认为总统怎么办都可以。”

事实上，基辛格认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不论组织得如何完善，总是会扼杀创造性的。它把明智的政策和完善的管理混为一谈。在现代国家中，通常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运转官僚机构，而不是去明确这些机构的目的。尽管基辛格总是偏重哲理，尼克松偏重政治，但他们不仅对于美国需要什么政策，

而且对于如何执行这种政策都有相似的看法。他们两者都爱好玩弄权术,都要求极端的可靠和绝对的审慎,都不相信局外人和不乐意分散权力。基辛格近乎本能地知道,只有他同总统和总统的政策合为一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控制政府机构,从而帮助整顿外交。因此他对总统毕恭毕敬,因为几个月之前他曾公开批评过尼克松,现在他要消除这个痕迹。要让基辛格把自己那种人所共知的自我中心感屈从于尼克松的自我中心感,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使尽他赖以青云直上进入白宫的浑身解数——动脑筋、多联系,坚韧不拔,讲求实际。皇天不负有心人,机遇加努力,基辛格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二、威慑制衡摇与狼共舞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进代。”尼克松在1972年1月22日的就职演说中说出这样一句话。几个小时后,苏联外交部就在莫斯科举行了招待会,新闻司司长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国际司司长基里尔·诺维科夫宣布,苏联已准备好就限制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问题“开始认真交换意见”。

华盛顿这个和解的调子和莫斯科那个和解的响应,使许多美国人满怀希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冷战政策和铁幕政策,对抗和冲突,花费了不知多少亿美元来发展核技术,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可怕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这一切,使这些美国人忧心忡忡,而现在,还有什么比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好的办法来开创苏美关系的新“纪元”呢?

事实上,美国前任总统约翰逊就曾打算在原订1970年初

秋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上开始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但是,在苏联的坦克和部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不得不取消了这次会谈。现在美国各界抓住这个机会,对新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它赶紧抓住苏联的这个倡议,实际上也就是把约翰逊政府未完成的事业接过来。

但是,这时无论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对于接过约翰逊政府那套未经考验的谈判方案就仓促去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都不感兴趣。不管有压力也好,没有压力也好,他们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先拖一拖再说,他们认为限制核武器至关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同苏联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的策略是以他们称之为“连环套”的思想为基础的。

“连环套”这个思想,是基辛格均势理论的最新运用。基辛格认为,要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有赖于在敌对双方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把一方的要求强加于对方。苏联却始终一直是这种平衡的潜在破坏者。就人口和核力量来说,苏联是唯一足以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国家——而且在一个正在奋力建立秩序的世界上,苏联一直是动乱势力的祸首。现在应该教育苏联领导人,要他们掌握如何使他们本国的利益同其他各大国的利益保持平衡的手腕。因此,美苏问题同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问题取得进展,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

基辛格对“连环套”的看法是广义的,带有一些哲学色彩,而尼克松则着眼于实际,着眼于具体问题。尼克松就任之前已开始认为,要实现越南和平和保持中东的安宁,关键都在于俄国人,他觉得克里姆林宫同那两个动乱地区有着明显的

联系。所以尼克松考虑的更多是某种外交上的以物易物,必须使俄国人相信,遏制而不是扩大局部战争是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这样,苏美就有可能跨入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

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加上尼克松一心想拖住莫斯科解决越南问题的念头,两者结合起来,便使“连环套”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莫斯科11月14日提出的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检验这项政策的第一个机会。11月16日,尼克松利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来宣布他对苏联关于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倡议的决定。他始终没有用“连环套”这个词,但在他讲话中多处包括了这个意思,至此,“连环套”这个方针,才作为美国新的谈判策略基础而宣告出笼。总统一方面拒绝了苏联要求把限制战略武器作为孤立的问题来谈判的倡议,另一方面又在俄国人面前指出举行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同美国一道使“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他提出了中东问题,还暗示了越南问题。

但俄国人的反应却很不满意。一国搞“连环套”就是对他的讹诈。在新政府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进行了一连串争论激烈的私下会晤。基辛格在见面时总是想开导这位苏联外交官,使他了解“连环套”的好处。但多勃雷宁却敬谢不敏。在他看来,“连环套”就是高压手段,就是强加于人,就是敲诈勒索。

为了使“连环套”能够顺利实施,基辛格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基辛格首先重新确认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布局”,由哈尔佩林和林恩领导的班子

编制出一张两个超级大国战略力量的对照表,果然证实了基辛格原来的直觉,使美国对苏联在军事上保持明显的优势在七十年代是办不到的。由于俄国人正在建造的类似“北极星”型的潜艇和比美国武器库中的任何一种类型都要大的洲际导弹,总统根本无法在七十年代实现美国以往曾对苏联保持过的五对一或六对一的那种优势。因此,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并使总统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充足“应代替”优势”作为美国军事政策的目标。

根据总统对反导弹导弹和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考虑和决定的背景情况,来拟定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的立场,是基辛格在准备工作中耗费精力最大的一件工作。在参议院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后才一天,总统就宣布美国将搞新的所谓“卫兵”系统反导弹导弹计划。起初基辛格并没有“大力支持”,他同学术界的许多反对者一样,把“卫兵”说成是“缺乏理论根据的武器系统”。但随即他就被总统的论点说服了:美国需要有一种新的武器系统上马,以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交易。在手下的帮助下,基辛格主持写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关于反导弹导弹的调研报告。虽然他认为不应仓促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他相信最终是会同俄国人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的。对于尼克松批准搞分导多弹头,基辛格也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一个原因是,他从来不相信单是武器这个因素就会引起战争,战争要归咎于人、政治和外交,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基辛格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对俄国人始终抱有疑虑。苏联一面呼吁举行新的武器谈判,一面继续扩充其核资源,怨导弹,这一点可能促使了基辛格支持搞多弹头的决定。

在以后的半年中,基辛格不断促使各个部门搞各种各样的调研报告,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谈判方案。为此,基辛格不断与莱尔德的国防部和罗杰斯的国务院发生争论,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准备的头三四个月完全是浪费时间。此时,基辛格那种“单枪匹马”的牛仔气派和“三头西西里骡子”的韧劲起了重要作用,他毫不让步,在争论中逐渐占居上风。到7月初,各种选择方案开始接二连三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核查小组工作进展,最后一个难题——如何核查那些无法就地视察的武器——得到解决。这样,基辛格终于认为,美国已经具备了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坚实基础。

1972年5月14日,总统和基辛格同多勃雷宁大使秘密会谈。由于这时中苏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俄国人也想回敬一个小小的“连环套”,通过莫斯科同华盛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合作,对中国人产生一种压力。缘天后,美苏同时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5月16日在赫尔辛基开始。

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是尼克松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核武器问题专家。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吉米尔·谢苗诺夫,是个德国问题权威。在谈判中,基辛格通过电报,重新强调“连环套”的重要性,其精神就是不准备急急忙忙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而是先做些试探,看看在政治问题上有无同时进展的迹象。为此基辛格运用了他的“积木组合”方法。代表团带到赫尔辛基去的谈判文件,里面竟没有一个具体方案,不过却有四个说明性的方案,全都是用作谈判依据。这四个方案内容广泛,从冻结进攻性武器到实际削减这种武

器的储存都包括在内。基辛格给俄国人提供了选择余地,可以从中任意挑一个。实际上他等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个方案你们最感兴趣?说得更具具体些,这四个方案中哪些部分你们最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捏在一起。”类似于儿童的积木组合。

使基辛格感到相当满意的是,俄国人很快就对限制战略武器的各种技术问题同美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972年12月16日,两国谈判代表休会度圣诞节。他们在联合公报中一致表示:“对于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双方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观点。”这一提法并非通常那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外交辞令,而是表明朝着对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取得相互理解迈出了真正的一步。

但会谈不久就陷入僵局而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俄国人不肯接受基辛格的“到此为止”方案。基辛格坚持谈判必须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两方面结合起来,方案建议:在进攻性武器方面,允许配置的洲际导弹的限额每方为 1000 枚,并完全禁止陆上机动洲际导弹。在防御性武器方面,用来保卫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反导弹导弹的限额应为 100 枚,要不就不干脆不搞什么反导弹系统。但俄国人却认为,凡是涉及到核威慑导弹的,不管是“到此为止”方案,还是任何其他方案,他们连听都不要听。由于苏方坚持只谈反导弹导弹问题,谈判完全停了下来。

直到 1970 年 12 月,波兰暴动使得勃列日涅夫决定对苏联的经济来一次大整顿。由于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贷款,勃列日涅夫考虑试行同西方缓和的政策。基辛格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建议尼克松,如果勃列日涅夫准备在诸如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等各种陷入僵局的政治问题上松动立场 ,美国就准备帮助他使苏联经济现代化。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分别授权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两人再作一番努力 ,以打破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随着勃列日涅夫摆脱了国内的政治困境 ,他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进行妥协。在第四轮会谈期间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多次秘密交换意见 ,俄国人改变了立场 ,基辛格和多勃雷宁终于取得妥协。俄国人接受美国的主张 ,把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在一起考虑 ;美国人则同意在包括某些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的广泛谈判中优先讨论反导弹问题。1972年 7月 9日 ,尼克松在电视里宣读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拟订的一则简短的联合公告 ,强调在两个超级大国以后达成的任何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互有关联。尼克松指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三、双向互动摇异中寻同

1972年 7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基辛格《论越南谈判》一文 ,文中为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依据 ,因而成了以后四年白宫所提出的有关解决越南问题一切方案的起点。在文章中 ,基辛格认为 :“谈判方式方法的重要性 ,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 ,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在一条轨道上 ,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 ;在另一条轨道上 ,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然后 ,等到两条轨道都达成了协议 ,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

.....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跟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就要到来的政治较量。

基辛格认为,美国毫无疑问已经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却不应承认错误一走了事。“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解决越南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改变了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为新的谈判代表。将由洛奇向北越人提出新的方案,集中体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在越南问题上的思想,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把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部队“共同撤出”南越。

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充分运用“连环套”的策略,在俄国人面前摇晃诱人的钓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贸易、缓和柏林周围的紧张局势、欧安会,吸引他们采取新的合作态度,使越南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第三步更为重要,那就是单方面把美军逐步撤出越南。这个计划除了尼克松之外,只有基辛格一人知道。

1972年头几个月里,基辛格对解决越南问题持乐观态度,这主要是基于(员)他以为可以说服俄国人帮助结束战

争,但事实并未如愿。(圆)他认为巴黎和谈的气氛逐渐缓和,但事实上北越人的态度始终是强硬的。(猿)他从南越获得的情报表明,共产党在南方的进攻现在已呈颓势。出席巴黎和谈的民族解放阵线高级代表陈宝剑作出了一个令人产生希望的政治姿态。(源)他认为“菜单行动”将对北越人产生一定的压力。“菜单行动”是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军事代号,更确切地说,是轰炸同南越接壤的柬埔寨境内十几里宽的狭长地带内的北越部队集结和出击基地。他相信这个轰炸行动不仅将阻击缘万北越军队进出柬埔寨边境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而且还将促使北越人在巴黎采取比较灵活的谈判方针。

“菜单行动”从缘年猿月愿日开始。到了缘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在缘月愿日,尼克松发表了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提出了解决这场战争的八项建议。过了几个星期,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南越撤军。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总统只要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但基辛格又一次犯了错误。

为了能在美国和北越代表之间建立起一种人与人的信任感,打破巴黎会谈的僵局,结束这场战争,基辛格劝说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联系。在总统访欧期间,基辛格从总统回国一行人员中小心翼翼地溜出来,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留下——名义上是向法国和北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情况,实际上是掩盖他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晤。同北越代表春水会晤的结果以及胡志明逝世带来的影响,使基辛格大失所望。河内领导人对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美国撤

军一开始 ,只会削弱、不会加强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 ,他们还认为这就等于表明美国的颓势已成 ,无可挽回了。到了 怨月 ,在美国第二批撤军之后 ,共产党方面把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通过胡志明小道渗透进来 ,迹象表明有可能在 员怨年年初对南越首都进行一次“真正的歼灭性打击”。几乎与此同时 ,在美国却发生了全国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

等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平息了这次反战示威活动之后 ,从莫斯科传过话来 ,河内可能又有意思进行认真的对话。基辛格抓住这次机会 ,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发出美国政府愿意和解的信号。到了 员怨年 员月底 ,河内终于对美国一连串的信号作出了答复。从 员怨年 圆月底到 源月初 ,基辛格先后四次去巴黎同北越代表黎德寿在首都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会晤。基辛格在这场持续很久的交涉的第一个阶段 ,极力避开那些不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 ,以便创造一个相互谅解的基础 ,然而黎德寿却毫不妥协 ,坚持要求南越阮文绍政府下台和美军全部撤出越南。到了 源月初 ,基辛格感觉到再继续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路似乎走到尽头 ,但随之产生的美军入侵柬埔寨事件 ,却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使美国与北越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基辛格担心 ,随着柬埔寨事件的发展 ,北越军在柬的庇护所越来越大 ,它就越有可能使在南越的美国遭到更大伤亡 ,结果几乎肯定会妨碍越南化计划 ,从而有使美军撤退放慢下来的危险。所以他支持了总统入侵柬埔寨的计划。因为对基辛格来说 ,在柬埔寨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个道德问题 ,而只是他下述理由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即有时为了推进外交事业 ,

实行武力政策是必需的。在这次柬埔寨事件中,他要看着美国对河内显示的它是以自己的军事威力来迫使北越放弃武力征服南越的梦想。

柬埔寨事件后,尼克松总统又任命戴维·布鲁斯坦任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双方在巴黎重新开始谈判。缘年缘月愿日,布鲁斯大使正式提出美国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全面方案。这个方案中最重要一点是建议双方就地停火,这是基辛格坚持的,另外还包括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等。北越人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容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他们仍然坚持美国必须先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许美国人“体面地”撤出去。

谈判又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僵局,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又一回合的军事较量——进攻老挝。基辛格起先对于在老挝作战并不积极,但也没有加以阻挠,但随着南越军队在老挝的胜利,他又有些想入非非:有朝一日让“善战的越南共和军”去进攻北越。

基辛格认为,邀战之后必有和谈。缘年春季和夏季,美国同北越先后举行了六次秘密会谈。第一次会议是在缘月猿日,基辛格提出的方案同先前布鲁斯的方案基本相同,遭到黎德寿的拒绝。第二次会谈中,黎德寿提出了九点和平方案,此后,双方就这九点方案不断谈判。到了苑月愿日,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达到了可以具体地衡量进展的地步了。此后,美国进一步作了让步,针对剩余两点提出(员)美国军队全部撤出的具体日期为缘年愿月员日,条件是必须在缘年缘月员日前达成一揽子原则协议。(圆)美国首先保证在

即将于 1968 年 11 月举行的南越总统选举中保持中立 ;其次 ,如果俄国限制对北越的援助 ,美国愿意限制对南越的援助。

谈判在一步步进展 ,此时基辛格非常乐观 ,他认为“ 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 ”。然而随着南越现总统阮文绍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 ,北越人在最后一次谈判中拒绝了基辛格的最新方案。他们抱怨美国所提的撤军日期太遥远了。另外 ,既然阮文绍在搞独脚戏选举 ,美国所谓的在南越大选中保持中立的保证是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现在才充分认识到 ,黎德寿一再坚持美国必须先要把南越交给共产党 ,共产党方面才允许美国从南越脱身 ,原来这话是算数的。基辛格同北越人正式谈判一直到了第三年 ,才最后抛弃幻想 ,弄清了河内的中心思想。原来北越方面一心要美国同他们一道把阮文绍赶下台。

显然 ,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基辛格本来以为河内会欣赏他的主张的合理性和方案的灵活性 ,而北越方面则以为基辛格会同意他们对阮文绍那场独脚戏选举的鄙视态度。北越人看到美国方面从原先的谈判立场步步后退 ,因此得出结论 ,认为美国有意在南越选举中抛弃阮文绍。其实 ,基辛格从未打算同黎德寿一起把阮文绍政权搞掉 ,他一贯主张打开某种不“ 硬性规定其发展方向 ”的“ 政治进程 ”。然而北越方面也是直到 1968 年 11 月最后一次会谈中才终于懂得 ,基辛格说话也是算数的 ,他不是寻求某种东西来掩盖彻底投降 ,而是在寻求真正的妥协解决。当北越人弄清了美国的真正立场后 ,他们就中断了谈判。他们不愿意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试试看能否掌权的机会而接受和平解决 ,他们要的是肯定能掌握政权 ,做到万无一失。

四、兵来将挡摇以强制强

基辛格并不是中东问题专家,但对大多数国际问题,他总是本能地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去寻求解决办法。中东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他认为,苏联和美国有义务设法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和解。再加上基辛格原来是德籍犹太人,民族情感使他时刻保持着对二战期间受苦受难的犹太人的同情和对战后以色列的深切关怀。早在五十年代末,基辛格就认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很有可能不久就要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约旦和黎巴嫩,创建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共和国,从而一举扩大纳赛尔的控制范围。这样肯定会促使以色列对开罗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那么苏联会立即支持埃及,美国则不得不支持以色列——结果势将引起这一地区出现大国对抗的局面。

1967年 6月,这种对抗局面差点成为现实。在埃以“六日战争”中,由于美苏双方的极大克制,大国才没有卷入战争。对尼克松来说,越南是最伤脑筋的事,而中东则是最危险的问题。所以他上任不久就将中东问题交给了罗杰斯和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1969年 6月末,美苏双方在华盛顿就共同方针问题达成了部分协议,最后解决方案中,规定以色列不得占有西奈半岛,但可以建立非军事化区。但苏联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肯让步,这使尼克松非常失望,虽然尼克松非常希望做成一笔交易——不仅为了中东的平静,而且还想为美苏在印度支那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等问题上达成协议创造出一个出色的范例,但他并不想拿以色列的生存作代价。

1970年 11月,由于以色列飞机对埃及腹地的导弹基地和其他军事目标进行了一系列闪电袭击,导致了苏联人的激烈

反应,他们不仅为埃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而且还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于是在源月初,尼克松不得不对中东政策进行一次更全面的审查,探索是否有可能再采取什么外交倡议,来制止该地区越来越剧烈的暴力行动。这样,由于苏联人卷入中东的新行动所造成的局面,使得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第一次正式负起了责任。

对于基辛格来说,中东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两层涵义的问题。一层是阿以争端,更上一层则是美苏之间可能发生对抗。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大局”上——即超级大国的战略、克里姆林宫的意图、力量的平衡,以及局部冲突引起大战的可能性等等。他认为,苏联和美国都不想在中东打仗,但是,由于两国站在中东斗争双方中的各一方,因此两国就有可能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苏联人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不管目的如何,从长远来看,总是对西欧、日本,也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基辛格有一种预感,如果阿拉伯的激进分子,在苏联人的怂恿下成功地接管了黎巴嫩和约旦,那么沙特阿拉伯的大量石油贮藏就有被左派夺取和控制的危险。其后,波斯湾那些盛产石油的酋长国,还有伊朗,也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以色列势将在一场恶战之后被赶入大海完事。西方从此休想染指中东的财富和战略要地,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也许就会无可挽回地转向对苏联有利。

基辛格在权衡利害关系之后,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力求达到加强阿拉伯力量中的温和派政权而不加强激进派政权的目的。应该力求把苏联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赶走。当然,基辛格的意思并不是指美国要用武力把苏联人从埃及“赶走”,但他乐得让这个外交谜语带着一点这样的含

意,它使苏联人又猜疑又担心。而基辛格的中心思想是,总有一天埃及人会看透国际环境中的某些征候,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来把苏联人“赶走”。事实上,两年后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苏之间的缓和气氛代替了早先的对抗情绪。埃及人感到被出卖了,于是就命令苏联的战斗人员撤出埃及,并驱逐了一大批苏联顾问。基辛格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在 1974 年 10 月,苏联人并没有认真对待基辛格和尼克松。他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故意拖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不合作的姿态,现在又在中东制造纠纷。他们开始侵犯西方在约旦的利益,引起一场一度超过越南问题的战争边缘危机。

1974 年夏,约旦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巴勒斯坦突击队组织在法塔赫的领导下,决心要摧毁侯赛因的亲西方政权,以便像利用黎巴嫩和叙利亚那样,把约旦也作为打击以色列的基地。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则决心要保持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的平静。即将爆发的约旦内战可能很快就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10 月 26 日,约旦的内战发展得更为严重,叙利亚的坦克也逼近了约旦边界。而在白宫,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果叙利亚坦克越过边界,美国要不要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用什么方式?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防止侯赛因崩溃,必要时就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他毫不怀疑,如果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苏联人的支持下推翻了侯赛因国王,以色列就会大举进攻阿拉伯人,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立刻就会受到威胁。但在具体如何干涉上,基辛格采用了西斯科的提议:美国如果直接干涉,从眼前看也许能挽救侯赛因,但从长远看

倒是害了他 ,使他在阿拉伯人当中信誉扫地 ,因此 ,与其用美国军队来救他 ,不如考虑用以色列军队来救他。

怨月 怨日 ,至少有 员辆叙利亚坦克已经越境进入约旦 ,局势越来越严重。那天是星期天 ,基辛格主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美国的对策。在这场错综复杂、极端严重的战争赌博中 ,基辛格统一调度军事、外交、政治各方面的全部活动。他守在情报室里 ,在总统的严密指导下指挥一切行动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士 ,摇身一变而为陆军上将兼海军上将的人物。

傍晚 ,消息传来。又有不少叙利亚坦克越境进入约旦。基辛格对苏联人十分生气。他们作了保证 ,可是说话全不算数。他建议美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 ,得到总统同意。首先命令 愿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 ,同时把这个消息有意识地透露出来 ,然后下令驻在西德的空降部队开往机场 ,经过高速公路时故意做得显眼些 ,为的是让苏联人明确无误地收到这个信号。在这个存心炫耀武力的过程中 ,第 远舰队实力扩大了 ,它的舰只徐徐驶向黎巴嫩和以色列。

在国内的讨论中 ,存在着两派观点。罗杰斯代表谨慎从事的一派 ,强调外交行动比军事威吓或军事行动更重要。基辛格则代表强调实力的一派 ,认为如果美国想保卫本国利益而不准备显示实力和使用实力 ,它在克里姆林宫、中东或世界各地就永远树立不起威信来。

怨月 圆日 ,伊尔比德落入叙利亚手中 ,约旦境内已有 猿辆叙利亚坦克。在约旦东北 ,伊拉克有 圆万军队跃跃欲试 ,准备干预 ,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还扣押着 缘名飞机乘客作为人质 ,像是准备采取激烈行动的样子。美国驻在西德的 缘个师

剑拔弩张,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第 远舰队所辖的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特混舰队,已由 圆支增加到 缘支。在此情况下,西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干涉。罗杰斯则建议对苏联人采取一种新的外交做法,如由苏美采取联合行动使该地区的激烈情绪平静下来。尼克松在基辛格和强烈支持下,否定了这个建议。很明显,在这个冒险赌博中,美国只有一个盟国——以色列。尼克松指示,由基辛格担任美方的主要代表,跟拉宾共同协调美以行动。这时公众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罗杰斯和西斯科身上,但是,无形之中,在舆论不知、国务院不觉的情况下,谈判一项在约旦危机中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空前秘密协议的重担,就悄悄地落在基辛格和以色列外交部长拉宾身上。

拉宾向基辛格介绍了以色列的全部军事计划。他每天向基辛格送两次最新的以方情报摘要。到了星期一(圆日),苏联代表沃隆佐夫拜会西斯科,暗示苏联可能改变态度,透露出苏联正在约束叙利亚,希望美国也要约束以色列。入晚,有证据表明约旦已经制止住了叙利亚军队前进的势头。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叙军入侵约旦受挫后会不会增援,没有同叙利亚部队一起越过边界的苏联顾问,现在会不会接到新的指示而随军南下。对此,以色列内阁作出了一项决定,如果叙利亚境内的剩余坦克向前推进,不管有无苏联人在内,以色列都要进行干预。

深夜,叙利亚又有一批坦克越过了边界,看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可能已在进行。约旦军队无力把叙军从伊尔比德撵走,侯赛因又一次发出“紧急救援”的呼吁,于是美国决心采取行动。基辛格和拉宾再次会晤。拉宾强调,以色列希望美国不介入中东战争,但尼克松必须保证,以色列军队开进约旦

或叙利亚时 ,美国将对苏联实行威慑 ,防止苏联干涉。基辛格向总统请示 ,得到尼克松的同意。美国与以色列的协议是明确肯定的 ,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以色列将对进入约旦的叙军发动进攻 ,如果埃及或苏联军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美国将对埃及和苏联进行干涉。局势太紧急了 ,把这一异乎寻常的协议写成文字的时间都没有了。两国分头同时行动起来。

以色列大批坦克向约旦河开去。在戈兰高地 ,到处可以看到备战情况。西斯科告诉沃隆佐夫 ,以色列有能力出动部队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决心把侯赛因从叙利亚和突击队的围攻下解救出来 ,也是毫无疑问的。

怨月 圆日 ,星期二 ,紧张局势突然缓和下来。在美以协作的保证下 ,侯赛因向叙利亚人发动了全面攻势。到傍晚时 ,叙利亚坦克开始调头朝北向边界驶去。在当晚的一个宴会上 ,沃隆佐夫在无人的地方 ,急急忙忙向基辛格强调说明 ,苏联正在尽全力制止叙利亚。而基辛格的回答则是 :“事情是你们和你们的受援国惹出来的 ,得由你们去收拾。”

怨月 圆日 ,星期三。叙利亚的最后一批坦克正在从约旦撤出。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停止的速度同当初准备行动时一样快。基辛格和拉宾握手相庆 ,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未经公布但很重要的协议 ,已经同约旦危机本身一起成为历史了。但是两人都意识到 ,他们已创出一个先例 :美国并没有同以色列签订正式防备条约 ,但同这个国家可以搞联合军事计划 ,甚至达到答应在苏联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时提供“保护伞”的程度。

五、斡旋穿梭摇中美言和

尼克松从总统候选人变为总统的时候,已经把新的对华政策各项要点综合起来了。他要设法跟中国领导人开始坦率的对话,目的在于使中国领导人同美国进行合情合理的会谈。1971年7月15日,北京电台广播中国外交部声明,建议早日恢复1959年7月15日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引起了白宫人员的注意。基辛格班子里和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1971年10月下旬可能恢复的中美会谈都兴高采烈。但当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中国外交官廖和叔以避难权之后,中国突然取消了原订于10月16日举行的中美会晤。

对于恢复会谈,基辛格并没有像他的僚属那样感到兴奋;对于取消10月会谈,他也没有像他们那样感到失望。在一开始,基辛格的着眼点是更长远更全球性的。他预料要出现一个五角的新世界——美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大),苏联(经济上脆弱而军事上是巨人),中国(人口上和地理上的大国,但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只依靠其潜力),日本(经济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宪法规定不准拥有军队),西欧(经济上不断增长但军事上依附于华盛顿)。在这样一个扩大的世界里,同中国接近可以有很大的好处。这可以影响苏联使其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从而缓和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那种在战后年代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僵持局面,可以造成外交变化的种种组合,看来是无穷无尽的。这其实是基辛格把古典的多极力量平衡体系引入到现代世界政治中的灵活运用,是他早期论文《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中所提的均势理论的实践。

1971年10月,基辛格正专心于一些眼前的问题——越南

战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西欧，因而他认为中国是次要问题，几年内大概不致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却改变了基辛格的态度，使他从尼克松政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的一个乘客变为一个司机——至少是副司机。

一方面，尼克松总统加快了同中国接触的步伐，他通过法国总统戴高乐、巴基斯坦的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将军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频频向中国领导人暗送秋波，并从1972年夏季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宣布一次同中国和解的单方面行动；另一方面，正好在美国对北京发出一系列信号的时候，中国人和苏联人在漫长的边界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珍宝岛事件，导致了这两个大国的同盟关系的瓦解。美国政府一度认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在愿月下旬邀请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就中苏对抗问题举行了一次无拘束的谈话。惠廷认为，现在正是历史上的大好机会。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处境的，它可以相隔10年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这个姿态。一时之间，太平洋大国可能来一个大改组的形势忽然变成了中心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形势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虽然基辛格的观点改变得晚了点，却终于成了发现新中国的当代马可波罗。

从1973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布拉格和华沙举行过多次会谈，但却没有真正交换过意见。现在，基辛格决定建立一条认真会谈的渠道，以结束那种“可怜无益费精

神”的局面。在 1954 月初基辛格打电报给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明确指出要他找到中国最高级外交代表,建议恢复华沙谈判。在 1954 月 猿日的一次招待会上,斯托塞尔向中国大使馆代办雷阳表达了这一意向。对此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准备,但还是接受了。1954 月 15 日,斯托塞尔和雷阳在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到 1954 年 1 月 15 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 1 月 15 日恢复。在此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发言人第一次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

会谈如期举行,气氛是实实在在的,双方都提出了互派记者、学生和科学家的新方案。但只达成了一个协议——1954 年 1 月 15 日再度会晤。基辛格对于这个虽然不大但是积极的成果感到高兴——某种渠道总算重新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一渠道曾因美军入侵柬埔寨一度被隔断,好在形势总体上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1954 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所做出的新姿态,和美国采纳“两个中国”方案、不再认为只有台湾可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这一重大态度的改变,都促使双方有了重新会谈的欲望。1954 月 15 日,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访问中国,给中国领导人捎去了代表美国发出会谈新信号的外交文书,在以后的两个月中,美中双方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通过巴基斯坦互相交换信件。而此后美国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遭到的失败却保证了打开中国的局面,它使毛泽东确信,美国在亚洲事务中代表一股退潮,而苏联则代表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两国首都之间的间接通讯几乎马上恢复了,由巴基斯坦转交的信件,其语调也由以前的含糊不清变得具体明确。到了 1954 年 1 月底,美国一位高级人士访华已

是势在眉睫了。

愿原年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希拉里将一封手写的短简交给基辛格。这是中美两国首都间最新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次秘密通信。这封信邀请一位“美国使者”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高级会谈,信中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罗杰斯和基辛格。基辛格无疑是最佳人选。

愿原年源月远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源月愿日,怨位乒乓球运动员、源位乒协人员、圆名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猿名记者走过了罗湖桥。这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由于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前来为一项外交行动执行打前站的特殊使命的,所以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在缘月和远月里,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研究了将在中国举行的秘密谈判中肯定会遇到的问题。基辛格又成为一名学者,他过着双重生活——在公共场合,他谈越南问题、苏联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正在成为新中国问题专家。

基辛格的访华日期定在苑月怨日到愿月。为了掩人耳目,基辛格“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从苑月员日起开始在亚洲作一次长途“了解情况的旅行”。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他利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安排,假装到郊外的蒂亚加利山庄休息,实际上却戴上墨镜和草帽,在巴基斯坦有关人员的掩护下,悄悄登上了巴航飞机,越过世界上最雄伟的山巅到达北京,前来迎接的是叶剑英元帅和黄华大使。

下午源点钟,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这是极

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因此基辛格受宠若惊,深为感动。两个人同时握住了对方的手,这是中美抛弃前嫌迈出的第一步。双方在会谈时达成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不急于作彻底的讨论。台湾问题只是简略提到一下。苑月 员日,基辛格给尼克松打了一个代号“尤莱卡”的电报,通知他说,这次访问很成功。从北京回去后,基辛格给总统起草了一份报告,非常高兴地说:“我替你和毛泽东共同翻开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苑月 员缘日,尼克松把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和他将于 员缘年 缘月之前访问中国的计划,在电视上向公众宣布,使得所有人大为吃惊。

基辛格前往中国是为了打破 缘多年来中美的隔绝状态,打通两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他获得了成功,他去中国是要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灵活的、建设性的新态度,他达到了目的,他去中国是为了压北越人,也是为了战略上制胜苏联而走的一步棋,他希望这方面也将收到效果。早在访华前,他已有了一点名气,如今更一跃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大明星。苑月 员苑日《纽约时报》给基辛格起了个“高深莫测的西方人”的雅号,说他“明里装得好像是成天只知出席酒会的贵宾,暗地里却在开展总统外交。这要求具有非凡的才智和惊人的腿功,要会装蒜,有时似乎还得会耍点魔术呢”。

员缘年 员月,基辛格带了一个“先遣人员”小组去中国,为尼克松的亲自访问做准备。基辛格和周恩来用了 缘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讨论世界形势,还用了 缘个小时磋商一项声明,这就是后来人们知道的《上海公报》。

员缘年 圆月 缘日上午 员时 猿分,尼克松及其大批随行人员抵达北京,猿个小时后,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会见

持续了近 11 小时。双方从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谈到美国总统选举。在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词中表明，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他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每天晚上社交活动后，基辛格都要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个草案。台湾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美国仍存在“两个中国”的概念，中国方面则要在公报中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后《上海公报》这样表达：“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从此，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却明显地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所作的保证已经丧失了信任。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评论是辛酸然而克制的，面对这一变化，却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东京，佐藤政府跨了台，苑个月后，他的继任田中角荣跟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西欧，态度是赞成的，但也夹杂着忧虑。在河内，是一片沉寂。

1972 年 7 月 11 日，基辛格私下会见记者时，对这次访问作了结论，说它不仅推动了当时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的一种历史进程，而且使每个人都有了“选择未来”的权力。他和总统

现在开始考虑莫斯科之行了。

六、舌战八方摇签署协定

尼克松 1971年 7月 15日宣布访华之后不到四个星期，苏联人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在 1972年春天访问莫斯科。基辛格又一次充当了外交先行官。1972年 5月 19日，基辛格乘坐总统座机飞赴莫斯科。这是一次秘密访问，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几项条款和一项共同的原则宣言达成了协议。这次访问在基辛格回国后才予以公布。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在 1971年 7月 15日美苏所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过失，就是没有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此外，基辛格还在幕后渠道里同意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苏联导弹部队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化将不作任何限制，这引起了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到 1971年 11月，当美国和苏联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第六轮谈判时，白宫改变了它原来对现代化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主张，想使苏联限制它的制造潜艇计划，并放慢改进其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质量。但苏联代表以 1971年 7月 15日的协议为由予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基辛格同尼克松只好再次利用幕后渠道来弥补已造成的损失。解决的办法是美国愿意为大宗出售谷物提供补贴，帮助苏联度过歉收之年，以换取苏联人在谈判中的让步。但基辛格和尼克松将来都不能透露此事，否则就说明先前的幕后交易中曾有失误，而且他们都将对苏联秘密购买谷物引起美国小麦价格上涨的丑闻负责。

在 1972年的前几个月里，基辛格一直亲自参与了悬而未

决的同苏联的谷物交易及其他贸易问题。在 源月底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苏中 ,也提到了贸易和信贷问题 ,但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坚持说 ,他不可能知道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粮食。

基辛格不仅是以粮食交易使苏联同意在最高级会谈中讨论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在这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时 ,他没有带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成员 ,绕过负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杰拉德·史密斯 ,独自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 ,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重新列入了莫斯科会谈的讨论议程 ,交换条件是 ,同意在双方代表团议定的临时协议有效期 缘年内 ,让苏联有权制造多达 远艘潜艇和 怨园个导弹发射器。而在此之前 ,史密斯团长曾多次反对基辛格搞这种幕后交易 ,基辛格向他保证 :“请放心 ,不会搞这种谈判的。”但直到 源月 圆日 ,即公开宣布基辛格访苏的前一天 ,史密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很明显 ,基辛格在这次美苏高级会谈的前后 ,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 ,一直对国内在演着双簧戏。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从来不信任官僚机构 ,而实行自己一人向总统负责制。由于尼克松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存在矛盾心理 ,对情况又缺乏了解 ,在莫斯科的所有关键问题都是由基辛格一手处理。如果他决定要在潜艇弹道导弹问题上作出让步的话 ,他就让步 ,如果他要把美国的让步说成是美国立场的胜利 ,他就这样讲。

基辛格这样做自己也有理由 ,因为在 源月间 ,尼克松认为如果他不对河内在南方的进攻作出反应就去莫斯科的话 ,他在政治上就过不了关 ;同时他还坚持 ,如果他去 ,就要取得完全的信任。基辛格则认为 ,如果他能搬掉潜艇弹道导弹问题这块绊脚石 ,就可以为尼克松访苏打下基础 ,尼克松就有希望

在莫斯科获得荣誉。这样尼克松就可以兑现他在 1970 年 7 月间的诺言。当时他曾宣布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冻结进攻性武器和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方面取得了“突破”。基辛格则可以不顾在越南发生的事争辩说,在莫斯科收获少些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义务。

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便同尼克松站在一起,为限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辩护,共同对付杰拉德·史密斯等人的批评。基辛格反击那些他明知是正确的,而且他确实曾用编造假情报予以破坏的攻击,这些假情报使在 7 月份的会谈中吃尽了苦头。其结果,史密斯尽管心里不痛快,但还是飞回赫尔辛基去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7 月 14 日,反弹道导弹的问题解决了,尼克松同基辛格在 100 多名记者的前呼后拥下来到莫斯科,开始了为期 10 天的美苏首脑会谈。尼克松的心情很好,他将弄到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基辛格则将再次证明谁才是总统的左膀右臂。双方高级官员都清楚,最高级会谈只是一个手段。会谈的敏感问题主要是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越南问题上,双方态度都比较强硬,尼克松要求莫斯科运用它通过供应军事所获得的影响,使河内三思而行,勃列日涅夫则要求美国扔掉阮文绍政府,接受河内“合理的”政治纲领。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基辛格和尼克松合作,对苏联人也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高举警棍,一个忙递香烟。尼克松扮演的是表现严厉的角色,在坚持了自己意见很久很久之后,突然提出与自己原先的立场极不相同的“大胆的新建议”;而基辛格则相反,显示出一副愿意花大本钱的样子,要钱给钱,必要时也要命也行,为的是在交易中取信于人。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完全控制了新闻界,这在华盛顿是办不到的。报纸的头版和广播电视都是重复他们的讲话。外人,甚至国务院的翻译都不能参加谈判会议。翻译工作都由苏联人担任。基辛格没有带任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专家到莫斯科,甚至也没有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去,坚持由他一个人进行谈判。所以尽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还在全力以赴阻止基辛格对苏联人的让步,即允许苏联的现役和正在制造的潜艇及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数目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数,但杰拉德·史密斯同他的专家都不许到莫斯科来,他们只得心烦意乱地通过海底电缆监听会议情况。史密斯自己也明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实际上在莫斯科最高会议之前就已达到,剩下的只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而且远不是总统的知识范围以内的事。

在谈判过程中,基辛格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一方面,由于他在源月间向勃列日涅夫作了让步,并为了向国内解释而编造了有关苏联武器的一些不真实数字,而苏联领导人现在却不肯作任何让步,他们坚持要以基辛格编造的潜艇数量为准。另一方面,除了史密斯及其成员在不断地反对和纠正基辛格的方案外,五角大楼也有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黑格提出了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不满意意见,好像准备要放弃他们郑重支持过的要在冻结进攻性武器中包括潜艇和潜艇弹道导弹发射器的条件。面临失去右翼支持的基辛格转而求助于尼克松的保护。尼克松当然明白,如果闹分裂的话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不支持自己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那么就会在国内引起破坏性的政治后果,但他告诉基辛格:如果五角大楼不愿干的话,就按着我们自己的条件缔

结一项协议,不必去管什么政治后果。”尼克松的信任使基辛格勇气倍增,他对黑格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也严厉批评了史密斯。

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是在 缘月 圆日签署的。史密斯在作最后的努力来改变潜艇弹道导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在这天中午基辛格发来电报说,问题都已解决,并要史密斯当晚赶往莫斯科参加签字仪式。显然这是基辛格害怕史密斯节外生枝才在最后一刻通知他。当史密斯同他的人员飞到莫斯科时,没有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接他们,以至史密斯差点赶不上新闻发布会。而当史密斯在会上就记者关于潜艇弹道导弹问题作回答时,基辛格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并宣布在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以后,他将再次接见记者。这其中除了害怕史密斯有什么不合作的言论,将记者招待会搞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基辛格的肚量有些狭小,害怕史密斯分享他的功劳。

美苏首脑会谈除了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外,还签署了其他协定,如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污染控制、医药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协定。同时,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扩大在若干科技领域里的合作。此外,还商定进行一次联合的空间轨道航行。最后,双方签定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共同遵守的 缘条行为准则。美苏之间的这种缓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双方的军事力量暂时达到平衡时,谁想运用实力来取得好处都不大可能,于是就看能否利用缓和来维护各自的利益。就战略武器本身来说,基辛格的让步可能使美国受到了损失,使苏联走到了前边。但就美苏首脑会谈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来说,基辛格无疑是有他的贡献的。

七、夜空茫茫摇明星闪亮

1970年 7月 25日晚 ,尼克松竞选班子总部的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同 数名工作人员一起 ,携带无线电对讲机、照相机和电子窃听器 ,悄悄潜入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 ,偷拍了民主党的档案和秘密文件 ,并在暗处安上窃听器 ,准备偷听民主党首脑在屋里密谈竞选策略的谈话内容。不幸的是 缘人都被当场拘捕 ,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

在大选之前 ,事情被暂时搪塞过去。自 1970年起 ,美国政府、司法部门和国会先后组成了十多个机构围绕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和审理。在调查和审理过程中 ,查出了在总统竞选运动秘密捐款中的许多非法活动 ,揭出了挪用大笔竞选基金供掩盖水门事件之用 ,并且还暴露出了白宫与中央情报局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大搞窃听电话和其他特务间谍活动。司法部门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 ,要求对白宫人员 ,特别是尼克松的左右手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进行传讯 ,甚至要求尼克松本人出席作证。

基辛格是尼克松的重臣 ,但不是尼克松的心腹。他同尼克松的关系 ,是从尼克松 1969年初当上美国总统才开始的。他为尼克松效劳 ,不是出于党派利益或与尼克松的私交 ,而是为了实现他的谋略和政治抱负。这一点 ,使他和米切尔、霍尔德曼及埃利希曼这些跟尼克松交往多年的心腹人物有很大不同 ,因而也成了使他免于卷入水门事件的重要原因。

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初 ,基辛格对它并不在意。尼克松连任总统之后 ,基辛格觉得美国国内外的情势表明尼克松地位的稳固和美国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展 ,会使他有可能进

一步推行他的外交计划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在未来四年内“ 会有一个极富有创造性的时期 ”。可是 ,随着水门事件真相的逐步揭露 ,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的扩大 ,基辛格也受到了冲击 ,他对这一事件不得不关心起来。

1974年 9月 10日 ,基辛格在纽约华道尔夫—阿利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美联社年度午餐会上 ,向报界谈所谓“ 欧洲年 ”的问题。有人在会上递条子要他讲讲水门事件 ,而且问他 ,水门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哪里。

“ 我晚上的活动经常有很好的证明人 ,可以证明我不在作案现场。”基辛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碰到这样的挑衅性责问 ,有点发火了。

不过 ,他当时还不了解水门事件的全部真相 ,尼克松本人和他的白宫助手也没有给他讲过实话。因此 ,他是相信尼克松的态度和立场的。基辛格在会上严肃地表示 :“ 我毫不怀疑 ,总统将像他公开说的那样 ,坚持揭露全部事实。做到了这点 ,这个人间悲剧也就结束 ,美国将继续前进。”

基辛格固然对水门事件不以为然 ,但他对民主党和报界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而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搞法也很反感。他在会上责问道 :“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经得起一场互相攻讦。我们是否应记住 ,危机无论多大 ,美国还要长此存在下去的。”他的意思是 ,不应为了党派之争的利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

可是 ,有东部财团背景 ,当时正热衷于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在第二天报道基辛格这次重要外交讲话时 ,却对“ 欧洲年 ”的问题一笔带过 ,而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基辛格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内容。虽然这使基辛格很生气 ,但事

后证明 ,他的“ 欧洲年 ”计划倒真的成了水门事件的牺牲品。尼克松在年内访问西欧的计划 ,也因为水门事件越闹越大而告吹了。

到了 缘~ 远月间 ,水门事件又进一步波及到基辛格。尼克松的一些敌手通过《 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和《 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纸 ,公布他们所称为的联邦调查局材料 ,指责基辛格在 员怨年 缘月到 员猿年 圆月期间 ,曾经下令对白宫的 员猿名高级官员和 源名记者进行窃听电话活动 ,侵犯了人权。与此同时 ,在水门事件上一口咬定尼克松有罪而主张对他进行弹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也支持对基辛格的这一指控。这些行动的用意 ,是想借此给与水门事件无关的基辛格抹黑 ,把他攻倒 ,或者逼他引退 ,从而挖掉尼克松政府的墙脚 ,使尼克松陷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基辛格对此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他一再声明 :“ 五年半来我一直设法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为政府服务 ” ;“ 我不像搞阴谋那样执行我的职责 ”。他表白自己并未直接下令进行电话窃听 ,只是由他的办公室提供了一份能够阅读机密文件的人的名单 ,而其中有一些后来电话被窃听了 ,但这和他本人并无什么直接关系。基辛格的这种澄清 ,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国会两党的数十名议员联名发表声明为他说话 ,认为基辛格的“ 正直和诚实是无可非议的 ”。

由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问题上遭到猛烈的攻击 ,处境日益恶化而越来越自顾不暇 ,需要借外交活动来掩盖自己的困境 ,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中的权力和地位 ,反而随着水门事件的演变发展而更为巩固加强了。员猿年 怨月 圆日 ,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 ,一方面是缓和一下白宫与国务院以及

国会之间久已存在的步调不一和牵制脱节的矛盾,争取国会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让没有牵连在水门事件中的基辛格来掌管国务院,借基辛格几年来在外交事务中博得的“名声”来转移一下美国朝野的注意力。

基辛格在 1973 年 1 月担任国务卿之后的半年内,出访了 15 个国家,飞行了 15 万英里。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中东穿梭外交活动期间,他差不多三天两头都要发表讲话,谈论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谈论。1973 年 1 月 10 日,有一个记者在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上问道:由于尼克松“受到水门事件的挑战和复杂情况的困扰,你作为国务卿是否正在以一种比你在头四年当顾问时较独立的方式执行着政策?”

基辛格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宪法规定,执行对外政策的责任在于总统,国务卿必须是总统的代理人,否则他什么也代表不了。……因此,我完全反对那种认为我在试图推行一项独立的政策的说法。”

尽管基辛格如此解释,可是实际上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基辛格从事的外交活动越是繁忙,他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动作用越是明显,他同尼克松之间的密切磋商越是相对地减少。例如,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 1973 年 10 月 1 日晚才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是没有尼克松在场的。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内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基辛格已成了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统。《基辛格》一书的作者卡尔布兄弟认为,在 1973 年的前几个月里,基辛格“几乎成了唯一能站出来替那个被水门事件搞得狼狈不堪的总统撑腰的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是颠倒得有趣,

尼克松手下一介书生 ,竟成了护着总统不让人家拉下台的最
后一座‘堡垒’了”。

到了 愿年 苑月底 愿月初 ,水门事件的案情已经急转直
下 ,水落石出。苑月 愿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讨论对尼
克松进行弹劾的决议 ,接着 ,弹劾之声很快在华盛顿传了开
来。

在最后的几天里 ,基辛格的心里是非常焦急和复杂的。
他看到尼克松大势已去 ,却又对他的进退无能为力 ,某些程度
上也是为了不把自己卷进去。只是在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
军向他透露尼克松由于交出有关水门事件的三盘录音带而非
下台不可之后 ,基辛格才如释重负。因为他这时可以解脱自
己对尼克松个人的忠诚和情分 ,而仅仅效忠于他自己的职务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了。

愿月 愿日晚上 怨点 ,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
向全国发表宣布辞职的电视讲话。第二天上午 愿点 猿分 ,
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收到了由黑格交来的尼克松的辞
职信。全文只有三行 :

亲爱的国务卿先生 :

我谨辞去美国总统职务。

理查德·尼克松谨上

至此 ,水门事件才告平息。在水门事件中 ,尼克松既是基
辛格的顶头上司 ,又成了他必须摆脱的一个包袱。据说“基
辛格在促使尼克松作出辞职决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方
面固然是为总统考虑 ,辞职可以避免参众两院的弹劾 ;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基辛格强调“需要尽快结束危机 ,否则美国对外
政策将受到严重损害”。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身败名裂 ,而基辛格却硕果仅存 ,像卡尔布兄弟说的那样 : 在那被水门事件搅得昏黑的天空中 ,这颗彗星反倒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了。”

这一连串的戏剧性的变化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愿月 怨日下午 ,在尼克松离开白宫之后不到两个小时 ,福特宣布继任美国总统。他说 : “ 我们国家长期来的梦魇过去了……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

这位新总统的第一个任命 ,就是要基辛格当他的国务卿。

第四章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领导艺术

丘吉尔(员愿源原员缘缘) ,英国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保守党领袖之一。毕业于哈罗公学和桑赫斯特军事学校。员缘年起在部队当军官 ,多次参加过殖民战争 ,镇压过印度、苏丹等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起义 ,同时兼为报刊撰稿。员愿怨原员愿年英布战争期间 ,任驻南非军事记者。员愿年转入自由党。员愿年再次当选下院议员(自由党)。同年出任副殖民大臣。员愿愿原员愿年任贸易大臣。员愿原员愿年任内政大臣。员愿员原员愿缘年任海军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员愿年参加了安特卫普保卫战和大撤退 ;员愿缘原员愿年达达尼尔战役时为该战役的组织者之一 ,后因此次战役失败而辞职。员愿年任军需大臣。员愿原员愿年任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员愿原员愿年任殖民大臣 ,致力于加强英国殖民军队和建立基地的活动。二十年代重返保守党 ,自 员愿年起至去世 ,一直任保守党议会议员。员愿原员愿年任财政大臣。员愿原

1914年从事新闻工作。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18年怨月任海军大臣,1920年缘月出任首相。1921年苑月,英苏签订了关于对法西斯德国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1924年缘月又签订了对德战争同盟条约。出席了德黑兰会议、克里木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29年大选中工党获胜后,其内阁辞职。1931年缘月再次出任首相。1935年下台后,退出政治活动。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国民族史》、《世界危机》等著作。

一、初涉政坛摇欲擒故纵

丘吉尔在1900年至1904年期间的南非征战,不仅使他写出了两部书,而且还为他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

英国首相——保守党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于1904年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明白,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对布尔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英国人虽然占领了布尔人两个共和国的首都。但布尔人仍采取游击战伺机骚扰,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着。

保守党人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便利用英布战争期间席卷全国的沙文主义狂热举行议会选举,以便攫取更多席位。他们在演说中提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

在这次下院选举中,丘吉尔是保守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一。这一次仍然是以前的那个奥德姆选区提他作候选人。丘吉尔是作为一位“战斗英雄”参加竞选的。在竞选中,保守党充分利用他的越狱经历进行宣传,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歌唱家在音乐厅为他颂唱赞歌。保守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也亲临奥德姆选区给予支持。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

公爵也随张伯伦来到奥德姆,他答应为丘吉尔出 源万英镑作为竞选费用,并许诺每年向当地的保守党组织机构捐款 员万英镑。丘吉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终于赢得了这次选举。虽然胜利是勉强的,他仅仅获得 员万票的多数,但重要的是他进入了议会——进入了英国政界的大门。

丘吉尔进入议会后,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表自己的首次演讲。

丘吉尔一向喜欢在社交场合夸夸其谈,并经常会因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妄加评论而遭人讥笑。但是,在上流社会的宴会上闲谈是一回事;在议会中发表演说又是一回事。作为议员的首次演说,必须要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

议员们对逝去的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记忆犹新,所以都很关心他的儿子在下院的首次出现。他们看到年轻的丘吉尔第一次坐在父亲辞职前坐过的位置上,一个紧靠前排、挨着过道的座位。他们看到他伸展双腿懒洋洋地坐着,大礼帽扣在前额上。呆了一会儿,他把伸直的双腿搭在一起、双手插进口袋,然后以一种沉着、冷静的眼光环视左右,这种姿态不似一位刚出道的议员,俨然一位最有资历的议会领袖。

按照议会的老传统,新议员到下院后不能马上发表演说,他们至少要经过 员个月的时间才能发表演说。但是,丘吉尔不肯服从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仅仅过了 源天,他就踊跃地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把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问题,作为自己首次演说的题目。他选择这个题目是对的,因为这是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他非常熟悉的问题。保守党主张把反对布尔人的战争进行到底并继而严厉地对待他们。但丘吉尔的这次演说却主张

以较温和的态度对待战败者 ,因而他的主张与保守党的路线背道而驰。

演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得到了议员们的热烈欢迎。下院里两方面的人——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为丘吉尔鼓掌。但是 ,保守党的领袖们却紧锁眉头。约瑟夫·张伯伦在听完了丘吉尔的演说后 ,对邻座的人耳语道 :“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丘吉尔很早就懂得 ,出色的演说本领是政治家平步青云的重要资本 ,他为了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丘吉尔的演说刚劲有力主要不是由于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 ,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丘吉尔的演讲才能表现得愈加突出 ,他最终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出类拔萃的演说家。

由于丘吉尔学识有限 ,他所受的教育比较肤浅并且是断续的 ,无论是在他政治生涯的初期 ,还是在政治生涯的末期 ,他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比较明确、比较系统的哲学观点 ,对于经济和财政问题他也几乎一窍不通。但丘吉尔一生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 ,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无论是在政治方面 ,还是在自己大量的创作中 ,他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这种杰出人物的作用。他在议会的初期活动也体现出这种信念。

丘吉尔继承了他父亲在议会中施展过的策略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他父亲使用过的口号。他从“左”的立场出发 ,攻击自己党的领袖 ,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左派” ,不过是以此为伪装 ,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他在下院关于英国

和布尔人战争的首次演说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的。此后不久,丘吉尔又从这个立场出发攻击政府提出的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

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根据英布战争的经验,以政府的名义,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建立 20 个军团,其中 10 个军团处于完全备战的状态,以便随时把它们派往国外。陆军大臣陈明理由:“我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强国,我们应该设法继续保持这种地位。”

这项法案的提出是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从当时看,大英帝国所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极其活跃,英德矛盾日渐扩大,世界局势也朝着大战的方向发展。保守党曾试图同德国签订协议,但未能如愿。保守党据此认为,德国不愿与英国和解表明它对大英帝国的仇视正日渐加深,所以应积极准备建立反德同盟。在上述情况下,扩大和改组英国军队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但是,丘吉尔却坚决攻击布罗德里克的法案。

丘吉尔反对改组军队的态度同他的本性是非常矛盾的,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一个赞成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了,他认为管辖殖民帝国是英国的义务。为此,他曾参加了印度西北边境、苏丹和南非的军事行动。政府关于建立更为强大的军队的建议纯粹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如果丘吉尔不是出自个人向上爬的目的,那么,他反对上述建议的态度就无法解释了。

他的个人目的,首先是,他需要向政府表明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政府应该重视他;其次,他试图以人民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以此在群众中树立威望,提高自己在党的领袖们心

目中的位置 ,最后 ,他抨击了布罗德里克也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复 ,因为他们曾经毫不客气地把他的父亲从政治舞台上推了下去。

丘吉尔要按照自己设想的进攻方案同布罗德里克进行辩论 ,首先需要一些数据。可他由于一直厌恶数字和与此有关的一切(当然 ,自己的收入除外) ,根本计算不出军队的开支。于是他聘请了弗兰西斯·莫华特先生帮他。值得一提的是 ,在丘吉尔的一生中 ,无论是准备公开演讲还是写作 ,他都得到很多专家的帮助。人们可能会对丘吉尔在一生中写下内容如此丰富、数量如此宏大的书籍、文章和演说稿感到困惑不解 ,解答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善于借助专家的帮助。

莫华特为丘吉尔提供了有关的数据、资料和证据。这样 ,丘吉尔与布罗德里克辩论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丘吉尔矛头直指布罗德里克的法案所要引起的增加军队开支的问题 ,他暗示 ,从军队开支中节省下来的钱应该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他诘问布罗德里克 :“难道国内已经消灭贫困了吗?”同时 ,他还不失时机地提醒说 ,他的父亲也曾经反对过增加军队的开支。

丘吉尔还把自己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演说稿印成小册子 ,四处散发 ,大肆渲染。

改组军队的方案在议会内外讨论了两年 ,终于被推翻。丘吉尔也初次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出众才智和潜在素质。

二、纵观全局摇改换门庭

1905年 10月 10日 ,保守党领袖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全部辞职。政府内部的大辞职迫使巴尔弗首相重新组织政府。

这对于年轻的丘吉尔来说 ,是一个决定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巴尔夫在组建新政府时并没有考虑丘吉尔 ,他明显地轻视丘吉尔 ,他把政府内的一个大臣职务交给了一位和丘吉尔一样年轻 ,但才华和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保守党政治家鲍纳·劳。

面对希望的破灭 ,丘吉尔纵观全局 ,决定另谋高处——脱离保守党 ,投奔自由党。

丘吉尔早年曾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玩弄政治是最好的赌博。”现在 ,他决心在政治上赌一把。

实际上 ,在英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 ,从一个党跳到另一个党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丘吉尔投奔自由党也并非由于政治原则发生分歧 ,而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考虑。当时 ,保守党领导层中的形势是明摆着的 ,他要是留在保守党内 ,未必能够青云直上 ,因为在保守党内取得权力的道路被塞西尔和保守党内其他青年活动家们所堵塞。与此同时 ,自由党内的道路却是畅通的。这是对丘吉尔改变政治路线 ,从保守信念转向自由信念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丘吉尔离开保守党经过了几个阶段。

1905年 10月 ,他在发言中开始猛烈攻击保守党的政策。一次他在演讲结束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感谢上帝 ,我们还有一个自由党!”1905年 11月 ,他开始自称是“独立的保守党人”。他的发言变得越来越“左倾”。他的转变引起了保守党人的不满和愤慨。有一次 ,当丘吉尔从座位上站起来要发表有关关税问题的演讲时 ,大部分拥护政府的人士在首相的带领下离开了会场。然而 ,他的演说得到了自由党人 ,特别是大卫·劳合·乔治的热烈欢迎。1905年 12月 ,丘吉尔正式与保

守党断绝了关系。在这之后 ,有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他们那里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代表。然而 ,他对这些建议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清楚 ,如果想往上爬 ,而且要爬得很快 ,就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他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 ,他决定义无反顾地投奔自由党。

丘吉尔在刚刚转到自由党阵营后曾对查尔斯·迪尔克先生说 ,他并不同意自由党的某些观点。迪尔克听后严厉地警告他 :“丘吉尔 ,你应该检点些。家鼠离开下沉的船舶只能一次 ,不能再干第二次。如果你想这样干两次 ,那你就将完蛋。”迪尔克的警告并未阻止丘吉尔以后的投机行为 ,四年后丘吉尔做出了令人咋舌的事情 :他第二次离开了下沉的船舶 (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船舶) ,并且基本上成功地再次出现于保守党内。

丘吉尔在与保守党断绝关系后 ,开始阐述自己新的政治观点。一九四四年 缘月 员远日 ,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 ,在他的演说中主要贯穿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他想方设法痛骂保守党并证明该党损害人民的利益。他把保守党称作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 ;在国内贪赃受贿 ,为了掩盖这种恶习在国外发动侵略”。

他指责 ,保守党的政策“对于百万人民来说是昂贵的粮食 ,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丘吉尔以形象的比喻抨击保守党试图推行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他手拿一块不大的面包(约四分之三英镑重)来回晃动对群众说 :“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 ,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小面包。”随后 ,他又拿起一块大得多的面包(约两英镑重)说 :“如果保持自由贸易 ,

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大面包！”其次，丘吉尔在必需进行重大社会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了一些含糊的主张。他说：我们应该明确声明，在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凡是个人特权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地方，社会利益应该优先……我们应该朝着美好的、组织得更加公正的社会前进……这种社会将代表着光辉灿烂和光明正大的新时代。”

在这次演说后不久，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移到了自由党人一边。他与自由党人劳合·乔治坐在了一起，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成为朋友和政治上的同盟。

保守党政府由于党内在外贸政策问题上的斗争陷于瘫痪状态。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英国一直遵循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即国家不得干预国内经济生活和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这个原则给英国的资本主义带来过巨大的好处。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贸易也出现了新的形势：英国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德国和美国筑起了强大的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工业，以此对英国经济形成了威胁。保守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建议按照德国和美国的范例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及其领地在内的关税同盟，建议用关税壁垒保护大不列颠帝国，阻挡第三国商品的渗入，而大不列颠帝国内部生产的商品则享有优惠税率。张伯伦断言：他提出的这条建议可以使英国经济出现新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但是采纳这个建议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一些工业部门，首先是与张伯伦有关的重工业立刻会从关税壁垒政策中得到好处，而轻工业和造船业则将一无所获。贸易界也不相信关税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大部分人反对实行关税壁垒政策。

丘吉尔冷静而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他看到 ,多数人反对关税壁垒政策 ,因而 ,站在反对关税壁垒政策一边可以给保守党政府造成很大麻烦并能得到广大关税反对者们的同情和支持。

在保守党政府内部 ,约瑟夫·张伯伦主张实行关税壁垒政策 ,而首相阿瑟·巴尔弗坚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他们两位都有自己大批的拥护者 ,随着意见分歧的相持不下 ,政府内部分崩瓦解 ,巴尔弗首相不得不于 1905 年 5 月 10 日提出辞职。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人长达 15 年的执政 ,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于 1905 年 5 月 10 日组织政府 ,在以后的 15 年里 ,由自由党政府统治英国 ,而在以后的 15 年时间里 ,都是由自由党人出任首相。

由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在反对保守党的斗争中表现出色 ,在坎贝尔·班纳曼组成的新政府里 ,他俩都被任命了大臣的职务。劳合·乔治任贸易大臣 ,丘吉尔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由此可见 ,丘吉尔投奔自由党确有远见。

三、明察秋毫摇反对绥靖

三十年代 ,是世界现代史上风云突变、危机迭起的年代。1933 年 1 月 30 日 ,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后出任总理 ,欧洲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 ,反对民主主义 ,反对犹太主义 ,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他煽动性的鼓吹 ,不把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的具有德意志民族的领土统一起来 ,建立德意志大帝国 ,就谈不上民族幸福。因此德国不能不进行战斗。此年 3 月 ,希特勒侵略并吞了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奥地利。这一事实意味着捷

克斯洛伐克,这个含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现在已处于纳粹领土的三面包围之中。同时,希特勒肆无忌惮地扩充军事力量,加紧备战,很快,在海陆空三方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德国的嚣张气焰也助长了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邪恶念头。1936~1937年间,德意日法西斯组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反动轴心,加速战争准备,国际形势日趋严重。面对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在严峻的历史关头,英国“避战求和”的和平主义情绪十分严重,苟且偷安的思潮颇为泛滥。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对德绥靖派,对法西斯在欧洲的步步进逼胆怯心虚,认为英国缺乏足够的力量与德意正面对抗,武力制裁只会引起全面的欧洲战争,并导致英帝国大厦的倾覆。为了维护现状,保全既得利益,目光短浅的张伯伦主张对德意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当时,首相的主张笼罩着英国上上下下,甚至在1936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本院绝不为国土和祖国而战”。这不能不让世界进步人士痛心,英国已萎靡不振了。

丘吉尔这时对德意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具有比较远大的战略头脑,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政府这一主张。他坚决反对张伯伦推行的对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的软弱政策,主张对德意侵略者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丘吉尔是当时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丘吉尔就从德国毁约扩军、磨刀霍霍的种种迹象中意识到,德国是要控制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英德矛盾无法调和。这无疑从本质上抓住了要害,也使我们看到丘吉尔比其他英国政治家看得更远。

丘吉尔在他的一系列演讲中,特别是在1937年底保守党

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报告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路线。这是他多年来,实际上也是他一生中所遵循的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认为,英国 溯及 多年来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和挫败欧洲大陆上的军事霸主”。现在法国陆军虽然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构成对英国的致命威胁,而德国则不然,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它哪个国家都不怕,桀傲不驯,虎视眈眈。因此,“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的德军是最危险的敌人,它们准备发动一场要使欧洲“德意志化”的战争。其结果,英国厄运难逃。欧洲的结局便是在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

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英国,丘吉尔认为应实行“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这就是在国内要迅速的大规模的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在国际上则应“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者”。要想英国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对于一个当时只处在“后座议员”地位上的丘吉尔来讲,洞悉这一切,看清了德国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并形成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历史)证明丘吉尔走在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英国政治家的前列,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的政治家正在成熟。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丘吉尔主张放弃意识形态的制约,调整英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结成反纳粹的“大联盟”。这一主张反映出丘吉尔善于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去实现政治目的的现实主义风格。还在 1940 年 9 月,丘吉

尔便对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表示：“现在我是德国的敌人，我要保护英帝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但是希特勒德国不仅威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努力去组成强大势力来粉碎它呢？”而这时的英国执政者普遍看好绥靖政策，另外，在英国很多人都确信英国无法与德国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绥靖派的主张占了上风，绥靖主义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绥靖分子在政府中占了优势。1937年 缘月 愿日，绥靖派头子张伯伦上台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正式作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加以全面推行。

丘吉尔同新首相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丘吉尔当时曲寡难和，它的追随者不过三四人。丘吉尔自己也承认，他在那时的影响已降到零。但他不怕孤立，坚持同绥靖主义进行斗争。他在议会内外大声痛呼，敦促政府争取时间，加紧重整军备，充实国防，并一再痛斥并尖锐抨击张伯伦政府推行的绥靖政策。

张伯伦是个眼光近视的政治家。为了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以求保全自己。他自认为这样可以祸水东引，一箭双雕，让德国与苏联交战，这样无论结果如何，都能让英国免遭打击。他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苏德自相残杀，彼此消耗，最终都无力同英国作战。

但丘吉尔不以为然，他清楚地看到德国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强，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对英国和其它国家也是个威胁，而苏德开战，对英国来讲只是推迟了遭受打击的时间，实质上潜在的威胁更大。在 1938年 猿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对这一罪行表示出的卑屈立场使丘吉尔大为不满，他再

次公开出面反对政府 ,在此以后 ,在议会进行较重要的表决时 ,丘吉尔不再投政府票而是弃权。他坚持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 ,他说 ,如果坐等事态发展 ,不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 ,那么 ,所有小国将会从日内瓦溜走 ,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 猿月 愿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曾经在 猿年代 ,苏联政府多次建议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阵线以制止德国对欧洲的扩张 ,但只有当时不掌大权的丘吉尔极力赞同 ,却无法实现这一战略企图。

愿年 ,在欧洲地区的突出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德国要求瓜分这个国家 ,并霸占它的大部分领土 ,而张伯伦打算满足德国这一贪欲。说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国名 ,它是凡尔赛会议上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墨索里尼之流甚至讲过 ,没有什么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 ,有的只是“ 捷克、台德斯克、布拉格、鲁台诺、罗梅诺、斯洛伐克 ”。换句话说 ,这块土地乃是捷克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的杂居地 ,这种说法虽属强盗逻辑 ,但也并非纯系子虚乌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由东向西 ,宛如牛舌一般地延伸着。牛舌尖部分就是苏台德地区 ,即山岳地带的波希米亚和西路西亚 ,德国的国土就像张开的钳子那样 ,正好夹着捷克这个牛舌尖地区。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传统尚未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时候 ,邻国出了个希特勒这个野心家 ,他将邻近的日耳曼民族集中起来 ,为了制造所谓法西斯“ 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国家 ”的独裁统治 ,首先吞并奥地利 ,接着策划将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版图。

面对德国无耻的贪欲，英政府为避免发生战争的危险，张伯伦打算说服英法内阁予以接受，并威胁捷克政府同意肢解它的国家。丘吉尔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他很清楚，德国一旦得到，地位将会迅速提高，而对英国及其盟国的地位则十分不利。因此，他坚决反对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向希特勒求和。1939年9月，丘吉尔发表声明，声言英法两国的这些提议，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在纳粹的军事威力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恰恰相反，会使这两国处境更危险。1939年9月，丘吉尔会晤了英国海军大臣，事后大臣妻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丘吉尔情绪极为激动，猛烈地谴责首相，他在海军部笨重的家具中间来回跺脚，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侵略者表示藐视。

1939年9月，张伯伦去了慕尼黑。这一天丘吉尔出席了一次由著名政治活动家参加的午餐会，他再次敦促大家应该联名打电报给张伯伦，坚持不能在捷克问题上投降，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获得支持。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有解决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慕尼黑是纳粹党的发源地，在纳粹发动1934年武装政变的纪念碑两旁，站着两名党卫军士兵，他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给纳粹的圣地增添了威严的气氛。在这里英法意德四巨头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有关这次会面情况，随行前去参加会谈的法国驻罗马大使庞塞是这样记述的：“会前彼此虽然都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却只是冷冷地握一下手。又矮又胖的墨索里尼穿着纳粹党制服，腰间扎着皮带，摆出罗马帝国凯撒尔的架子，傲慢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哟！’一副摇尾乞怜相。张伯伦头发斑白，有点水蛇腰，浓眉毛，大包牙，脸上像长

了脓疮似的。因为患有风湿病 ,两手发红 ,浑身上下穿一身黑色服装 ,他是个死守着英国法律不放的老人的典型 ,此刻却显得很神秘。希特勒的讲话声音本来就很粗憨 ,像个乡巴佬 ,听起来倒也有些魅力 ,但今天却不冷静 ,脸拉得很长 ,而且一点也不随和。”翌月 14 日下午 4 时 ,慕尼黑协定全文发表 ,捷克首相西罗维噙着泪水说 :“在暴力的威胁下 ,为了拯救人民和国家 ,只有接受协定 ,此外别无出路。”

对此 ,丘吉尔强烈谴责张伯伦 ,他对此作了出色的总结 :“独裁者在手枪枪口威胁下勒索 员英镑 ,如数给他后 ,又在枪口下索取 圆英镑 ,最后 ,这位独裁者同意拿 员英镑 苑先令 远便士 ,剩下的尾数留作保证将来采取善意的酬射。”同时 ,丘吉尔严肃警告说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 ,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 ,仅仅是呷第一杯酒 ,第一次尝到苦酒的滋味 ,除非我们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 ,再度崛起 ,一如往昔地坚持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立场 ,否则 ,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一杯杯苦酒。”

果然 ,正如丘吉尔所料 ,希特勒欲壑难填。为换取暂时的和平 ,捷克野蛮地被宰割。正当英国上下有一股感到松了口气的巨大浪潮兴起的时候 ,翌年 3 月 ,希特勒撕毁了墨迹未干的慕尼黑协定 ,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从此彻底破坏了中欧的政治稳定。完全应验了丘吉尔的话 :慕尼黑协定是个骗局。

回顾这一时期的丘吉尔。确实是一位明察秋毫 ,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从希特勒执政时起 ,就看到了德国在一个特别残暴而冷酷的领导人统治下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从那一天起 ,他就竭力鼓吹英国政府应加强国防、积极防御 ,而

不应消极躲避。显然,丘吉尔对战争的危险已预计到了,也找到了拯救国家的根本出路。

四、争取民心摇坚固国防

1940年5月16日,希特勒试图在西部战线粉碎盟军的计划似乎就要大功告成:德军打通了从索姆河口到英吉利海峡这条长廊;占领了阿拉斯,又孤立加来,从而使这条长廊更加扩大。由于英法政府长期奉行绥靖政策,由于西欧盟军缺乏周密的配合和严格的训练,再加上战略战术上的保守、陈腐,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被从海峡各港湾逼到海岸线上的盟军,唯一的逃脱道路就剩下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了。盟军内部顷刻间分崩离析,英国准备登船撤退,法国则想停战谈判,比利时准备投降,而荷兰已经投降。盟军总司令韦刚将军曾力图从北侧向长廊的南侧进行反击,但没有成功。随后盟国又进行出击南方的准备,由于德军再次蜂拥杀来,不仅比利时军队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敦刻尔克也将受到威胁,奥斯坦德更难守住,此时约有14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前面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得意忘形、如狼似虎的追兵,盟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样下去,全军覆灭就是唯一的后果,因此,撤退,刻不容缓!5月26日拂晓,比利时国王投降,盟军的北侧就彻底暴露在德军打击之下,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英军唯一的退路只剩下敦刻尔克港了。英国军队走到了生死关头。

精神是人生命的支柱。在这危急的、令人窒息的时刻,为了鼓舞士气,丘吉尔发布了令人振奋的紧急动员令: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站在国家

利益上鼓舞他们周围的士气 ,首相将不胜感激 ,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 ,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 ,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 ,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 ,不过 ,无论大陆上发生了任何事情 ,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 ,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在援助敦刻尔克的紧张日子里 ,丘吉尔的战时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 ,宁愿牺牲生命、家庭、财产也不愿屈膝投降 ,他们紧密围绕在首相身边 ,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凝聚力 ,似熊熊烈火点燃了整个英国国民战斗的决心。

丘吉尔随机又从海军调集船只 ,准备力量 ,积极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港口做好一切准备。一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海军行动即将开始 ,为了避免英法之间在撤退中产生任何误会 ,丘吉尔一再告诫英法手拉着手撤走 ,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大战凝成了丘吉尔对法国的永久友谊。他熟悉法国的历史 ,敬仰法国的民族英雄 ,他对法国的军队充满信心 ,他把对法国的情感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协调起来了 ,因为他知道 ,一个强大的法国对英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在英国的军备力量远低于德国的那个时期 ,丘吉尔就看到了只有大大加强英法两国的合作 ,才能拯救英国。他曾用他杰出的辩才去说服他的同胞们 :“英法两国是通过不同途径找到自由之路的 ,但是当他们决心投身于共同事业时 ,任何针对他们的挑衅都是危险的 ,想要打倒他们也将十分困难。这个拥有纳尔逊舰队和拿破仑军队光荣传统的两国人民的联盟决不是好对付的。如果在这些军队品德

之外,再加上两国在正义和自由方面的崇高思想,那么他们将所向无敌。”丘吉尔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开始渡过海峡前往英国,并下令让未受伤的士兵先于伤员撤走,以确保能尽快在英国组成新的部队。下这道令时,首相神情相当沮丧,战争是残酷无情的。

由于狂傲自大的希特勒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忽略了歼灭敌野战军,于是给了盟军一个意外但却至关重要的喘息机会。他们迅速加强了自己的防务,远征军戈特将军部署了三个步兵师,可以在重炮配合下抵抗德军进攻。他们一边抵御,一边开始跳进海里撤退,这些深谙水性的英国士兵在没有任何设备辅佐的情况下,竟然绝处逢生。

缘月 圆日,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大撤退计划。于是由 愿园多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编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英国海军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沿海船民积极参加营救行动,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源天内运送了 愿园多人。远月 圆日夜,陆军大臣艾登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宣布,英军的五分之四已脱离虎口,撤回本国。这一宣布打破了柏林电台从 缘月 圆日起几乎每晚都吹嘘的已把英军围歼的神话。

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了,虽然代价是巨大的,但它毕竟挽救了英国军队,使濒临绝境的英国又找到了一丝新的生机,更坚定了丘吉尔抗战下去的决心。敦刻尔克的奇迹将载入英国史册。

1940年5月10日，法国政府同德国纳粹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成了孤家寡人，处境险恶，只能是以斗争求生存。丘吉尔坚信，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众多岛屿的有利地形，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将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他决心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立志要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坚持抗德斗争，鞠躬尽瘁，在所不惜。这是丘吉尔一生辉煌的开始。

严峻的现实，使丘吉尔陷入了沉思。连续得胜的纳粹军队处于明显的战略优势：它们的装备充分而且完善，后方还有在战场上不断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作后盾，正杀气腾腾准备毁灭英国，意大利已经向英国宣战，在西班牙、在法国都存在着随时与英国宣战的危险。显然，英国已处在法西斯势力围困之中。

英国人民虽然在精神上具备了坚定的斗争决心和高昂的战斗气势，但在战略上还需要渡过一段艰苦时期。丘吉尔深知，在武器装备方面，英伦三岛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武器一概没有；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100门；中型、重型的坦克不到100辆；敦刻尔克大撤退，又使他们损失了很多武器。而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英国如何将这弱点转移？丘吉尔认为，英国是一个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它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充实海防线。历史上，以炮舰政策开拓了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就是凭着它的船坚炮利一度占据了海上霸主的地位。现在，还必须利用海军来抵抗入侵者。虽然英国在陆军方面装备落后，但英国的海军实力是不容置疑的。德国虽然在陆军作战方面优于英国，但希特勒并未把海军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建造多艘大型军舰不是

几个月就能办到的,至少要花费几年功夫。显然英德在军事方面相比,英国的优势在军舰。丘吉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找到了克敌致胜的法宝。这也是丘吉尔经历了多年在野风波之后,欣然同意重返海军部的原因所在。英国的海军就是英国的国防象征。

早在 1903 年 12 月,丘吉尔就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明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便自卫,以及实际击沉德国潜艇的情况。虽然到任不久,丘吉尔就亲自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看到的军舰大多是在一战期间或在此之前建造的。但在这篇报告中丘吉尔使用了明确有力的措词,显示了充分的信心,他把反德国潜艇的这场斗争看成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这篇报告赢得众多的赞誉,人们称它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一篇“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对于战争时期的这个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乎时宜的滋补药。很明显,报告让人民看到这场战争应如何打。丘吉尔重视海军要迅速建立一支能战胜德国舰队的英国舰队,这个想法早在 1895 年他出任海军大臣时,就已经提出了。他始终不渝努力实现这一目的,在他的眼里,英国国民对海洋有着特殊的感情,那蓝色挚诚的大海是英国和平的防护网,关系着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

重视海军并不等于放弃陆军。丘吉尔这时期亲自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去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视察。他重点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并写了几份备忘录,要求提供重炮,用以轰击法国沿海地区。他还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指挥

的第三师和南方前沿指挥部,他敦促蒙哥马利允准征用公共汽车,以增加他的部队机动能力。丘吉尔特别担心德国坦克部队的登陆,因为这将击中英国的要害: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或反坦克弹药,甚至没有普通的野炮。一次,丘吉尔巡视靠近多佛尔的圣马加里特湾的海滩时,得到报告说:一个旅守卫着长达四五英里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依靠的武器只是三门反坦克炮,每只炮只有远发炮弹,也就是说依靠这员发炮弹固守。当旅长提出是否给士兵一次演习的机会时,丘吉尔面对窘迫的现实只能说,我们无法提供演习炮弹,即使真的打起仗来,也须等到最后一刻,在最近的射程内才可以开炮。

通过实地考察,丘吉尔再次切身体会到英国的军备充实迫在眉睫。他要求军需大臣莫里森排除困难,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其他各种常规武器,来尽快武装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以解前线弹药缺乏的燃眉之急;他要求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力争每月生产不少于员四四架军用飞机,并尽快设计生产出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等新式武器,加强空中防务能力。他还要求海军部,至少把缘名经过训练或经过部分训练的驾驶员暂时调到空战司令部。

除此之外,丘吉尔知道,战争除了常规武器和人力之外,获胜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秘密武器,这是杀敌获胜的一条捷径。因此,他决定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在怀特丘奇建立新式武器实验场,专门研究最新战斗武器。杰弗里曾在员怨年成功的研制了漂浮水雷,在实践中立下战功,如今,他们又在进行新的研究,制造一种可以向坦克车投掷的炸弹。当这种炸弹从窗口投出时,它会粘在坦克车上,特别是当爆炸性极强的炸药接触钢板爆炸时,特别厉害。丘吉尔对此很感兴趣,并建

议在这一基础上再研究出能以来复枪射击坦克的投射弹(类似枪榴弹),或者用于坦克枪射击坦克的炸弹(类似迫击炮弹)等等,丘吉尔已显得迫不及待。远月 圆日,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塞德将他的作战计划送交总参谋部,该计划内容要点是:第一,在敌人可能进犯的沿海海滩上修筑“覆盖式”战壕,由定点兵力和机动兵力协同作战;第二,建立一条穿过英国东部中心的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来确保伦敦和大工业中心不受敌装甲车侵犯;第三,在反坦克障碍线后是进行大反攻的主力后备军。从以上内容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的战略主要是防御思想。同时,丘吉尔认为一味的防御很可能会丢掉英国自己的优势,而使德国优势充分体现。这么一来,英国的被动性就大得多了。因此,“如果德国能不顾我们的海军力量,轻而易举地进犯英国,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们呢?”丘吉尔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造大批坦克登陆艇,组织若干分遣队,出敌不意去攻占敌人占领区,以摆脱英国在心理和精神上屈服于敌人的困境,争取主动权。

经过两个来月的紧张备战,工作有了成效。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进入战时内阁后,铁面无私地工作,并成功地增加了战斗机司令部手中掌握的飞机数量。“喷火式”、“旋风式”战斗机在敦刻尔克撤退后总共才 猿架,这时已增加到 远架;后备飞机的数量从 猿架增加到 圆架,海军也将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抽调回来,以便组成突袭队对付德国入侵;在各个入海口都布置了水雷,并在有可能登陆的海滩设置了障碍,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沟,修建混凝土掩体。所有这些再加上正规军的组建和整编以及上百万

的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丘吉尔的努力正在使英国的国防日益加强。丘吉尔本人的威信也得到了提高,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所描写的:“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对他都无比信任!”

动员全民参战,使所有的英国人在危险的时候都能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去用暴力回击暴力,才能保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因此,在英国本土防御问题上,丘吉尔除了加强正规国防力量之外,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在英国各党派各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下,全国很快组织了 150 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在这神圣的时刻,所有的英国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生动场面:前方有正规军严阵以待,后方的人们紧张、忙碌地战斗在工厂里、机器旁,他们一直干到实在挺不住了,昏倒在地被迫离开,而他们的岗位则马上会被另外提前上班的人接替。人们拼命地工作,唯一的愿望是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这时的英国从上至下,从战时内阁到政府,拧成一股绳,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局面,对战胜法西斯充满了信心。丘吉尔讲,没有别的事能使英国人这么团结一致了,因为 1940 多年来,英国从未遭受过侵略,因此面对敌人的入侵,广大人民下定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自己宝贵的生命。丘吉尔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激励着英国人民广泛地投入到这场卫国战争中,到 194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有 150 万人手中有了步枪和刺刀,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被编入正规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有的持步枪,有的拿着棍棒全副武装。群众为了更及时的通报敌情,他

们自动报名参加对空监视组织 ,用望远镜和步话机配合雷达监测敌情 ,人数竟达 缘万之众。

战争开始后 ,德国的飞机对英国狂轰滥炸。丘吉尔懂得 ,国家元首要在这个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了全面了解战争的破坏程度 ,安抚国民 ,他这时期经常对某些受到伤亡的场合进行视察 ,体恤民情。有一次 ,他迅速赶到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 ,敌人的炸弹把这个地区炸出了大片空地 ,他看到伤亡的悲惨场面和当地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时 ,难以抑制自己 ,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与丘吉尔一起去的伊斯梅后来写道 :“他们哭喊道 :‘好心的老温尼 ,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 ,我们能够经受得住 ,给敌人狠狠的回击。’”丘吉尔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他失声痛哭。在人群中 ,一位老太太说 :“你们看 ,首相真关心我们 ,他哭了。”丘吉尔镇定了一下情绪说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 ,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目睹了受灾的现场 ,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心情沉重 :他们的人民将如何渡过这段艰苦岁月 ?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 ,丘吉尔作出了一项原则性的决定 :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政府承担 ,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一来 ,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受害者身上了 ,而是由全体英国人民平均负担。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 ,一周之后 ,政府出台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项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解释的 :“当我在巡视战争的损失时 ,看到了一个英国人的凄惨景象 ,他的房屋和赖以生活的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 ,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 ,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 ,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

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战争的炮火而遭受损失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这表明了我们有信心帮助人民渡过难关,而人民也将齐心协力与政府打击入侵者。”

丘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关键的时刻抓住了民心,他坚信只有取得民心,才能巩固政权,才能在非常时期经受住炮火的袭击和考验。

五、不计前嫌摇化敌为友

作为一名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丘吉尔在国家危难之际敢于正视现实,努力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赢得战争服务,显示出他的胸怀、魄力以及娴熟的权术。

1940年5月16日,英国战时内阁成立。在战时内阁的缘位成员中,有两位是由工党领导人担任的。英国工党正式成立于1900年,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的大党。工党以工会为基础,成员大多是工会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它已经有过两次单独执政的经历。长期以来,工党就是保守党的政治对手。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一名议员,历来就非常敌视工党的政策纲领。他常常在下院的辩论中对工党领导人发动攻击和责难。德国大举进攻西欧,英国的地位危在旦夕,丘吉尔便毅然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不计前嫌,联合政治上的对手一致对付外敌。

战时内阁成员对战争胜败负有全责。正如丘吉尔所言:“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斩首的,就只是这缘个人。”为了国家的利益,丘吉尔使工党领袖克莱

门特·艾德礼担任战时内阁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掌玺大臣一职。丘说：“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旁。战争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任命著名工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家阿瑟·格林伍德担任战时内阁的不管部大臣。后来，艾德礼又被提升为英国副首相。此外，在内阁级大臣中，工党人士亚历山大担任了海军大臣，工党的莫里森、贝文、多尔顿、乔伊特等人分别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劳工与兵役大臣、经济作战大臣和副检察总长兼王室顾问。

保守党的另一个政治对手自由党也有一批人士进入了内阁。

丘吉尔不仅与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团结抗敌，就是对保守党前政府（张伯伦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没有以个人恩怨作为尺度去进行处理。张伯伦下台之后，政界以及公众不少人要求对那些制订与推行绥靖政策的人，如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等人，进行惩处。这些人同样曾经是丘吉尔的对手。丘吉尔为了说服议会加强对德国法西斯的警惕，并以强硬态度对付德国、意大利的侵略扩张，曾与他们进行过无数次顽强的辩论与斗争。然而此时大权在握的丘吉尔却以国内的团结一致为大局，及时出面制止了许多对他们进行追究和整肃的要求。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

在国际关系中，丘吉尔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的敌对立场，在历史的危急关头，积极主张联苏抗德。

众所周知，丘吉尔曾经是一名极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干

将 ,以致有的作家说 :“ 任何一个英国人都不曾像丘吉尔那样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在庆祝世界重新恢复和平的欢呼背后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却表现出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深深的忧虑。不久 ,一场以武力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而丘吉尔在这一活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18年底 ,丘吉尔在丹迪市选区发表演说 ,把布尔什维克称为“ 残暴的大猩猩 ”,并认为布尔什维克“ 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 ”。1919年 源月 ,丘吉尔在给首相劳合 · 乔治的一封信中说 ,对苏俄的政策应该是十分简单的 ,即“ 把德国养起来 ,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 ”。劳合 · 乔治评论他说 :“ 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 ,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丘吉尔此间曾先后担任英国军需大臣和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 ,为实施英国政府干涉苏俄内政的一系列政策出过不少力。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 几年来 ,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使用一切手段 ,包括从英国法律角度来看 ,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 ,支持所有的反对俄国的白卫军分子 ,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仅仅在 1919年代 ,丘吉尔就发表过数百次文章以及演说 ,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列宁生前曾气愤地说 ,丘吉尔是“ 苏俄的最大仇敌 ”。

但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巨大侵略野心面前 ,丘吉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 ,终于逐渐领悟到德国所要吞并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 ,而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 ,丘吉尔就分析说 ,如果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 ,其目的之一将一定是为了在击败苏联之后倾其全力进攻英伦三岛。在这种战争狂人面前 ,再继续固

守过去的任何偏见 ,而放弃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机会 ,都是极不明智的。

1939年 9月 1日 ,法西斯德国军队在希特勒的指令下 ,实施了向苏联全面进攻的“巴巴罗莎计划” ,德国和它当时的仆从国芬、罗、匈、意等大规模进攻苏联。这一天 ,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关注丘吉尔政府将对业已爆发的苏德战争所可能采取的立场。他们感到非常忧虑 ,因为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多年来丘吉尔所持的反苏立场。当晚 9时整 ,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 ,声明英国将给予苏联“任何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援助 ,只要英国能够办到和对苏联有利” 。他还说 :“俄国人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 ,也是美国的灾难。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各地每个自由人的斗争事业” 。丘吉尔的表态给了妄图利用英苏矛盾的希特勒一记重击。

1939年 9月 1日 ,即苏德战争爆发后第 1天 ,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英苏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协定规定英苏两国政府在对希特勒德国的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 ,在这一战争中 ;除经彼此同意外 ,既不谈判 ,亦不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面对严重的形势 ,双方规定该协定从签字之日起便立即生效 ,而无需批准。1940年 5月 ,在苏联红军完成了莫斯科保卫战之后 ,英苏两国政府又在伦敦签署了《英苏条约》。条约重申了协定的主要原则 ,同时在第二部分中载明了战后合作与互助等问题。根据一系列政府间的协定和条约 ,苏联从英国得到了各种援助。

丘吉尔不计前嫌 ,在国内联合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工党 ,在国外联合英国的敌人苏联 ,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他这种出于策略的考虑 ,客观上符合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

步人类的利益 ,因此获得了英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充分肯定。同时 ,与苏联的联合也为英国赢得了恢复的时机。

六、煞费苦心摇劝美参战

丘吉尔明白 ,法西斯联盟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强大的敌人。因此 ,依靠英国或少数国家是无法战胜它的。

1941年 缘月 ,德国进攻西欧和北欧之后 ,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 ,唯独美国在战争之外隔岸观火。因为法西斯的战火还远未波及北美洲 ,美国的利益尚未受到伤害 ,并且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也顽固地阻止美国对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过多支援。丘吉尔认为 ,要战胜德国 ,就必须争取美国的联盟 ,否则英国将无法取胜。

丘吉尔不顾一切地要完成既定方针——争取美援、与美结盟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 ,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 ,他施展了一系列他所特有的外交和政治手腕。

要紧的是 ,丘吉尔必须积极劝说罗斯福总统 ,竭力使其相信 ,英国赢得战争将对美国有利。而德、意获胜将会给美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丘吉尔在就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之后给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封电报就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后来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回顾说 :“我在每次电报中都使用坦率的词句 ,竭力向他们说明 ,如果英国一旦崩溃 ,希特勒称霸欧洲 ,掌握了欧洲所有的造船厂和海军 ,则美国将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此外 ,他还指示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直接把这种看法告诉罗斯福总统。

丘吉尔的战略目标是英美结盟共同抗击德国、意大利法

西斯,但是,当时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十分强硬,军界、政界以及公众对于英国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德国的封锁和进攻也存有疑虑。美国陆、海军领导人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公开反对在影响美军装备的情况下对英提供军援,特别是反对向英国交付额外数量的军用物资。

战争初期,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认为,在德军入侵英伦三岛之后,英国政府将会迁出英国(至加拿大或其他地方),那时就将出现一个完全听命于美国的英国流亡政府。尽管罗斯福总统本人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但显然,在此时拉美国“入伙”是不可能的。

丘吉尔从争取武器援助入手,并决心必要时将为此付出某些代价。这样,丘吉尔关于英国沦陷对美国不利的警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某种策略,目的在于利用美国对于“英国遗产”的关切以及对“德国力量更加强大”的恐惧心理争取美国政府“更为明显的支持”;一旦美国作出了这种“更为明显的支持”,它就在实际上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之一从而失去了中立地位。

在得知美国存在着对自己大西洋海岸、空中的防御力量的担心之后,丘吉尔及时下令与美方进行交涉,他本人也为此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了多次磋商,终于商定,英国以 99 年的租借期向美租借西印度群岛的军事基地作为交换条件,获得 8 艘美国海军的旧驱逐舰。英国租给美国的海、空军军事基地遍及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以及英属圭亚那等地。这一交换的后果在表面上是使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这些美国驱逐舰被迅速编入了英国现役舰队,后来在大西洋海战中发挥了

作用),而更深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美国把旧军舰提供给了英国,便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介入了正在交战双方中的英国一方,这正是推动美国参战的一个步骤,这也是丘吉尔此举的真正目的所在。后来他曾说:“此事在欧洲发生的影响甚为深远”。

此举的另一方面也事关重大——租借给美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大英帝国数百年来所苦心积累的“家当”,以1941年为期租给外国,而换得的却只是一批旧军舰,难免引起非难。丘吉尔对此做了大量说服工作,通知下院时尽量采用了“谨慎的措辞”。国际上的有些舆论可能对美国不利,丘吉尔则按捺住内心的兴奋,表面上十分镇静地对下院说,不希望人们去“超过文件字面的含意”去理解,似是而非地指责道:“只有非常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把驱逐舰交给英国,起码是违反了国际法,或者起码是影响了美国的非交战状态。”他很巧妙地掩饰住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把喜悦暴露在世人面前。他让议员们少说为佳:“当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时,就最好听其自然,不再究问”。

此后,丘吉尔继续做美国政界领导人和议员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克服孤立主义势力的羁绊,全力以赴进一步从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英国。1941年10月,英国抗击德国空军轰炸的能力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英国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在短期内扩建5个步兵师,新建5个装甲师,生产大批武器装备。而此时仅仅依靠英国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得到美国更大规模的援助。在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早已为此焦急地等待了多时的丘吉尔欢欣鼓舞,当即致电罗斯福再次求援。他说,英国的事态“正在发展,只要

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 ,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 ”。

此时美国朝野大多数政治家已清楚地认识到援助英国的意义 ,公众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 ”。罗斯福在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了美国军火产品的分配方式 :将其一半分配给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 ,决定在满足英向美订购的 5000 架飞机之外 ,再额外供应 5000 架飞机。然而 ,英国此时已经无财政能力“ 现金购货了 ”。为此 ,丘吉尔再次致电罗斯福 ,系统全面地向他描述了英国抗击法西斯斗争的局势 ,着重强调了英国的经济困难。他说 :“ 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 ,把他们慷慨答应援助我们的军火和商品 ,只限于必须立即付款才能供应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原则的…… ”电报全文长达万字 ,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电文之一。

正是这份电报促使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 ,在与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和各有关方面长期讨论磋商之后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高度评价这一法案 ,这是使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所作出的决定性步骤。在罗斯福总统的力争下 ,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不久 ,美国和英国两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代表在华盛顿达成了《粤月说原员参谋协定》 ,规定一旦美国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 ,美英两国将首先打败德国 ,然后再对付日本。

至此 ,丘吉尔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心里明白 ,这一法案以及协定将改变英国的命运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态势。美国也

终于因此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而这也正是丘吉尔所希望和力争的。

第五章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领导艺术

戴高乐(1889年12月22日—1970年9月27日),法国前总统,法国著名的军事、政治活动家。1909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坦克旅旅长。1940年6月,任第1装甲师师长。希特勒对法国发动突然袭击后,在前线积极阻击侵略军。1940年6月任国防部副部长。法国投降后,出奔英国,在伦敦领导“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6月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945年6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曾对解放法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6年退出政府。1958年任总理,提出加强总统权力的新宪法。1960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届总统。1965年12月连任,任期7年。1969年6月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9月27日病逝。

一、烽烟四起 摇勇承责任

1940年6月第一周刚刚过去,失败的阴影已经弥漫整个法国北部盟军战场的上空。尽管敦刻尔克撤退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但代价也是惨痛的,法国此时已溃不成军。这是士无斗志、将无远虑的法国对现代战争在技术方面提出的新的挑战熟视无睹的必然结果。

法国首脑这时已公然准备停战求和,戴高乐将军对此痛心疾首。他打算脱离这个软弱无能的腐败政府,准备辞职。

但是内政部长芒代尔却竭力说服他道：“现在还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还有许多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中间，只有您是白璧无瑕的完人。我劝您还是想想应该为法国做点什么吧！一旦需要，您现在的职务可能对您有用。”戴高乐深受感动，他被说服了。

远月 员日，德国人进入巴黎，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戴高乐在被逃亡者的车辆阻塞的公路上，经过了一段惨淡的旅行之后，于傍晚时分到达那里。他立即去见雷诺，并毫无保留地对他说：“三天来，我一直在估算我们离投降还有多久，但是我为您效劳是为了战争，而不是为了停战。您如果留在此间，必将被失败主义的浪潮所淹没，您必须尽快赴往阿尔及尔，您能当机立断吗？”雷诺答应了。戴高乐马上紧逼：“我立即前往伦敦，与英国人商量解决运输问题，明天就走，回来后，我到哪里再见您？”总理回答：“阿尔及尔。”当晚，戴高乐离开波尔多前往布列塔尼，准备做最后努力。可就在这个时候，雷诺由于受内阁中失败主义者的影响，已经向丘吉尔发电要求英国政府同意法国向德国征询投降条件，并扬言，如果英国拒绝他的要求，他将辞职。当戴高乐费尽口舌与丘吉尔达成协议，决定联手抗德之时，刚下飞机回到波尔多，他的助手告诉了他刚刚结束的内阁会议结果：雷诺已经辞职，贝当元帅被邀请组织新政府。这意味着法国将要停战。一切都完了。

虽然戴高乐对雷诺的决心并未抱太大的幻想，然而，他确实期待雷诺能最终战胜投降派，现在的结果固然对戴高乐是个沉重打击，但将军对此也并非毫无戒备。

远月 员日，他对他的朋友奥贝尔廷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即撤回北非……，仰仗大海作屏障，我们可

以在英美的援助下重建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一二年时间里 ,我们即可在物质上占压倒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帝国为基地重新征服本土。.....总之 ,我是决不同意签署停战协定的 ,这有悖于法国的荣誉和利益。”这段话反映出此时的戴高乐已经为法国谋划了一条救亡之路 ,也奠定了他以后为之奋斗的基础。

再说 ,还在伦敦的时候 ,身为国防与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 ,就超出职权范围电令一艘装载着来自美国的大炮和机枪的开往波尔多的法国“巴斯德”号货船 ,改道驶往英国一个海港。这样 ,这批重要的军火没有落到德国人手中 ,而重新装备了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国远征军。这是戴高乐一个富有远见的举措 ,表明他继续坚持战斗的决心已经下定。

戴高乐面对投降已定的局势 ,毅然决定离开法国。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曲折道路 ,但他终生不悔。在飞离祖国的前夜 ,戴高乐感慨万千 ,他恨执政者 ,恨他们软弱无能 ,视他们为法国的千古罪人 ,同时也立下大志 ,甘洒热血 ,精忠报国。他还去看望了那位曾经共同奋斗 ,但现在已各奔东西的雷诺总理。由于绝望和失眠 ,总理显得萎靡不振 ,无精打采 ,这位富有才智的总理大臣 ,当初相当坚决 ,但此时已毫无斗志。最近一连串事变的巨大压力 ,加上那些怯懦成性的同僚对他的背弃 ,使他的意志丧失殆尽。虽然现在再也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了 ,但戴高乐还是告诉了雷诺 ,他将返回英国。深夜时 ,内阁总理从秘密款项中提取了 100 万法郎交给了戴高乐 ,这是雷诺当时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支持行动。

随后 ,戴高乐来到英国大使纳德·坎贝尔爵士的住地 ,将自己要去伦敦的意思告诉了他。在场的斯皮尔斯将军决定陪

同戴高乐前往伦敦。第二天,远月 苑日上午 怨点,戴高乐飞往英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为了证明法国没有战败,他依靠的只是他的信念和决心。戴高乐体现了一个不屈服的法国形象。这一年,他已经 源岁,年近半百。戴高乐感到这是一次走向未知和个人的戏剧性行动。这是自国土沦丧以来,第一位只有临时准将头衔的军官起来向法国元帅的权威挑战的人,他感到自己被命运彻底抛到了一个冒险世界,绝无后退之路,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战斗下去。戴高乐只有破釜沉舟了。决心虽然已定,但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呢?许多人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渡过海峡的一小群法国人,想的只是组成一支辅助部队来帮助正在坚持战斗的不列颠帝国。但戴高乐却怀有崇高的目的,法兰西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大国之中如果最终只有法国放下武器径自退出世界大战,这对他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的军队来拯救,他就感到心如刀搅。因此,他认为只有一些法国人继续战斗是远不够的,要让这一些法国人去动员所有的法国人重新投入战斗,挽救法兰西。

戴高乐虽然信心十足,目光远大,富有胆略,但他很清楚他将从事的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他面对的敌人势盛力强,而且很快就可以利用业已沦陷的法国的官方机构,使它俯首听臣,为其效劳。法国人民已经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孑然一身,既无部下,又无组织,更无威信可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军队,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人们得从零开始。”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之外,戴高乐唯一

可利用的条件 ,就是他有一位强大的盟友 ,这就是丘吉尔 ,他愿意给戴高乐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在泰晤士畔的斯蒂芬斯大厅 源楼的一间小套房里 ,戴高乐着手缔造一个百战不败的法国。他首先要宣布奋斗目标 ,号召人民起来战斗。远月 愿日下午 愿时 ,戴高乐来到了布什大厦的播音室 ,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戴高乐向法国发出了他的号召 ,这是一篇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呼吁书 ,也是一篇谴责法国新领导人在败局未定前就与敌人谈叛妥协的讨伐书 ,更是一篇表示叛离的决裂书。对于这后一点 ,戴高乐比谁都更清楚。他说 :“ 随着这无可挽回的言词被电波传送出去 ,我觉得自己结束了一种生活 ,即在坚固团结的法国和不可分割的军队中的生活。在 愿岁这样的年纪 ,我像一个被命运彻底抛出来的人 ,开始了一种新的冒险生活。”事实上 ,从那时起 ,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 ,他点燃了法国人民心中希望的火种 ,他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请听他慷慨激昂的声音 :

我是戴高乐将军 ,我现在在伦敦 ,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 ,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 ,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 ,也不会熄灭。

这令人鼓舞的声音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 ,情绪激昂。但却得到了波尔多无情的答复 :命令戴高乐马上回国。远月 猿日 ,所谓“ 法国大使馆 ”又转来了一项命令 ,

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戴高乐因“临阵拒不服从命令并唆使其他军人不服从命令罪”,受到法国军事法庭的传讯,后来又因缺席被判处了“死刑。”

尽管如此,戴高乐将军仍坚持他的事业,因为他坚信他是在为祖国的利益而战,他认为只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去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经过艰辛的努力,戴高乐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募集到了许多从挪威和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老战士、外籍军团第150联队中的大部分士兵、1000名高山轻装队、一个坦克连和若干特种部队兵,后来又很快从一些战斗队、商船队、在外国的法侨和从法国逃亡出来的零散志愿人员中,征集到了好几十名飞行员和几百名水兵。苑月末,又有 苑000 人来投奔自由法国,其中一些很有名望的军人,如蒂西埃上尉、玛格冷·韦尔内雷中校、柯尼格上尉、德朗古尔上尉、比若少校、达尔让柳海军少校、谬塞里埃海军少将,他们以后都成了自由法国部队的主要组织者。由于缺乏更有名望的法国政治家的来归,戴高乐成了他的拒绝停战运动和拒绝失败的法国的孤单独一的领袖。这一现实,使他成了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军事领袖,后来他的法律顾问卡森教授向他征询如何制订这个运动的规章时,他干脆回答说:“我就是法国。”考虑到波尔多政府已处于完全从属于敌人的地位,已丧失了代表法国人民的任何权利,因此,

这个政府已不能算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戴高乐决定建立一个法国民族委员会,丘吉尔力排众异,竭尽全力支持他,说戴高乐是组建这个委员会最合适的人选。随后,英国广播电台公布了一份公报宣布承认该委员会。丘吉尔对戴高乐讲:“既然只有您自己,我就只承认您”。不久,英国政府又散发了一份公报:“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是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管这些人在哪里,只要他们愿意与他共同为保卫盟国事业而奋斗。”这一承认尽管力量有限,但它对戴高乐将军今后与英国政府建立关系,缔结盟国间的双边协议,提供了合法基础。对丘吉尔来讲,这一承认是对一个孤单独一的人和—一个被称之为“自由法国”的抽象实体表示信任的具体体现。

戴高乐在祖国沦陷、当局可耻地与敌求和之时,表现出不屈不挠、坚持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他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毅然在年近半百的时候重新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其艰辛、充满风险但却又最具辉煌的人生道路。他流亡英国,“寄人篱下”,靠着顽强奋斗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并取得了丘吉尔对这个初具雏形的政权的承认。戴高乐以他不同凡响的个性和智谋,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奠定了成功的基石。戴高乐将改写法国历史。

二、处变不惊摇稳健明智

戴高乐将军对于自己客居异乡、“寄人篱下”的处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丘吉尔虽然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数量也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他已准备迎接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但他的资本要比戴高乐雄厚得多——英

国的领土完整无损 ,人民的斗志依然旺盛 ,丘吉尔可以支配全部国家机器和力量——而戴高乐则一无所有。丘吉尔临危受命被认为是英国最有资格带领人民抵抗法西斯的国家首相 ,而戴高乐则是被人们怀疑、误解甚至敌视的法国叛逆。这种显明的差别使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十分微妙。在戴高乐看来 ,英国的一举一动往往盛气凌人 ,而在丘吉尔眼中 ,戴高乐暴躁易怒 ,目空一切 ,刚愎自用并且有时脱离现实常常达到荒唐的地步。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 :丘吉尔有指挥大权 ,而戴高乐无权。为了弥补无权的不足 ,戴高乐有时摆出一副寸步不让的高傲态度 ,以此来体现他心中法兰西的尊严。为此丘吉尔常常被逼无奈 ,甘拜下风。

但毕竟这是两位伟人在谋事 ,他们能以高超的处事艺术来解脱现实的束缚 ,并各得其所。丘吉尔无论处于什么心态 ,他还是看到了戴高乐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他认为戴高乐是个应运而生的人。他很欣赏戴高乐从法国脱险的经过 :戴高乐假装为返回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送行 ,在关键的一霎那 ,他一步跨上了那架飞机 ,砰的一声关上了机舱的门 ,飞机腾空而起。在场的送行人员都惊呆了 ,戴高乐在这架小小的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飞抵英国的戴高乐获得了丘吉尔极大的信任、理解和大力支持。尤其是丘吉尔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两个公告 :一个是拒绝承认波尔多的法国政府是独立政府 ,另一个是承认戴高乐的法国民族委员会 ,这等于承认了戴高乐就是法国这一重要事实。从此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关系发展到最高峰。

戴高乐对英国人民给予他和他的运动的同情、尊敬和钦佩 ,也绝非无动于衷。他后来写道 :“英国人民处处对我们表

现出来的慷慨热情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事业来援助我们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提供劳动、时间、金钱的人 ,不计其数。每当我在公众场合出现时 ,群众都把我围在中间作出最热情的表示。当维希的报纸发表了我被判处死刑和没收我的财产的消息时 ,许多不具名的人把大量的珠宝放到了卡尔登花园里 ,几十位素不相识的寡妇把她们结婚时的金戒指 ,都奉献给了戴高乐的事业。”

丘吉尔的英明之处在于他看到扶植戴高乐本身就是对英国自己最大的安慰。正如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宣布的那样 :“ 自从波尔多政府背叛以来 ,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尽可能远的法帝国内建立一个亲英抗德的法国行政机构。目前在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部队也在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 ,因此 ,我们必须用各种手段来协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丘吉尔的动机一目了然。

正当双方合作顺利进行的时候 ,戴高乐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 ,英国海军击沉了法国舰队。这一事件是大战期间英法冲突中比较严重的一次。这对于身在英国的法国统帅该如何表态呢 ?从民族主义情感出发 ,戴高乐必然要谴责丘吉尔 ,但关系搞僵了 ,戴高乐的未尽事业将受到很大的威胁 ,甚至从此离开政治舞台 ,这意味着他前面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从大局着眼 ,冷静客观的看待这一事实 ,理解英国的做法 ,但这又会招致法国国内人民的反感 ,甚至误解。戴高乐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法国沦陷后 ,丘吉尔最操心的是法国舰队的命运。这样的一支舰队一旦落入希特勒之手 ,大不列颠和它的海上补给将极易受到攻击。诚然 ,海军上将达尔朗、保罗 · 博杜安 ,甚

至贝当元帅都曾向英国保证 ,舰队不会落入德国之手。但是 ,法国政府不是也向英国人保证过决不签署单独停战协定 ,保证过将 ~~源~~ 名俘获的德国驾驶员送往英国 ,保证过将停战文本事先通知盟国的吗?然而没有一项承诺得到兑现。再说 ,法国政府已不再是个自由政府 ,法德停战协定第 ~~愿~~ 条规定 :法国舰队将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拆除武器。当然 ,德国人也许诺在整个战争期间将不使用这支舰队 ,但是在现阶段 ,谁还能相信法国政府的话 ,更不用说希特勒的话了。在这种情况下 ,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 ,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他在后来写道 :“这是我有生以来作出的最痛苦和最残酷的一项可怕的决定。然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时 ,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苑月 猿日清晨 ,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泊在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 ,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 ~~源~~ 艘、驱逐舰 ~~愿~~ 艘、潜艇若干 ,以及大约 ~~圆~~ 艘小型舰支。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 ,双方各死一人 ,三名英军受伤。当天 ,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 ,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 ,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 ,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 ,但同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在这次事件中 ,许多法国水兵丧失了生命。

当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上获悉这一消息时 ,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愤怒到了极点。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

出于正当的保障安全的动机 ,而且还由于“ 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西斯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 ”所致 ,但是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当斯皮尔斯将军前去拜访戴高乐时 ,他的怒气已经平息下来了。斯皮尔斯后来写道 : “ 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客观态度令人惊诧 ,显然他是经过许多考虑的。他对我说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但对他来说 ,他不得不考虑是继续与我们合作呢 ? 还是从此离开政治舞台 ,隐居到加拿大去当一名普通公民。经过一夜的辗转翻侧 ,第二天 ,戴高乐选择了前者。 ”

丘吉尔对贝当元帅的反应不太在乎 ,但对戴高乐的反应十分关心 ,当他从斯皮尔斯将军的汇报中得知了戴高乐的态度时 ,深受感动。但更让丘吉尔感动的是 ,缘天之后 ,戴高乐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 ,明智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演说中谴责了这个“ 可悲的 ,可恶的 ”行动 ,毫无疑问 ,在这一点上他要取得和法国公众的一致看法。同时 ,他吁请法国人 ,请他们从事物的根本上 ,即从我们的胜利和解放上 ,去看问题。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与其说有朝一日德国人用这些法国军舰来打击英国和法兰西帝国 ,不如干脆把它们毁了。特别是戴高乐在演讲中强调 : “ 波尔多政府出于被奴役的地位 ,必然会把这场炮火说成是兄弟阋墙 ,并设法把法国人的愤怒转移到被出卖的盟国身上。敌人作为征服者也会利用这次事件来挑唆英法两国人民之间的不满。但我相信 ,两国人民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者也必然会看到 : 尽管这是个不幸和可憎的悲惨事件 ,但决不能因此而造成英法两国人民之间在精神上的对抗。……至于完全按照法国的荣誉和利益而自由行

事的法国人 ,谨以他们的名义宣布 :他们已经永远地下定决心 ,要继续战斗下去。”

戴高乐这篇演讲深深打动了丘吉尔 ,也证明了戴高乐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着眼于大局 ,巧妙地将这个已经发生了、用任何方式也无法弥补的战场上的损失 ,用来唤起丘吉尔今后对自由法国的更大的关心 ,并增加了今后自由法国在英国的上层人物心目中的份量。

在英国的艰辛岁月里 ,戴高乐从一个职业军人逐渐成长为一名融军人的果断和政治家的谋略于一身的政界要人。他用自己的策略赢得了丘吉尔的鼎力相助 ,最终获得一席之地。以至英国上层不断接到丘吉尔的告诫 :“请务必将我们今后散发的有关法国或法国殖民地的传单事先都征询戴高乐的意思。”如法属印度要与我们发展商业关系 ,它必须先归顺戴高乐将军 ,否则不行。像这样的事情 ,不能随便马虎 ,一定转告印度事务大臣。”难怪有人说 ,戴高乐是首相和英国的朋友 ,不能得罪他。

戴高乐很清楚 ,要想在英国人面前伸直腰杆 ,自己必须要有实力。虽然 ,自由法国已初具规模 ,但在军事方面的贡献小得可怜 ,与英国方面相比似乎逊色多了。这是戴高乐心中的一块石头 ,他苦思冥想 ,决定在敏感的情报工作方面拿英国一手。

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战争 ,都少不了情报 ,而在搞情报方面 ,英国人当时又离不开戴高乐。法国的沦陷和英国远征军的撤离 ,都来得很突然 ,因此 ,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在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情报人员。后来凡是到英国来投奔戴高乐将军的法国人都要首先受到英国人的盘问 ,不久 ,在伦敦郊区

还建立了一个称作“爱国学校”的特别机构。英国人用各种办法说服新来的法国人直接在英国人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显然,英国迫切需要情报人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戴高乐不失时机地决定任命德瓦弗兰,这位得过法学学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年轻人,为他参谋部的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并负责搞情报工作。德瓦弗兰最后在被占的法国建立起一个情报网,它对英国和盟国事业的贡献与日俱增。无疑,戴高乐巧妙的这一做法,使自由法国在低人一等的情况下与英国进行交涉时,手中有了一张王牌。

当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权力膨胀深感不安,想用法国人来“冲淡”戴高乐的极权思想时,遭到了戴高乐坚决机智的回击。

当时,在伦敦的法国人中,有一些是反对戴高乐的。德斯蒙德·莫顿在致首相函中就这样说道:“据我了解,自由法国总部的成员们,也和我们一样,开始对他的领袖的难以相处和不冷静的性格感到厌倦。……相当数量的自由法国人和运动外的某些好心的法国人也都在郑重地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能控制将军政治行为的委员会的方法。况且有一个叫谬塞利埃的海军上将曾经说过,戴高乐染有狂妄症。……领袖的这个脾气得改一改,否则就得改变领袖。”丘吉尔决定利用这个人,去挟迫戴高乐的权力。由于丘吉尔还不想彻底与戴高乐闹翻,所以他命令无处不去的德斯蒙德·莫顿“混入谬塞利埃集团”随时将情报报告首相。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建议戴高乐建立一个完全正规的委员会,用委员会的形式实现自由法国的民主,即瓦解戴高乐。

有丘吉尔的撑腰,谬塞利埃起草了一份要求在最短期间

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的通知交给了戴高乐，并声称，今后未经该委员会同意，不得再作出任何决定和发表任何声明。海军上将当然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而戴高乐将成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事后，这位海军上将还表示：如果戴高乐不接受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当局，他和“他的”舰队将一起交由英方指挥，不再隶属戴高乐将军。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分裂威胁。

戴高乐此刻很冷静，他对来访的缪塞利埃直言相告，委员会的新主人不能是别人，只能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当海军上将拒绝加入该委员时，戴高乐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缪塞利埃勃然大怒，声称，海军“将独立地进行战争”。戴高乐闻讯后，立即给这位海军上将发了一份正式的最后通牒：“当您作出脱离自由法国并将我委托您指挥的海军从自由法国分离出去的决定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职权范围。……自由法国部队的官兵都应同自由法国人一样，按照应募合约，信守诺言和受我的权力的约束。……鉴于您过去的功绩和某些非战流亡分子对您的恶劣影响，我给您 24 小时的考虑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我将采取必要措施以排除损害，并将您的行为公诸于众，由舆论谴责。我一定能得到我们所在的土地上的盟国的支持，因为他们承认我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在这份软硬兼施的最后通牒中，特别是最后一句，让丘吉尔也深感不安。戴高乐将了他一军。他只好出面调停，结果，此时已被置于英海军部保护之下的缪塞利埃，向戴高乐写了一封求和信。当天下午，戴高乐召见了海军上将。但他表示，缪塞利埃对他不忠，他们不能合作共事。无奈，英国调停工作重新开始。戴高乐和缪塞利埃双方被“请”到了英外交部。

戴高乐与艾登一起会谈了好几个小时，谬塞利埃则在隔壁房间与英海军大臣会谈，副大臣卡多根则在两室之间进行穿梭。闹剧收场了，戴高乐大获全胜。他这种惩一儆百的做法，既稳定了他在自由法国内部的地位，也使丘吉尔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算。

在一件关系到自由法国前途的重大事件中，戴高乐再次用自己杰出的才智，为法国赢得了声誉。

那是在承认戴高乐将军为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之后，英法开始进行关于缔结一项在英国的法国志愿人员的征集、组织和服役条件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困难，因为戴高乐的外交地位是没有先例的，他的需要又很高，他认为自己就代表法国的意见，这使英国外交部感到很为难。斯皮尔斯将军是这次谈判的最好见证人，他后来回忆道：“陛下政府与戴高乐将军之间签订协定的谈判，是由戴高乐将军的法律顾问卡森负责进行的，其激烈艰巨的程度使外交部里最随和的人也对我们的表现感到厌烦。”

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双方对主要各点达成协议：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将组建一支包括海陆空军部队和科学技术特种部队在内的法国志愿部队。……这支部队将尽可能在人员，特别是纪律、语言、晋升、配属方面，保持法国部队的特点。……陛下政府将在条件许可时向法国部队提供与英国同类部队相等的必要的物质补给。”戴高乐将军则表示：“接受英军司令部的总的指挥，但仍保持对法国部队的最高指挥权。”这再次体现了戴高乐的现实主义思想。他还希望确定一种方式，以便保证这支力量的民族特性，并限制英国人使用这支力量去进行他所不同意的战斗。

这个由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斯特兰同最早投靠戴高乐将军的著名法学家卡森教授进行的会谈,还因一项巨大困难使协定迟迟不能签字,这就是在法国失败后,英国曾在法国的三军人员中征募了许多法国军官、士兵和技术人员。英国的有关部长对这种做法都非常满意。他们试图拒绝戴高乐对这些已经征募和今后还要征募的人行使任何权力。双方经过多次讨论,仍相持不下,最后丘吉尔只能作出了有利于戴高乐的裁决,并通知部长们“这些人最好还是让他们回到本国的部队去”。之后双方达成了正式协议,并于 1944 年 1 月 20 日发表。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个大厦的基石。但戴高乐对这个协议并不完全满意。他曾试图说服英国不仅对恢复法国本土的疆界,而且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这等于是要从法律上使英国人打消他们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这反映了戴高乐将军对英国政府抱有的戒备防范心里。他以高度的外交策略,先发制人,使丘吉尔不得不保证,今后“对全部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地位,……当尽与为之”。

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戴高乐和丘吉尔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们对 1940 年 6 月以来共同经历的惨淡日子,刻骨铭心。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两位热爱祖国,深知理想对人类意志的作用的伟大人物紧紧靠在一起了。

戴高乐这时期在外交活动方面,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他用灵活善变的超然态度,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在对外关系,在

涉及帝国利益的问题上 ,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 高大的强硬者的形象 ”。

三、避实就虚开拓非洲

大凡伟人的事业都不是依靠流亡生活筑造的。当然 ,一旦形势与己不利 ,自己不能与对方取得绝对竞争优势时 ,不防转移阵地寻求相对竞争优势于其对抗。这时的流亡是曲折中的前进 ,但只能是权宜之计 ,等待时机成熟后 ,必须为自己建立稳定的战略后方 ,而不能搞流寇主义。

戴高乐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坚韧不拔的果敢精神 ,在丘吉尔的鼎力相助下 ,终于建立起一支 ~~死国~~ 死国人的武装部队 ,将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了起来 ,有了自己的武装和一个新法国的雏形。随后 ,戴高乐就一直在设想使之能尽早进入战争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肩上那沉甸甸的份量。此刻 ,他已将注意力转向了非洲 ,他觉得非洲是个最好行动的场所。在那里 ,法国有了广阔的土地 ,必须保卫这些土地免受德国和维希的侵占 ,甚至还必须保卫这些土地免受英国和美国的染指 ,因为英美正想利用这些土地来为他们自己的战争和利益服务 ,而且这些非洲土地对自由法国来讲 ,是最好的根据地。有了它 ,自由法国不再是个流亡运动 ,而成了在自己国土上的独立主权政府。从这点上来看 ,戴高乐把非洲看成是今后重新征服欧洲的理想跳板。

戴高乐开始曾寄希望于法兰西帝国会爆发一场反德大起义 ,好以此为契机 ,反攻回去。但这种希望很渺茫 ,最后成了泡影。因此 ,他决定从法属非洲殖民地开始主动行动。这中间的情况很复杂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北非 ,诺盖将军

抵制媾和达三天之久 ,但却最终接受了停战。在印度支那 ,卡特鲁将军坚持反对投降 ,但却同意让维希政府委派的总督来接替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皮奥总督和密特奥塞将军最终也接受了停战。密特奥塞将军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则非常坚决 ,他设法使科潘斯克将军指挥的波兰旅越过边境进入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德拉米纳打算更进一步组建一支法国义勇军 ,但遭到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拒绝。结果 ,驻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 苑万维希部队中 ,投靠自由法国的只有数百人。至于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由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指挥的舰队 ,只有 远名军官、二三十名准尉和水兵投靠戴高乐。

相反在赤道非洲形势更为有利。在喀麦隆和乍得 ,掀起了最强烈的反投降浪潮。在法国委任统治地喀麦隆 ,人们意识到 ,要是德国获胜 ,这块殖民地就会重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尽管布津诺总督不愿表态 ,但在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领导下 ,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宣布支持戴高乐。在乍得 ,被戴高乐称作“热情的法国黑人”的弗利克斯·埃布埃总督有许多理由反对希特勒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 ,对此深恶痛绝。埃布埃表示他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除此之外法属非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不是模棱两可 ,就是令人泄气。法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反对投降 ,但当他从布拉柴维尔调往达喀尔 ,升任更为重要的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高级专员时 ,态度转了 员园度 ,倒向了维希那边。在乌维吉(现称中非共和国) ,人们是赞成抗战的 ,但是需经过布拉柴维尔方面的同意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采取什么大胆行动。加蓬的

态度令人捉摸不透 ,但沉默中很可能怀有敌意。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 ,戴高乐权衡再三 ,决定因势利导 ,先找准突破口 ,深入进去之后 ,再扩大战果。他准备首先将乍得、喀麦隆和刚果联合起来。这一计划得到了英国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的帮助。他看到戴高乐这项计划对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交给戴高乐将军一架飞机 ,让他把自由法国的几个“说客”从伦敦送往拉各斯。原计划去三个人 :普利文、帕朗少校和戴高乐的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具体行程是 :第一步先到乍得的拉密堡。在那里 ,他们将会见埃布埃总督 ,设法说服他 ,争取使乍得归附自由法国。第二步 ,到杜阿拉去帮助莫克莱尔和他的行动委员会 ,发动计划中的“政变” ,使喀麦隆倒向戴高乐。就在他们准备启程时 ,又增加了一个“说客” ,此人就是勒克莱尔。

以上这两步 ,戴高乐把握很大。现在困难的是如何争取刚果。戴高乐认为最适宜派去的人是德拉米纳上校。此人刚从地中海东部脱险 ,正在开罗。给他的任务是拿下这个行政区的首府布拉柴维尔 ,那里的政权机构不仅控制着法属刚果、而且也控制着刚果、乌班吉、加蓬等几个毗邻的殖民地。戴高乐派出的这五位坚决果断的年轻人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而且没有流一滴血。到愿月底 ,计划得到了实现 ,乍得、喀麦隆、刚果和乌班吉都站了过来。这是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戴高乐下一个目标是争取达喀尔。他在斯皮尔斯将军和莫顿少校的帮助下 ,制订了一项和平联合西非集团及其海军基地的计划。戴高乐后来写道 : “我的最初打算是避免直接

攻击。我想在距达喀尔较远的地方 , 让一支坚强的纵队登陆 , 然后逐步向目标挺进 , 沿途将有关的国家和部队联合起来。如此以来 , 自由法国的部队可望在不断扩大影响中发展壮大 , 并通过陆地到达达喀尔。我原先考虑的登陆地点是科纳克里。从那里 , 我们可以利用铁路和连续不断的公路 , 直达西非首都。但是为了防止达喀尔舰队消灭远征军 , 必须有海上掩护。为此我不得不求助于英国舰队。我将此计划告知了丘吉尔。”

丘吉尔深知达喀尔对英国的极端重要性。这个基地一旦落入德国之手 , 英国前往中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全部海上交通将处于德国舰队的控制之下 , 并将直接威胁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反之 , 如果英国能控制住达喀尔 , 大西洋战役将会大大改观。因此 , 英国决定派一支庞大的舰队进行远征。但他不同意戴高乐缓慢前进的计划 , 因为英国不可能将重要的舰队在这个时刻长期闲置在赤道附近。经过慎重思考 , 戴高乐决定听从英国的意见 , 采取快捷行动。因为 , 戴高乐认为 , 这个行动如果有我们参加 , 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归顺自由法国的行动 , 相反 , 如果我们不参加 , 英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 , 迟早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与其让达喀尔向英国人投降 , 使法国主权受损 , 不如现在双方联手 , 争取我们自由法国做达喀尔的主人。

丘吉尔还用他生动的口才描绘了如下一幅图景 : 忧郁而迟疑的达喀尔在晨曦中醒来。居民们在晨曦的照耀下 , 突然发现远处海面上布满了舰艇。多庞大的舰队 ! 上百艘战船和货船 ! 货船慢慢驶向岸边 , 用无线电向全城、向海军、向当地驻军 , 送去友好的信息。一部舰只升起了三色旗 , 其余的打着

英、荷、波、比国旗从盟国的舰队中放下一只小船，议员们打着的旗进入港口，把戴高乐的代表送上岸去。代表们来到总督府告诉总督，如果允许我们登陆，盟国的军队就立即撤走，相反，选择战争将被彻底粉碎。看得出，这时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未来充满信心。但由于种种原因，戴高乐的达喀尔计划失败了。这虽然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戴高乐并没有灰心，仍然在顽强斗争。他甚至计划在乍得和利比里亚边境荒凉偏僻的沙漠里建立一个撒哈拉作战基地，以期有朝一日法国部队能攻取费赞，并从那里打到地中海去。他还打算派一支自由法国远征军到中东去和英国人配合作战。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法属北非。

戴高乐决心成为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自由法国必须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于是，1944年6月4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当时也是进行抵抗的法国首都，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一面谴责维希政府违反宪法，对侵略者唯命是从；一面向人民庄严保证，一旦法国人民能自由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他的一切行动将向代表们负责。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他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还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任命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等一批军政要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戴高乐本人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性，戴高乐在离开布拉柴维尔之前，于6月5日又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整个法国。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 ,戴高乐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 ,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流浪汉。在非洲他建立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表明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业已建立起来了。

四、软硬兼施摇联美挟英

戴高乐在整个二战期间 ,念念不忘的是作为一个法国的历史地位 ,再加上他那十分顽固而倔强的性格 ,他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每一次的争执都使双方心理蒙上一层阴影 ,也加重了戴高乐的思想负担。他尽力争取所有海外领地和属地都投入战争 ,以免被人说成是英国的雇佣军。他要将自由法国的士兵派往所有的战场 ,以迫使盟国承认自由法国的伙伴国和共同参战国的地位。这些任务的完成是在不理解、不支持、不合作、甚至积极或消极的反对声中实现的。与此同时 ,他还要在暗地里与英国的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殖民部、情报处、外交部、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进行战斗。

1944年冬季将要来临的时候 ,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了。人们通过它的政治、军事、领土和戴高乐越来越高的威信看到了一个正在恢复、建立的新法国。这对于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来讲 ,意味着今后他可利用的国际良机将越来越多。虽然他免不了还得依赖英国的善意 ,但他认为应在外交上寻找新的方式 ,设法寻找其他盟友并与其发展友好关系 ,以尽可能减少对英国的依赖 ,争取主动。只有

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 ,利用各自的利害冲突 ,相互制约 ,才能使自由法国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成为可能。

戴高乐决定与美国和苏联接触。最让他头痛的是与华盛顿关系的开展。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迥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 ,进入哈佛大学学习 ,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 ,他成为“新政”的总统 ,震撼了美国 ,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 ,精明强干 ,身残志坚 ;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 ,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 ,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 ,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直到战争爆发前 ,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 ,表明他在军事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 ,很久之后 ,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 ,他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勇敢、朝气蓬勃的军人气质。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 ,他在近一年的时间 ,客居英国 ,致力于重整法国的艰苦奋斗。随着法兰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 ,戴高乐“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 。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融进了他的政治活动中 ,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 ,而是挑战和对抗。

两人存在着很大政治分歧 ,不能不说与其各自的性格有关。他们都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 ,谁也不承认对方的优势。

罗斯福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夺取、保持绝对的权力;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强烈的大国优越感,希望主宰世界,当然包括主宰法国的命运。

因此,当戴高乐的事业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广泛热烈的反应时,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在罗斯福看来,戴高乐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法国将军”,特别是自从1944年12月以来,他对一般的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的将军,已不怀多大的敬意。在华盛顿的眼中,这位戴高乐将军似乎还是英国人的制造物,他在达喀尔行动中遭到的惨败,还被有些人说成是具有法西斯倾向。凡此种种,足以使戴高乐不能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当然也不能成为美国的对话人,戴高乐遭到排斥。美国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着关系,自1944年秋以来,罗斯福总统、科德尔·赫尔国务卿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在努力保持着与贝当政府的良好关系。其目的是尽量让法国脱离德国影响,以免把海军舰队移交给德国,和魏刚、诺盖和布伊松保持接触,希望说服他们有朝一日能为罗斯福打开非洲大门。

总之,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政见分歧造成了自由法国与华盛顿之间矛盾重重。尽管如此,戴高乐坚持认为,争取美国,取得它的援助,可以作为与英国抗衡的一张牌。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1945年12月,戴高乐派出他的得力干将普利文前往美国,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解决同美国国务院建立永久、直接的关系,自由法属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直接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问题;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在美国成立我们的委员会,把同情我们

的美国人给我们的帮助组织起来。”戴高乐还告诉普利文，完成这些任务，在美国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另外戴高乐还指示，自由法国可以将喀麦隆、乍得、刚果以及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提供给美国，用于建立空军基地。当年丘吉尔用此法获取了美国的军舰，而今戴高乐用同样的方法是为争取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戴高乐曾对《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乔治·韦勒说：我曾向美国建议利用法国在非洲的海湾作为与希特勒作战的海军基地。我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长期租借——大体上相当于英国人向美国提供他们的大西洋基地时所作出的安排。但我没有要求对方提供驱逐舰作为交换，我只是要求美国利用这些基地来与达喀尔相抗衡以阻止希特勒更加深入非洲。希特勒一旦能从俄国战线撤出他的部队，就必然会这样做。”戴高乐这一举措对美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北非在维希的控制之下，美国人将来有可能需要在非洲建立这样的基地，以便在欧洲采取战争行动。另外，日本人在太平洋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威胁看来也十分明显。事实上，美国政府不久就要求利用在非洲以及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的便利条件。

为了与美国的关系能发展下去，戴高乐曾多次派代表团去华盛顿，并几次表示愿与国务院合作。尽管他很想得到美国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支持和承认，但戴高乐并不准备低三下四，更不准备在原则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例如，在“戴高乐代表整个法国”这一问题上，他始终对此坚定不移。当普利文告诉戴高乐，美国国务院邀请他以“专家身份而不是以任何代表身份”参加会谈时，戴高乐叫他坚持原则。在愿月怨日，戴高乐给普利文发了一封电报，重申了他的不可动摇

的立场：一般说来，你很清楚，我们所要求的是美国提供作战物资，而不是什么救济品。我知道，国务院目前准备提供医疗用品，而不愿提供武器。如果他们不提供武器，我们就拒绝接受医疗用品。遵循老一套方针行事的幻想在华盛顿显然还很流行。他们偏袒维希，也就是说，偏袒一手培植了维希的希特勒。你是代表法国的，我不同意你仅仅以专家身份参加美、英、法三方会议。要出席，就得同其他与会者享有同等权利，否则就干脆不出席。”

戴高乐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主动给予和原则问题不让步的两手策略，有时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奈何不了。对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的解决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两个位于纽芬兰洋面上的并非多么重要的法属小岛。事件在开始时本来是件小事，却突然爆发成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戴高乐将军早在 1941 年 9 月前往达喀尔途中就曾设想：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以及法属奎亚那，组织一次“自发改变其行政领导”的行动。事实上，在这两个小岛上的 4000 居民中，绝大部分都对维希不表同情。但维希派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却牢牢控制着他们。为此，戴高乐在 1941 年 9 月写信给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只要有“英国舰队的合作和华盛顿的默许”，这两个岛的解放是“易如反掌”的。英国当局认为这样一次行动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在圣皮埃尔岛上设有一座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台，这是维希派进行亲德宣传的工具，经常向美国为维希作广播宣传，并把盟国运输队在大西洋上的位置报告给德国潜艇。为此，英国当然希望这些岛屿能尽早置于盟国的管辖之下，但考虑到

它的地理位置 ,取得加拿大政府的同意是必要的——当然又要取得美国当局的许可。所以 ,当 1945 年秋戴高乐向艾登表示要收复这两个岛屿时 ,艾登就是这样回答他的。加拿大政府很快就同意了 ,剩下是华盛顿的问题。

戴高乐本人认为 ,美国人如果同意 ,那固然是好 ,但也不是非得得到他们的同意不可 ,因为在他看来 ,占领这些岛屿完全是法国的内部事务。当时的戴高乐已完全下定决心要将美洲地区的法属领地重新收回。

美国虽然此时已经对德日宣战。但奇怪的是 ,甚至珍珠港事件也未改变美国对维希的政策。罗斯福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后不久 ,还与维希驻安的列斯、圭亚那和圣皮埃尔的高级专员海军上将罗伯尔 ,缔结了一项保持法国在西半球的所有领地的现状的协议。另外 ,罗斯福还以个人名义通知贝当元帅 ,美国仍遵守哈瓦那协议。至于在圣皮埃尔的发射台 ,美国正与加拿大进行谈判 ,双方同意由加拿大派无线电操作人员去圣皮埃尔岛 ,以便监视发射不损害盟国事业 ;如该岛拒绝 ,可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正当谈判在顺利进行时 ,国务院于 1941 年 12 月 17 日接到了英外交部的消息 ,通知它自由法国人准备收复该岛的计划。英外交部还表示陛下政府对该计划的实施并无异议 ,但它想知道该计划的实施“对美国政府有无妨碍”。

此举并非多余。果然 ,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行动。而且戴高乐也得到这样一条消息 :“听说美国与加拿大政府已经研究了一项由加拿大派人接管发射台的计划 ,并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对此他想了很多 :加拿大人真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他们只是为了谋取情报 ?还是为谋取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找一个借口 ?不管怎样 ,他后来写道 :“当我一听说外国

要对法国的领土采取行动时 ,我觉得已不容许我再有丝毫犹豫了。我当即命令海军上将谬塞利埃立刻收复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

戴高乐认为此事毋须通知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在 1944 年 12 月 24 日 ,战争终于敲开美国大门时 ,戴高乐讲了一句预言性很强的话 :“从今往后 ,英国人要是没有罗斯福的同意 ,将什么也不能干了。”在圣诞节前夕 ,海军上将谬塞利埃率领自由法国的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圣皮埃尔岛。他们受到了岛上居民的极为热情的欢迎 ,根本不用使用武力。在随后举行的公民投票中 ,90% 以上的人同意回归自由法国。年轻人立即报名参加自由法国的军队 ,年纪较大的则着手组织地方自卫队。戴高乐任命他的特使萨瓦里接替维希派的高级专员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

人们很可能认为 ,这只是件小事 ,干得很漂亮 ,各方都很满意。其实 ,罗斯福与丘吉尔开始也都未给予重视 ,但美国国务卿赫尔深感自己受到侮辱。他后来写道 :“尽管这些岛屿并不重要 ,但自由法国人用武力占领它 ,将可能严重损害我们与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随即国务卿发表了如下一份公报 ,以表示他的愤懑 :

我们得到的最初报告证明 ,由“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战舰在圣皮埃尔采取的行动 ,纯属一项专横行动。它违背了有关各方的协议 ,并未经通知和取得美国政府的事先同意。美国政府已要求加拿大政府研究采取何种措施以恢复这些岛屿的原状。

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戴高乐泰然自若 ,但毫不让步。相反 ,局势于美国不利。加拿大首相说 :他不准备恢复维

希在圣皮埃尔岛上的权力 ,因为“ 加拿大公众舆论对戴高乐将军行动的反应是既宽慰又兴奋 ”。美国的公众舆论对这一行动的反应也是兴高采烈的 ,因为这毕竟是由美国的一个盟友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而采取的行动。因此 ,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报界都对国务卿的“ 所谓的自由法国人 ”的说法 ,反应强烈 ,引起人们普遍愤慨。不走运的赫尔在随后几周中 ,收到了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大量咒骂信 ,信上都写着 :致“ 所谓的国务院 ”和“ 所谓的国务卿 ”。赫尔把事情估计错了 ,但他仍然坚持他的政策 ,力图说服丘吉尔 ,迫使自由法国人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撤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迫于美国压力拜访了戴高乐 ,试图劝说戴高乐同意让这些岛屿保持中立 ,脱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而独立 ,并接受盟国的共同管理 ,戴高乐坚决给予回绝。艾登威胁说 ,如果美国派军队去呢 ? 戴高乐讲 ,那将会是一场可怕的战争。

戴高乐终于获胜了。他用灵活的软硬兼施手段 ,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他可以主动租让领地 ,以求获得美国支持而胁迫英国对自己减少干预 ;他也可以坚决夺回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 ,而决不让别国染指 ,从而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

五、不卑不亢摇灵活外交

1944年 6月 24日 ,戴高乐历尽千辛 ,终于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 ,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今天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 ,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天日的幸

福时刻。人们选择了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和希望的象征。人们没有忘记,在法兰西民族处于最黑暗的年代,在贝当元帅将神圣的国土和人民拱手让敌的时刻,是戴高乐向海内外发出了庄严的抗战号召,是戴高乐领导法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人们忘不了他。

戴高乐先后在凯旋门广场,在园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的门前,走到无数的法国同胞中间。面黄饥瘦的儿童手舞足蹈向他大声欢呼!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妇女们笑逐颜开,向他高呼万岁!老年人流着热泪向他致敬!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戴高乐。望着这些患难与共的人们,他想:至于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担当国家命运的舵手……我应当总结一下已经完成的事业,筹划一下我的将来。今天统一大业完成了。这个统一奠基于布拉柴维尔,成长于阿尔及尔,而完成于巴黎。这个曾经饱受灾难、悲痛和分裂的法兰西,现在又能勇敢地把目前的这出戏唱到底,胜利地收复全国的领土,恢复它的地位和尊严。”这段内心独白,让我们看清了在胜利的狂欢面前,戴高乐清醒的头脑。他不会沉湎于此,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也将更难走。但戴高乐充满信心。

几多风雨之后,1958年12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959年1月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这是个棘手的殖民地问题。它曾让第四共和国难以对付,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历史,终于被戴高乐用他那坚强斗争的毅力和智谋改写了。

面对当时的现状,戴高乐权衡利弊之后,决心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果断甩掉这个包袱,使法国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死胡同中脱身出来。他认为,这条死胡同妨碍了法国的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清楚地知道,阻力将相当大,无论在政界和军界都有极大的反对势力,他们顽固地坚持和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他如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最终意图,可能会丧失不久前才取得的权力,所以他采取了隐蔽意图的秘而不宣的策略。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了拥护,终于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地化。他还决定,让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份,甚至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自行独立。作为先例,在 1958 年 7 月,戴高乐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法国从这两个领地上撤军的协议。

戴高乐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军、政界殖民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戴高乐是恶魔、是反基督的,是卖国贼。这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1958 年 10 月至 1960 年 1 月,曾发生了多起叛乱和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仅谋杀事件就发生了四起,其中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但都失败了。一次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 100 磅

炸药没有爆炸,戴高乐的防弹车冲了过去。这一次由于技术故障,戴高乐幸免于难,另一次则是出于奇迹。1944年11月11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里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的那辆坚固的雪铁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另外两颗击中了防弹车轮胎,但没有打穿。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戴高乐的大无畏气概可见一斑。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据统计,因为战争,法兰西的财富已经有三分之一化为乌有——先后有100万座房屋完全被毁,100万座房屋遭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也大部分遭到破坏;有100万公顷土地已不能耕种,另有100万公顷由于10年没有经心耕种已濒于荒芜;到处都缺乏种籽、肥料、农具;家畜减少了一半。总之,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使法兰西共损失100万亿1936年的法郎,相当于解放后的100万亿法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经济失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在财政方面国债如山,在预算方面必须长期地为重建而拨出巨款。法国就是这样一个满目疮痍而又潜伏着四分五裂危机的国家。戴高乐不由得哀叹道:“光明大道已经打通,但法兰西却成了一个破烂摊子!”

战后法国重整国力除了国内人民艰苦创业、辛勤努力之外,经济的恢复还受益于美国援助,但同时也形成了受制于人的局面。随着国家的复兴,法国人民重塑自己完整独立形象的愿望趋于强烈。1944年11月戴高乐当选总统后,顺应民意,提出并执着推行以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世

界政治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戴高乐主义”。他不失时机地提出法国要分享世界领导权的要求。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这个目的奠定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基础。1946年12月16日他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那份著名的、却是失败的备忘录的基础。他在备忘录中提议，在联盟中建立一个三大国理事会。这个备忘录表露了戴高乐的如意算盘：如果它被接纳的话，他就可以一举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遭到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

在美国人看来，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要求，就等于给予一个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超级大国的地位。戴高乐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曾透露法国很愿意购买这类武器，但有一个条件，即这类武器一旦为法国所有，就必须置于法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不管得到得不到援助和指导，法国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大国。1958年12月16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这意味着从此法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个国家。这是戴高乐与美国抗衡的一个果敢行动。

在西欧问题上，戴高乐反对美国把西欧引向建立超国家实体的主张，推行用“欧洲人的欧洲”来代替“大西洋的欧洲”的方针，同美国提出的西欧联合模式大唱反调。因此，为了打破雅尔塔会议确定的欧洲“两极分治”格局，摆脱美国政治军事控制，戴高乐决然领导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

对戴高乐来说，雅尔塔会议如骨鲠在喉，使他难以忍受。法国即戴高乐将军竟被排斥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之外。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会议牵涉到法国利益，而这位毕生“对法国有一定之见”的人竟没有出场。这造成了

戴高乐将军的对外政策——一贯反美，反得十分离奇古怪。1959年猿月，戴高乐准备对墨西哥进行正式访问。行前，医生发现他身上长了一个瘤，排尿受阻，但他不愿推迟这次访问，决定由泌尿专家阿布尔克在他的膀胱中安装一根导管，待到访问结束，再进行手术。当阿布尔克安置导管的时候，戴高乐对他说，希望会见制造导管的医生，以便表示他个人的祝贺。阿布尔克答道，这大概不容易，因为导管的制作者是个美国人，还不知住在美国什么地方。听他这么一说，戴高乐马上面红耳赤地叫嚷起来：“上帝，难道没有法国的吗？”随后，他又叹了一口气，轻声地说：“博士，我不愿让人知道，是你为我安装了根美国导管。您得把这个视为国家机密。”戴高乐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由于长期积累的对美不满因素，使他一直颇为愤懑。所以，对他自己身上安装的一根美国导管也感到极端厌恶，才这么“小题大做”。

同时，为了广泛联络，戴高乐还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的阻挠，首先在1959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9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富尔对新中国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探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1959年11月10日，面对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这一状况，法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说，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在国际舞台上，戴高乐注重根据法国自己的利益塑造独立的政治形象，在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势力范围划分等广阔领域内，敢于同美

国分庭抗礼 ,自行其是。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重大行动。同中国建交 ,再次表明了戴高乐不畏强权 ,傲视美国的独立自主精神。

四十年代后期 ,以苏联和美国为盟主的东西方阵营先后形成 ,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着东西方冷战逐步升级 ,苏联对东欧、美国对西欧的控制也不断加深。戴高乐认为 ,法国要赢得完整的独立单凭其自身的力量不行 ,必须以法德合作为核心 ,推动实现西欧的政治联合 ,使之逐渐发展为介于苏美之间举足轻重的“ 第三种力量 ” ,这种力量格局的出现不仅可以阻止苏美在欧洲的扩张 ,而且能使法国获得政治大国地位。

谋求西欧联合 ,法德合作是关键环节。戴高乐一改法国历史上多年来提防遏制德国的外交传统 ,不再把德国看成是威胁法国安全的力量 ,主张摒弃历史积怨 ,大力推进法德和解与亲善政策。他当政后立即谋划同联邦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进行会晤 ,双方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和 11 日在科龙贝教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戴高乐之所以不在巴黎选择一些更为正式的场所 ,而选中这个地方 ,为的是表示他个人对这位德国领导人的友谊和尊重。这次会议实际上等于双方声明愿在和解、互通有无和交流技术的基础上 ,揭开法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经过长期顽强的努力 ,法德两国于 1963 年 1 月签订了“ 没有第三者干预 ”的友好合作条约 ,从而把法德关系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并使之成为促成西欧联合的重要支柱。1965 年上半年 ,经戴高乐倡导和斡旋 ,“ 欧洲共同体 ”六国首脑在没有美国人的参与下 ,先后在法国和德国举行了数次高级会议 ,商讨西欧联合的方案 ,从而将西欧联合的实践推向新的高潮。

由于实力不足和各方认识上的分歧 ,戴高乐在任期内实现西欧联合的设想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不向超级大国屈服 ,百折不挠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精神和积极推进西欧联合的基本构想 ,符合时代的潮流 ,为国际反霸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 “戴高乐主义”仍在西欧流行 ,并成为那里反霸和独立自主的同义词。

总之 ,二战后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 5 年间 ,使法国社会深深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他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 ,充满了对霸权的藐视 ,并始终强调尊严和独立。它的总方针就是重新选择盟友 ,寻求法国与盟友间的新平衡。它在保持与西方盟国友好关系的同时 ,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紧张的局势 ,进而达成谅解 ,最后进行合作。同西方盟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法国 ,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建立了本国的核“打击力量” ,并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要求。该共同体历经曲折 ,最终还是按法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进行了改组。在该组织内 ,六个参加国都保持了各自的全部主权。法德和解、法中建交等等 ,戴高乐的外交路线表达了他在争夺势力范围的微妙角逐中顽强地促进法国强大的愿望 ,同时也显示了戴高乐是掌握力量与和解之间分寸的巨匠。

六、加强权力摇结束动乱

1958 年 1 月 ,57 岁的戴高乐 ,重返政坛 ,出任总理 ,1958 年 6 月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 ,因为 ,1958 年 5 月 ,法国派驻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将领和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发动了军事叛乱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内战迫在眉睫 ,法国危在旦夕。等待了 5 年之久的戴高

乐终于获得了重新执政的机会 ,成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对在此形势下上台的戴高乐 ,人们议论纷纷。戴高乐的权力是极不稳固的。

同所有政治家一样 ,戴高乐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必须把保住权力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他上台后走的第一步棋就是调整 and 改革国家政体 ,制定一部大大扩充总统权力的根本大法 ,以保证建立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权。他在 1958 年 12 月 13 日发表的《贝叶讲话》,就曾阐述过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他以为 ,党派林立 ,相互争斗 ,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 ,因此必须反对“政党政治” ,行政权应当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予” 。但由于法国长期受共和议会制传统的影响 ,戴高乐的主张未能为人们所接受。

议会民主制得到加强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之后 ,殖民战争连绵不断 ,经济困难重重 ,政局长期动荡不定 ,内阁更迭频繁。人们对此感到厌倦 ,特别是经过阿尔及利亚军事暴乱之后 ,人心思定思安。戴高乐正是利用人们怕内战、求稳定的心理 ,并借国民议会授予他 6 个月政治全权和修改宪法的权力之机 ,加紧新宪法的制定工作。

鉴于各政党仍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地位和作用被削弱 ,民众又害怕过分扩大总统权力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戴高乐大力开展对新宪法的宣传 ,一方面宣称只有新宪法才能保证局势的稳定 ,如果新宪法草案被拒绝 ,法国就会发生内战。另一方面 ,他极力表白不愿意干涉公众的自由。这时 ,与 1958 年相比所不同的是 ,戴高乐已不得不重新认识他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 ,而承认它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 ,他在大力扩充和加强总统权力的同时 ,尽可能地吸收除共产党外的其他

主要政党参加政府 ,以显示他对民主的尊重 ,并消除人们的疑虑。

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广泛的宣传 ,制定新宪法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958年 12月 公布了新宪法草案 ,1959年 1月 1日交付公民投票。尽管投赞成票的人各自的动机很不相同 ,但新宪法毕竟以 90% 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1959年 1月 1日 ,新宪法正式颁布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诞生。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实施 ,意味着法国国家政体的重大变化。它将议会制共和国改变为半总统制(实际上的总统制)的共和国 ,过去只是作为荣誉职位的总统 ,现在成了国家机构的核心。总统任免总理 ,组织政府 ,内阁完全听命于总统。总统掌管军事、外交和司法大权 ,任命文武官员 ,审议、决定和公布法律。总统或政府同议会发生冲突时 ,总统拥有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总统有权越过国民议会 ,就某些重要法案直接举行公民投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 ,总统可以根据形势行使“ 非常权力 ”。新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归结为一句话 :总统是“ 真正掌握政权的首脑 ”。这正是戴高乐在 1954年前发表的《贝叶讲话》的基本思想。

1958年 12月 ,法国举行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掌握实际统治权的首脑。于是 ,他原来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后组成的社会共和党、法兰西复兴联盟以及共和国民会议 ,重新联合组成戴高乐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参加竞选 ,该联盟迅速在各选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同时 ,戴高乐又将有利于各旧政党的选举法作了修改 ,使选举大大有利于戴高乐党。因此 ,保卫新共和联盟一举夺得近 50% 的议席 ,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59年 ,由参

众两院议员、省市议员、市长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总统，戴高乐以多数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9年1月就职。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法兰西最高权力的象征。他将充分运用总统的权力，去建造他所追求的法国。

七、顺应潮流摇改弦更张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它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震撼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昔日的帝国主义的后方，今天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线。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命运也不例外。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他们不畏强暴，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越战越勇。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民族解放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给法国殖民者以沉重打击，使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法国大部分陆军、近半数的空军、近半数的海军都投入到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之中，到1962年，所耗军费高达180多亿美元。巨额的军费开支，造成国库空虚，债台高筑，给国内政治、经济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戴高乐正是在法国陷入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泥潭、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重新执政的。如果将战争继续下去，法国已无力维持，结束战争，戴高乐也面临一道道难题。因为他是靠那些要竭力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极端殖民主义者发动的暴乱上台的，况且在他那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也隐含着殖民主义的思想，同那些要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理想中的法国是包括原来全部法属殖民地在内的遍及欧亚非的“法兰西帝

国”。那么,面对当前的形势,他应该怎样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实现他的宏图大略呢?

戴高乐不仅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位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跟上历史前进的脚步。当他看到通过战争取胜阿尔及利亚已毫无希望,民族独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欧洲人直接统治非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时候;当他看到如果逆潮流而动,就会引起无止境的斗争,并招致全世界的谴责,即使付出这一切代价,所换来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要“化成灰烬”的时候;当他想到他渴望的是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中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恢复“法兰西帝国”的梦想,摆脱在阿尔及利亚的困境,实行“非殖民化”。

当然,戴高乐在实行“非殖民化”过程中思想是复杂的,步履也十分艰难。开始他想通过建立“法兰西共同体”,即“在联邦形式的基础上建立法国同海外领地的联盟的关系”,来缓和同非洲殖民地的矛盾。1958年12月13日,戴高乐政府在各领地举行公民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投票结果,非洲16个国家成为共同体的“自治共和国”。1959年12月,在非洲国家要求获得真正独立浪潮的冲击下,法国国民议会修改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成为独立国家。

那么,阿尔及利亚这个对法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戴高乐能不认真考虑吗?1958年12月15日,戴高乐终于冒着风险公开提出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认为通过阿尔及利亚人

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是“唯一应当采取的办法”,并表示在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之前撤回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接着又提出,确保愿意到法国会谈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安全。

但是,主张保持老殖民统治并曾拥护戴高乐上台的极右势力,则坚决反对戴高乐的政策。法国驻阿尔及尔军团司令马絮就表示“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声称军队将永远不撤离阿尔及利亚。为此,戴高乐于 1959 年 11 月 10 日解除了马絮在军队和政府中的一切职务。10 日,支持马絮的“法兰西民族阵线”等殖民组织举行反对戴高乐的示威,高喊“绞死戴高乐”等口号,筑起街垒,进行罢工罢市。军队对“街垒暴乱”采取纵容态度。此时,戴高乐周围的许多人对他表示怀疑和反对。曾为戴高乐重新出山四处奔走、积极活动的苏斯戴尔和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时的同学法国唯一活着的元帅朱安也十分不满。朱安称:“如果你下令开火,我就公开反对你。”然而,戴高乐却坚持不改变自决政策。10 日,他身穿将军服,以军人的威严发表电视讲话。他说:“由共和国总统制定、政府决定、议会和全民通过的政策,不需要重新讨论”,宣称要坚决粉碎暴乱;“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最后,“街垒暴乱”终于在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得到了平息。接着,国民议会通过授予政府为期一年特别权力的法案,戴高乐立即改组内阁,两位反对他的政策的部长被解职。

1959 年 11 月 10 日,戴高乐在全国的一次讲话中虽不是直截了当但却十分明确地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1959 年 11 月 10 日就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举行公民投票,10 40 万选民中有 10 40 万人参加了投票,赞成票达 7 900 000,它表明戴

高乐的政策受到多数人的拥护。戴高乐的讲话和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的各种力量进一步分化。正当法阿停火协议正式宣布时,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四名高级将领——夏尔、萨朗、儒奥和泽勒于 1957 年 10 月 1 日发动了旨在推翻戴高乐政权的武装政变,戴高乐政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挑战。在他的部长们惊慌失措时,戴高乐仍然十分镇定。他依据大多数人在公民投票中所表明赞成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愿望,充分利用宣传工具的作用,像 1940 年 6 月粉碎“街垒暴乱”那样,身着将军军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说:“他们的这种行径正在把国家直接引向灾难”,使“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蔑视”。他表示:“民族授予我的法国的共和政体的合法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将保持这种合法性,直到我的任期届满,或者直到我丧失能力或生命时为止。”他命令要“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戴高乐运用合法权力,并以他的政治威望与军事权威的威慑作用,又一次征服了反叛者。

但是,戴高乐政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受到的挑战并未就此结束。极端殖民主义分子为了搞垮戴高乐,进行各种恐怖活动,以致图谋暗杀戴高乐本人。从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1 月,先后发生了四起谋杀戴高乐的事件,他都奇迹般地脱险了。在最后一次暗杀事件中,戴高乐受到约 100 发子弹的袭击,他乘坐的汽车被 10 发子弹击中,其中有一发子弹在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穿过,而他却幸免于难。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经过一系列挑战之后 ,戴高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政策赢得了胜利。1962年 7月 13日 ,法阿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7月 13日 ,法国公民投票以 80% 的多数批准了协议。7月 13日 ,阿尔及利亚在公民投票中有 99% 的人赞成独立。阿尔及利亚终于结束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殖民地地位 ,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至此 ,原法属非洲殖民地几乎都获得了独立。戴高乐对非洲新独立国家采取“ 合作 ”政策 ,实行“ 非殖民化 ” ,建立法非特殊关系 ,取代老殖民政策 ,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和特权。

殖民地问题的解决 ,戴高乐便可以把精力转向欧洲 ,致力于法国的振兴。戴高乐说 :“ 法国在各地推行“ 非殖民化 ”政策 ;是它有史以来所尝试的一切工作的最伟大的、也许是最有成果的工作之一 ”。“ 殖民地的终结是我国历史当中的一页。在翻过这一页的时候 ,法国既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 ,也对行将到来的事情充满希望。”

八、振兴经济 发展科技

戴高乐重新上台 ,结束了第四共和国十多年来动荡的局面。但是 ,由于连年殖民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 ,国库空虚 ,财政极端困难。当时法国黄金外汇储备只有 20 亿美元 ,仅够维持 3 个星期的进出口贸易。外债高达 100 亿美元 ,其中一半必须在一年之内偿还。经济形势极其严峻。

戴高乐认为 ,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 ;没有后退的余地 ,也没有逃避的可能 ” ,他必须“ 负起自己的责任 ” ,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 ,使国家的活动“ 符合时代的要求 ” ,这就是 :

“在工业时代,它必须工业化。在竞争时代,它必须有竞争能力。在科学和技术时代,必须提倡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内获得成功,在国外受到重视。

戴高乐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整顿财政、改革金融、加强法郎地位等措施。他上台后第 1 天即宣布发行公债,并冻结 4 个月的工资。这一紧急措施的实施,很快就回收了相当于 15 亿美元的黄金和 100 亿法郎。为了增加出口,改善对外贸易状况,提高法国商品的竞争能力,戴高乐决定改革币制,发行新法郎,以 100 法郎的比率回收旧法郎,并决定法郎贬值 10%。与此同时,决定将加速欧洲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付诸实施,促进西欧联合,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 1947 年下半年起,经济开始上升。1948 年下半年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 10%,对外贸易变长期入超为出超。到 1949 年,法国工业生产和外贸出口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 1 位,农业生产和粮食出口在西欧占优势地位。法国还数次提前偿还外债。1949 年 1 月偿还了欠欧洲支付同盟的欠债 10 亿美元,使法国自 1946 年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中期和短期外债的情形。到 1949 年 10 月,法国外债已从 1946 年的 100 亿美元下降到 20 亿美元。

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削弱和摆脱美国对法国经济的控制,戴高乐大力发展科技事业。1946 年至 1949 年是法国科技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原子、航空、航天、电子等尖端技术和尖端工业尤其受到重视。在这一时期,法国的研究和研制力量大大增强,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从 1946 年的 1 万人增加到 1949 年的 3 万余人。政府拨出的科研经费由 1946 年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 ~~犹豫~~ 增加到 ~~1956~~ 年的 ~~四分之一~~。科研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不少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颇为得意地说 : “在我执政的十年中 ,在繁荣、进步和货币方面取得的成功 ,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没有的。”

九、争雄夺利摇智抗强权

戴高乐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要算他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最大特色是独立自主。他提出法国要在政治、经济、货币和防务等方面独立自主 ,目的是要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 ,使法国分享世界领导权。

建立独立的防务特别是发展独立的核力量 ,反对美国的核垄断 ,是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他说 ,在美苏都有了毁灭对方的原子弹以后 “谁能制止他们在两国之间的地带投弹 ,即在中欧和西欧呢 ?”既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欧洲人生存的 “保护作用令人怀疑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保护者呢 ?”因此 ,他提出 : “我们不愿意任何人成为我国命运的主宰者 ” ,也不愿意 “它的朋友和盟国美国成为它的领导者和保护者 ” ; “法国的防卫应当是法国人自己的事 ”。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企图永远保持它的核垄断地位 ,遭到戴高乐的强烈反对。

~~1956~~ 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巴黎时对戴高乐说 ,与其法国用巨大的费用去试验和制造原子武器 ,不如由美国提供现成的更好些。戴高乐回答说 ,如果美国 “同意卖给我们原子弹 ,我们愿意购买 ,但必须完全由我们支配 ,不加任何限制 ”。戴高乐认为 ,法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因此 ,~~1956~~ 年

法国在撒哈拉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同年,法国制订了“国防现代化十年计划”,以加速建立法国核力量。美国则极力限制法国发展核力量,于1952年提出所谓“多边核力量”方案,根据这个计划,北约组织盟国将不建立自己的核力量。戴高乐对此坚决反对,并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三国条约上签字,全力推行自己的独立的核力量计划。

为了在大西洋联盟中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戴高乐上台后三个半月,即1958年12月16日,就提出法国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的最高决策,联盟领导权不应由美、英两国掌握,而应建立美英法三国领导核心,并说,如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他将不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当然,戴高乐不是要脱离西方联盟,而是要撤离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保持法国的独立地位,不受别国的摆布。他的意见果真遭到美英的拒绝,他便采取了一系列反对美国控制的措施。

1958年12月,法国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规定,决定不论战时或平时,法国地中海舰队都由法国自己控制。1959年1月,法国宣布不同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法国储存核武器。1959年2月,宣布法国的大西洋舰队今后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司令部指挥。3月,又宣布收回对原定在发生战争时“自动”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司令部指挥的几个法国中队飞机的指挥权。1959年4月,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迫使美国撤出和拆除在法国的驻军及军事基地。

在经济上,戴高乐竭力抵制美国资本加紧对法国的渗透和力图控制法国重要工业部门的做法。1959年采取限制美

国投资的政策。1936年11月,法国决定,法国黄金外汇储备今后将以法郎为货币单位而不再以美元为单位公布。12月,戴高乐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制度,主张恢复“黄金本位制”,反对以美元、英镑作为国际货币。接着,法国正式宣布退出金汇兑本位制。

戴高乐竭力反对美国化西欧共同市场为“大西洋共同体”的计划,提出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为了加强法国在西欧的发言权和扩大法国的影响,他反对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同时,在欧洲远国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以法国为主的远国政治联盟。为此,他抛弃同德国在过去多次战争中相互厮杀结下的怨仇,实行法德和解。他上台后,与德国总理阿登纳频繁互访,以建立法德轴心。1938年11月,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企图用条约形式把法国——西德轴心固定下来。

为了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使法国取得以大国身份单独同苏联对话的资格,戴高乐积极发展法苏关系。他虽然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利益,法苏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应该寻找和解的办法。1939年11月,他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了法国。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他提出了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实现“缓和、互相谅解和合作”的主张,并提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建立欧洲人之间的往来联系。戴高乐认为,通过赫鲁晓夫访法,“在法俄几百年以来的关系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情”。1940年12月,戴高乐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欧洲的问题首先应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欧洲大陆国家应该努力为

东西方缓和准备必要的条件。很显然,戴高乐企图通过发展法苏关系,既增强法国同美国打交道的资本,又借助苏联的力量牵制美国对欧洲的控制。

戴高乐深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要谋求大国的地位,还必须最大限度地联合其他中小国家并取得他们的支持。戴高乐十分重视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声称,法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

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是法国的海外利益最集中、传统影响最深的国家,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法国政治伙伴的国家。因此,在“法兰西共同体”瓦解、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戴高乐对这些新独立国家没有进行报复,而是采取了“合作”措施,同他们签订各种“合作协定”,继续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保持法国在非洲的特殊地位和利益。

在亚洲,戴高乐重视中国的作用。认为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是“绝对不可能设想”办成任何大事的;“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

基于这种认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严厉对中国进行封锁的情况下,法国于1964年1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大步骤,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因此,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多次谴责美国干涉越南,企图在印支取代法国,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主张印支半岛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实行中立。在中东危机

中 ,他对以色列危害世界和平表示愤慨 ,声明禁止一切武器装备运往以色列 ,改变了过去亲以色列的政策 ,以恢复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对拉丁美洲 ,戴高乐同样抱有兴趣 ,他亲自访问了墨西哥和南美等十国 ,使其影响扩展到美国的“后院”。

戴高乐执政期间制定的外交政策 ,维护了法兰西的独立 ,提高了法国的威望 ,奠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基础。

第六章 摇前西德总理阿登纳的领导艺术

康拉德·阿登纳(1876~ 1966) ,出生于德国科隆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 ,学习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912年出任科隆市市长。1918年因反纳粹被希特勒政府撤职 ,后又两度被捕下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应美国占领区军政府之请出山 ,重任科隆市长。1945年 ,他参与创建基督教民主联盟 ,并担任该党主席至 1952年。1953~ 1955年任美、英、法占领区议会委员会主席 ,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55~ 1966年任德意志联邦总理 ,并兼任外交部长(1955~ 1956)。执政期间 ,他摈弃德国传统的以武力谋求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理论 ,制定了经济富国战略 ,重用艾哈德等一批经济专家 ,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战后崩溃的西德经济在五十年代持续高速增长 ,跃居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被誉为“经济奇迹” 。为恢复德国的主权国地位 ,取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他在国际上奉行亲西方政策 ,使西德在 1955

年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积极推动西欧联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和西欧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努力消除德法民族隔阂,谋求两国修好,于1963年同法国签订友好条约。他连续18年担任西德总理,在战后复兴西德的事业上功绩显赫,被认为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伟大的总理,开创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阿登纳时代。

一、初主科隆摇因势利导

阿登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就任科隆市市长。1918年德国战败,11月初爆发革命,11日柏林宣布成立共和国,10日威廉二世(宰皇德)逃亡荷兰,结束帝制,11日起停战协定生效。随着革命的爆发和战败的结局,德国现代史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定、错综复杂和多灾多难的时期。身为莱茵兰大城市、德国西陲重镇科隆市市长,阿登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基尔(运港)港起义的水兵乘坐火车长驱直入科隆。科隆在当时还是要塞,水兵们逮捕了要塞司令官,打开军事监狱,宣布成立工兵代表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在这样的形势下,阿登纳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不像要塞司令官那样临乱束手无策,甘当水兵的阶下囚,而是留在市政厅苦心支撑局面。水兵们经验不足,缺少应有的警惕。他则老谋深算,主动让出房间给他们办公,给他们提供打字机,同他们商量,建议他们注意维持社会治安,并就此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他用这些手法骗取了革命派的信任。革命派吸收他参加工兵代表会议,甚至任命他为工兵代表会议公安委员。随后,他利用这一身

份 ,抓住机会暗中行事 ,同保守派市民代表组成一个“福利委员会” ,建立起自己的民团 ,逐步排除革命派势力 ,取工兵代表会议而代之。

科隆是德国西部大门 ,是首先遭到从西线战场退回国内的军队冲击的地方。几十万溃兵涌进市区 ,无人指挥 ,没有纪律 ,都携带武器 ,一时社会秩序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阿登纳为市民生命财产担心 ,他派人四处张贴告示和口头传单 :凡交出手中武器者可获得热食供应 ,发给路费 ,遣散回乡。他还叫人在深夜里把陆军仓库储存的 140 万升烧酒悄悄倒入莱茵河 ,避免了因散兵酗酒闹事可能带来的更多乱子。

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确保市民人身安全的角度来说 ,阿登纳当时的这些做法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德国战败后 ,莱茵兰被划定为占领区 ,由法、英、比利时和美国分地区派军队占领。1945 年 10 月 21 日 ,英国占领军进驻科隆 ,这也是促使动乱局面渐趋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为时不久 ,阿登纳又遇到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棘手问题 ,即错综复杂的“分离主义”和“莱茵兰运动”。这个问题在当时使他费掉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 ,谋求妥善地加以处理解决 ,以后又长时期成为人们怀疑他“历史上有污点”的论据 ,甚至直到今天 ,还被一些人不时议论或列为德国现代史研究专题之一。

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有些人士策动和支持莱茵兰人出面搞分离主义和莱茵兰运动 ,企图使莱茵兰脱离德国并入法国 ,或者至少“独立”。很明显 ,这是 1945 年德国战败形势下的产物 ,是德法两国世代不和互为仇敌继续作祟的反映。

莱茵兰是德帝国普鲁士邦的一省 ,处于德国西部 ,东距帝国兼普鲁士邦首都柏林好几百公里 ,无论从它经历的历史、文

化、经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居民思想习性等等方面的发展来说,都跟普鲁士有着很大的不同。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拿破仑军队占领期间进行的改革,从政治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给莱茵兰打上明显有别于普鲁士的烙印。阿登纳一向认为自己是莱茵兰人——当然首先是德国人。他对普鲁士实在没有什么好感,毫不讳言他看不惯“不讨人喜欢的大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及其异教徒的首都柏林”。1892年7月10日,他在科隆大学一次讲话中还说:“尽管柏林人具有某些可贵的特点,但过去我每次到柏林,总感到是待在一个异教徒的城市里。”

阿登纳担任莱茵兰重镇科隆市市长,又是莱茵省议会议员,省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党理事会成员,在分离主义者心目中自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分离主义者也知道,许多其他人都知道,阿登纳对普鲁士没有好感。因此分离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他寄予希望,指望能得到他的积极支持,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从而有利于分离运动。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阿登纳是坚定的爱国者,他眼光看得远,决心致力于通过根除德法两国之间的不共戴天之仇,建立睦邻关系,而“莱茵兰运动”这个棘手问题也就可望因此顺利获得解决。他有自己的坚定原则立场。

1892年7月11日,阿登纳在科隆市市政厅的汉萨礼堂召开“莱茵河左岸当选魏玛国民议会议员、普鲁士地方议会议员及被占领的莱茵兰地区各城市市长会议”,共同商讨有关前途问题。他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至今还保存在科隆市档案馆。

阿登纳在讲话中,首先本着自己主张德法谅解的一贯思

想联系当时的形势,剖析德法两国关系的症结问题所在。他说:德国和法国世代相仇。德国两国之间的争执和斗争已反反复复进行了好几百年……德国现今瘫痪在地。不言而喻,法国一方不可能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能确保自身今后的安全。德国目前虽然完全瘫痪,但铁的事实是德国有近四千万人——我只说大约数字——,而法国的人口为三千万至三千万。德国将会从它目前的瘫痪状态中重新站起来。谁也不知道德国多少年后才能站起来,但德国将会站起来则是肯定无疑的。基于这一考虑,法国得出结论,认为必须要求并创造得以确保本民族生存的保证,合乎情理地作出估计,使德国无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法国进行复仇……

“那么法国怎样才能确保防止德国复仇呢?首先一个可能的办法是靠正在拟议建立的国际联盟及其相联的裁减军备。不过我认为,即便是在协约国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坚信裁军思想能持久地占上风,并且在世界各国占上风……可是,如果法国通过和约以任何形式拿走德国的莱茵河左岸领土,那么肯定无疑将会由此而种下下一次欧洲战争的苗子,因为德国断不可能长期容忍这样做。”

为了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一条既能满足法国一方的要求,又能避免德国因莱茵河左岸领土被分割而必然遭受的损失“出路”,阿登纳建议:“将莱茵河畔各地区,不仅莱茵河左岸,不仅莱茵省,而且也包括接壤的莱茵河右岸地区,合并组成西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同德国保持联盟关系的西德意志共和国。”

看来这是阿登纳针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作出的一个策略性抉择。正像他在讲话中所说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是

举世公认的敌人，人们认为“普鲁士是欧洲的恶魔，是敌视文明和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的庇护所，普鲁士是这次战争的发动者……过去统治普鲁士的是一个穷兵黩武，肆无忌惮的军人阶层和容克地主阶级，而普鲁士又是德国的统治者”。通过将德国西部各地区合并组成“西德意志共和国”联邦，就能消除普鲁士军国主义对人们、特别是对法国的威胁感。他还说：“这个西德意志共和国将由于它地区辽阔和经济上举足轻重而在新德国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也能对德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使之符合和平友好的思想”，而这样处理同时也使德国保住了莱茵兰。

阿登纳态度十分明确，他强调指出：“要么我们直接倒向法国一边或做法国的缓冲国，要么我们就成立西德意志共和国。第三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他保卫莱茵兰的立场也非常坚决。他断然表示抗议说：“作为处于被占领下的普鲁士地区的人民代表，我们大声疾呼和郑重声明：反对法国报刊上出现的谋求使莱茵河左岸或其中一部分地区离开德国的企图。”

阿登纳的长篇讲话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当场选举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莱茵兰委员会”，负责具体着手筹划有关建立“西德意志共和国”的事宜。但是这个委员会显然徒具空名。阿登纳作为主席不仅始终没有召集过一次会议，而且相反，借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利用机会——多少就像不久前利用工兵代表会议治安委员身份同革命派周旋那样——，通过不同渠道，把各种危险势力控制起来，注意监视和掌握它们的动向。

阿登纳的态度和做法不用说使分离主义者感到大失所

望。1945年12月15日,分离主义者在威斯巴登和科布伦次宣布独立,成立“莱茵兰共和国”。法耳次地区还有人策划搞脱离德国,并入法国的运动,情况非常危急。阿登纳一方面求见莱茵兰英国驻军政治顾问乔治·悉尼·克利维将军,向将军陈述利害,建议由占领军当局公开张贴布告,明确下令“未经英国政府批准,禁止对英占区内的现行政治体制作出任何改动”。同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终于使这股动乱逆流没有蔓延到英占区。分离主义者眼看目的未能得逞,他们对阿登纳恨之入骨。科布伦次一个由分离主义者自封的“法庭”,宣布缺席审判阿登纳,判处他“死刑”。

法国方面自然同样密切注意阿登纳的一言一行。不过,就在阿登纳发表上述长篇讲话的当天,“停战委员会”驻科隆观察员、公使馆参赞衔外交官奥斯卡·保罗·特劳特曼——特劳特曼于1945年12月起任驻中国公使,当时译名为陶德曼——在写给德国外交部长乌尔里希·格拉夫·布罗克多夫原朗兆的一份报告中,即已明确提到阿登纳“被(法方人士)公认为热情的德国爱国者”。当时的法国总理若尔日·月·克列孟梭在几年后还抱怨阿登纳,说阿登纳没有为自己在上述长篇讲话中提出的建议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多年以后,甚至纳粹分子也就此事进行了专门调查,但终未查出阿登纳搞分离主义的证据。众所周知,纳粹分子镇压敌对者一向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可是他们在几次逮捕阿登纳时,都未以“分离主义者”作为他的罪名。新近发表的一些专题研究文章和有关著作,也证实阿登纳同分离主义没有干系。由此看来,阿登纳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至于1946年再一次出现的分裂莱茵兰的危机,那更是当

时柏林中央政府掌权者目光短浅 ,企图作茧自缚的产物。这年年初 ,法国派军队进入鲁尔地区 ,强行自己动手采煤 ,运往法国 ,用以抵偿德国逾期未付的赔款。这种做法引起鲁尔居民强烈不满 ,一致进行“ 消极抵抗 ”。柏林中央政府暗中支持 ,并从财政上拨款补助生产陷于停顿的辖管鲁尔地区的莱茵兰。说是“ 消极抵抗 ” ,实际上冲突非常激烈 ,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鲁尔斗争 ”。与此同时 ,德国货币急剧贬值。1923年11月11日 ,继威廉·库诺上台任总理的德意志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来泽曼召集莱茵兰地区代表会商。他说 :中央政府面临着“ 二者择一的绝望处境 ” ,即要么继续大量拨款补助被占领下的莱茵兰 ,以致使刚刚发行的新货币“ 地产抵押马克 ”再次彻底崩溃 ;要么就“ 呼吁世界良知 ” ,听凭法国去摆布莱茵兰。有鉴于此 ,他提出让莱茵兰“ 事实上 ”但不是“ 法律上 ”独立 ,就此征求大家的意见。阿登纳是与会代表之一 ,他当场坚决表示反对 ,指出如果中央从财政上切断同莱茵兰的联系 ,莱茵兰人将会感到被出卖了 ,是逼使他们投向法国。他还说 :“ 即使地产抵押马克像纸马克一样彻底崩溃 ,中央也应给被占领地区大量拨款 ” ,因为“ 莱茵兰毕竟比一种、两种或者甚至三种新货币更宝贵 ”。在阿登纳和其他与会代表的反对下 ,施特来泽曼最后没有坚持己见。他后来承认说 :多亏阿登纳陈述利害 ,晓以大义 ,使他收回了这个不免要铸成大错、追悔莫及的下策。

阿登纳当时才 34岁出头 ,他只是地方一级的政界领导人 ,在考虑错综复杂的与邻国关系问题和激烈的鲁尔斗争中 ,证明政治上见解确实高人一筹。他反对传统的大普鲁士德国民族主义 ,着眼于谋求同邻国取得和解 ,摒弃旧恨新仇 ,争取

从根本上改善德法关系,为此他实事求是地主张满足邻国的合理安全要求。他在一次接见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报纸《人民报》记者谈话中指出:“为了使法国和比利时一方同德国一方之间实现和平,有必要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他衷心希望战败后动乱不宁、面对凡尔赛条约现实处境困难异常的德国保住莱茵兰。他坚持原则,相机采取灵活处置,促使鲁尔动乱最后结束。可是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人揪住这个问题,总说他历史有污点。难怪阿登纳对此很生气,他在1933年向保罗·魏马尔说:“所谓我在1919年曾经策划莱茵兰脱离德国这个谎言,已经被驳斥过上百回了,但每次到竞选时都重新冒出来。而中央政府本身当年打算让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的一部分分离出去,今天倒没有任何人谈起。”看来普天下都是一样:要使得别人正确了解自己,有时是很不那么容易的。

1933年7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通过了宪法。成立伊始的魏玛共和国举步维艰,除分离主义和莱茵兰运动及鲁尔斗争外,还面临着履行凡尔赛条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革命带来的动荡、饥饿、右派势力暴乱、通货膨胀、政局不稳定和政府短时期内一再更迭。阿登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有计划地着手开展市政工作的。他乐观,雄心勃勃,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实干精神,决心把科隆建设成为“全莱茵兰最大、实力最雄厚和最美丽的城市”,同时本着“德国今后应当多面向西方”的想法,使科隆成为“德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和交往的中心”。

一座大城市不可以没有培养人材和体现学术水平的综合性高等学府。科隆这时没有大学,1925年建立的科隆大学早

已于 1818 年因故停办。阿登纳任市长后 , 动员各方面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 , 在原有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筹建起科隆大学 , 于 1818 年 12 月 10 日开学。

对阿登纳说来 , 环境保护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 至少不是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才开始给予重视的问题。早在 19 年代初 , 他就决定平毁科隆市区四周的要塞 , 开辟建成长 10 公里、平均宽 1 公里的环城绿化地带 , 即他所说的“绿色之肺”。这项工程也有利于安排失业者 , 以工代赈。他的这一做法剥夺了一些业主的土地 , 遭到他们的反对 , 连中央党内也有人表示不满。但阿登纳坚持自己的意见 , 他说 : “一定要把市民从街巷中解放出来。我知道 , 做成一件好事必须进行斗争。”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 , 并把这项工程看成是自己为科隆作出的最大贡献。直到今天 , 科隆市民还亲切地管这条绿化地带叫“科隆之肺”。

阿登纳还制订规划 , 利用市郊空地辟置果园 , 大兴由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建设。他告诉一个教士说 : “在住房面积狭小的条件下 , 切实遵守‘十诫’无从谈起。”他非常重视开展体育运动 , 将体育运动比喻为“德国人民的临床医生”。在他的倡导下 , 科隆修建了全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型运动场。为了促进经济 , 莱茵河右岸多伊茨盖起了宏伟的科隆展览馆 , 扩建了莱茵码头 , 稍后又在米尔海姆附近新造了莱茵河大桥。他还采取措施 , 吸引福特公司和一系列国内外企业来科隆办厂。后来 , 在他再度当选市长任内 , 他还计划修建了科隆至波恩的高速公路 , 这是德国第一条高速公路。许多人至今以为高速公路是希特勒的创造发明 , 其实却是阿登纳的首倡。

1890 年 12 月 , 弗里德里希 · 艾伯特总统莅临科隆 , 为科

隆展览馆落成后首届展览会开幕剪彩。次年 缘月 员远日 科隆举行盛会 隆重庆祝莱茵兰归属德国一千周年。员远年 员月 猿日英国占领军撤出科隆 两个月后 保罗·冯·兴登堡总统来科隆访问。员远年 缘月 员圆日 首届世界报刊展览会即有名的“普列莎”(普列莎在德语中意为“展览”)在科隆开幕。

同一期间 阿登纳也积极致力于德法谅解 通过各种渠道 先后与法国总理雷蒙·彭加勒和爱德华·赫里欧接触。但由于具体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加以热心为此奔走的主要斡旋人莱茵兰“煤炭大王”胡戈·施廷内斯旋即死去 因此阿登纳利用莱茵兰为德法两国关系架桥的设想并未实现 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再次作出努力。

阿登纳在 员远年 怨月当选科隆市市长后 按照当时的规定即可进入普鲁士贵族院 次年 圆月起他成为贵族院终身议员。猿年后 员远年 缘月 怨日 他又当选为普鲁士参议院议长 任期 员圆年。由于担任科隆市市长政绩显著 他已是引人瞩目的地方政界领导人 加上拥有普鲁士参议院议长这一资历 所以他在 圆远年代中几次成为人们属意出任德国总理的人选 其中特别明显的一次是在 员远年。

这年 缘月 汉斯·路德内阁倒台 阿登纳接到提名担任德国总理去首都磋商的邀请信 据说连正式委任状也已准备妥当。但是 阿登纳到达柏林后 经过同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及德意志人民党三党领袖商谈 终于决定不接受这一提名。主要原因在于 他对当时德国执行的对外政策有着原则性的分歧见解 不同意 员远年 源月 远日与苏联签订“拉巴洛条约”取得和解的做法。他跟施特来泽曼前几年为莱茵兰问题已经有过重大争执。他认为施特来泽曼是普鲁士人 有心继承俾斯

麦的一贯思想,坚持执行以德国作为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国中之国”的政策,指望通过同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消除人们认为德国一味瞩目西方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方洛迦诺”。阿登纳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极端错误,他断然反对搞这种“跷跷板政策”,正如他在 1949 年后联邦德国重新统一后,他回忆自己当时持此见解所指出的:“我的政策基本一条是加入西方,决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搞跷跷板政策,而是坚定地同西方结合在一起……没有让拉巴洛幽灵卷土重来。”除此以外,阿登纳也可能考虑到,按照魏玛宪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权力划分的规定,更强有力掌握大权的是德国总统而不是德国总理。总之,经过磋商接触,他感到自己不可能指望得到国会中的多数支持,所以他决定打道回科隆,仍旧去当他的市长。

在此前后,阿登纳也受到了科隆舆论界的猛烈抨击。有人批评他借举行庆祝活动搞排场,大肆“挥霍公款”,说他是“全德国最大手大脚花钱的市长”。有人批评他“专擅独断”,不讲民主,任意提高地产税和营业税,甚至不惜“联合共产党人”,推翻经市议会通过的在莱茵河上兴建拱形桥的决议,改为修悬桥,还攻击他是“好大喜功的空想家”。也有人指出,他的大哥奥古斯特借科隆大学法学教授头衔,经常出面代表科隆市包揽诉讼,他的二哥汉斯是主教大教堂修士会成员,他的妹夫维利·苏特博士当市财政局长,说他们结成了“科隆阿登纳王朝”。

1950 年 1 月 16 日,阿登纳仅以一票的多数(39 票中获 40 票)再度当选科隆市市长。

二十年代后期,德国国内形势渐次趋于好转。失业现象

已基本上消灭“杨格计划”有助于进一步活跃财政经济,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协约国也发表声明,保证在 1924 年 1 月底全部撤走驻莱茵兰占领军。

二、善解民意摇众望所归

在本国同胞的心目中,阿登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笃信天主教,生活简朴、严谨,无论是公职生活还是私生活都洁白无瑕。他两次结婚,又两次丧偶,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慈父。在战后年代,他首先是一个效忠于本民族的人。尽管他同盟国占领当局有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但在人民心目中从未留下同外国勾结的卑劣形象。他在同盟国的全部公务关系中保持了一种超然气派,不是拍他们的马屁,而是经常盯住他们,索取让步,或要他们改变管制措施,使德国人的生活好过一点。他使用悄悄的幕后进行的施加压力的手法,迫使占领当局做出一次又一次看来不大而又实实在在的让步。在感到有把握时,他甚至敢于拒绝服从军事长官的命令,至少是不理睬这些命令。他讲起话来,总是准确简明,虽然并不刻意寻求公众喝彩的漂亮夸张的语汇,却能打动听众的心。他做事总是一心一意,使追随他的人深信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恰当的。

站在阿登纳对立面的是库特·舒马赫,他同样是战后西德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这位比他的对手年轻近 20 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年轻时也曾攻读法学和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志愿兵走上前线,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胳膊,身上还留下了 4 块弹片。在 1918 年的德国 11 月革命中,他成为柏林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在 1919~1920 年任国会

议员期间,他同纳粹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捕,关押在达豪集中营。1934年他从集中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不仅牙齿脱落,视力下降,而且不得不把一条坏疽的腿截掉。他的光荣的反法西斯经历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深受他的党员和德国人的崇敬。战后,他重建了已有100年历史的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党的主席。由于舒马赫是一个正直、诚实、廉洁的人,他在社民党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

舒马赫虽是一个残疾人,但他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在德国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是清白地登上政治舞台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代表德国前途的最美好的希望——一个在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强有力的联邦国家,在国际奉行不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的独立政策。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舒马赫的勇气,也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节操和他对社会民主党事业的忠诚。他讲起话来依然言词锋利,咄咄逼人。人们一直记得1949年12月国会会议上他对戈培尔的抨击:“整个纳粹运动只是对人类的渣滓有持久的吸引力”。战后,当共产党人以共产党和社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兄弟为由建议两党合并时,他的回答尖酸而刻薄,他说:“是的,他们是兄弟,就像该隐和亚伯一样”。当阿登纳私下表示对盟国占领政策不满时,舒马赫却公然蔑视占领当局,骂他们是“傻瓜和恶棍”,尤其是激烈地批评美国人满口仁义道德,鼓吹要对德国人实行民主改造的说教。他的一些言论无疑招来美军占领当局的忌恨,也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不过,在许多德国民众的心目中,舒马赫却成了民族主义的斗士。

战后西德的形势,要求一个睿智贤明、品行端正、也是公

认反对纳粹的人出来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失败和绝望的深渊，恢复正常安定的生活，阿登纳和舒马赫这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具备这种资格。而且从大选前的民意测验看，舒马赫似乎还稍胜一筹。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阿登纳的基民盟获胜，舒马赫的社民党被迫成为在野党。阿登纳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善解民意，提出了一个深得人心的竞选纲领——“填饱肚皮政策”。

早在 1935 年举行的关于萨尔区归属的公民投票中，精明的阿登纳就发现，萨尔人是按他们肚皮的命令投票的。位于法德边界的这个面积 469 平方英里的工业区，由于有富饶的煤矿和密集的钢厂，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争夺之地。它的国籍随着战争命运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它的 50 万人口从种族上说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被置于法国控制之下，直到 1935 年国际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为止。在那次投票中，犹豫的萨尔人投票决定再做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又一次取得萨尔的行政管理权。为使这件政治战利品合法化，法国人安排在 1955 年 9 月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以便让萨尔获得一部宪法，永久与德国分离，并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投票前，法国人没有向萨尔人发出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号召，要他们投民主的票。相反，法国人告诉萨尔人，他们可期待有一天能拿着法国的护照旅行，脱离战败的贫穷的德国，如果他们投票赞成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他们的主要商业街道“不久就会像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一样繁荣”，法国将给萨尔人提供更多的食物，他们还可以使用有实际购买力的法郎。总之是向萨尔人描绘了一幅人人都能得到生活保障的美好图画。投票结果，犹豫以上

的人同意同法国结成经济联盟 ,在政治上与德国分离。

法国人的胜利证明 ,在萨尔这个法德两国世代冲突的战场 ,支配选举结果的因素是“ 填饱肚皮政策 ” ,而不是民族主义。阿登纳深信 ,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 ,这一因素仍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 ,他确定了以德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础的竞选纲领 ,向选民许诺 ,如果基民盟执政 ,政府将增加食物供应 ,为民居提供足够的住房 ,实行就业保险 ,保证通货稳定。

为了使选民相信基民盟能够兑现诺言 ,颇有心计的阿登纳还劝说从不参加党派活动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 ,领导该党的经济班子。艾哈德是巴伐利亚著名经济学家 ,此前曾担任美英双占区的经济部长 ,他在 1948 年实行货币改革 ,结束定量配给和取消工资与物价控制 ,已经初见成效 ,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望。人们认为 ,艾哈德参加选举 ,说明如果基民盟掌管政府 ,西德人的日常生活就有希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同阿登纳相比 ,舒马赫的竞选宣传显得十分空洞乏力 ,他不断地发表感情冲动的演说 ,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他鼓吹一旦实行重工业国有化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社民党政府 ,德国就会进入美好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他猛烈抨击马歇尔计划、同西欧的合作、建立美英双占区政府等做法 ,主张走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活动同鲁尔河流域钢铁工人或煤矿工人的日常问题和心事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党虽然号称工人政党 ,但他却从来不理解工人的思想和感情。人们从来看不到舒马赫到当地的酒馆去同普通工人一起喝一两杯酒 ,了解一下他们希望从社会生活中得到什么和他们心里想些什么。相反 ,他扮演的是一个“ 老子最高明 ” 的

角色，他领导的是一群驯顺的、惟命是从的同事，当然，他的十分衰弱的身体也妨碍了他深入工人群众去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舒马赫在竞选中注意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他所强调的只是诸如计划经济、国有化等经济制度问题，而并没有表明他能像阿登纳、艾哈德一样令人信服地解决吃饭问题。他反反复复地告诉选民说，这第一次全国选举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个使德国大企业集团的残余丧失权力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这句过分夸张的漂亮言词却令选民迷惑不解。他尖刻地攻击艾哈德是“私人企业的肥大的宣传气球，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放出的臭气”，但艾哈德却可以泰然自若地举出具体事例说明，由于他的政策，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得到一定改善，德国经济“又运转起来了”，因而得到公众的信任。

舒马赫对马歇尔计划的猛烈攻击也是重大的策略失误。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将向西德提供近 100 亿美元的资金和物资以恢复西德经济。由于美国的这项援助计划通过报刊和其他手段大肆宣传，德国人都知道他们将从这项计划中得到好处，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像舒马赫那样对这种礼物吹毛求疵。1948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法兰克福一位读者简短的来信。这封信最清楚地说明了在马歇尔计划全面执行后西德民众的普遍心情。这位读者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先生，如果一个人非有一个主子不可，那最好是一个富翁，而不是一个穷鬼。”舒马赫这位脱离实际的空想政治家显然没有注意到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见识。反过来说，这封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阿登纳的“填饱肚皮政策”是深得人心的。

选举在 1 月 13 日举行，结果虽有点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却在阿登纳的预料之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的选票占绝对优势,居第一位,社会民主党居第二位,其余票数落入一些小党派手里。随后,基民盟与几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宝座。

三、务实求实争夺主权

就任联邦总理伊始,阿登纳对内对外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重建经济,解决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建立良好的国内秩序,争取联邦共和国政治上自主,成为世界各国大集体中的一员和主权国家等等。所有这些无疑都是重要工作,他都得管。特别是对外方面,由他亲自抓,他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

著名德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威廉·耘·格里菲思在评述联邦共和国的东方政策专著中写道:“战后时期西德对外政策反映出‘阿登纳’极其讲求务实,信念坚定和非凡果断:首先是联邦共和国加入统一的西欧作为平等伙伴,加入大西洋联盟,然后再同莫斯科就德国重新统一举行谈判”;“统一的欧洲不仅有利于德国重新统一,而且能同苏联保持均势”。对照一下本书上面几章中的记述,不难看出,从根本上来说,这也就是阿登纳在 1946 年代担任科隆市市长期间的一贯想法。

阿登纳决心从争取获得主权做起,而且要把争取主权同加入西方联盟密切结合起来。

缘个多月以前,即 1945 年 5 月 5 日,美国占领军司令长官在代表西方三国外长授予议会委员会主席阿登纳“占领法规方针文件”时曾宣布:“一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军政府即行结束,盟国当局的监督任务改由高级专员负责执行

.....三国高级专员联合组成一个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翌月10日,阿登纳领导的首届内阁宣誓就职,三国高级专员提出打算举行隆重仪式,授予“占领法规”,对此阿登纳没有同意。他认为“就德国方面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值得为之庆贺高兴的事情”。他也未叫全体阁员出席,只由他带领五名部长,加上他的外事助手赫伯特·布兰肯霍恩,登上七山,到高级专员委员会驻地“彼得斯贝格”大饭店接受了“占领法规”。

第二天,阿登纳总理就开始同三国高级专员举行谈判,主要内容是关于盟国拆卸德国军事工业及改建成军事工业的企业设备问题。拆卸这些工业企业设备是波茨坦会议上四个战胜国共同作出的明确规定,已经在陆续进行,涉及的自然都是大型厂矿企业。阿登纳认为,如果仍按原定计划继续拆卸,恢复和重建经济就无从谈起,失业将愈来愈严重。他早已公开指出“拆卸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排斥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以致国外报纸评论说:“一个德国人在控诉盟国!”在同三国高级专员谈判中,阿登纳反复陈述利害,为保住每一个车间、每一台机器进行力争。结果是,包括有名的蒂森钢铁公司在内的15家大型厂矿企业从拆卸名单上勾消,西柏林的所有工厂甚至全部免于拆卸,顺利地达成了“彼得斯贝格协定”。阿登纳高兴地说:“与抢救重要工业设备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这些让步对我国经济界领导人士的决心和干事业的勇气以及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干劲从心理上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是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就的。”彼得斯贝格协定是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协定。三国高级专员授予联邦德国的“占领法规”,给战胜者一方同样也规定了某些明确的责任,自从德国无条件投降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个协定也从

根本上确定了联邦德国紧紧跟西方走的大方向。

东西双方的“冷战”对峙,证实了阿登纳在战争末期即已提出的看法:美苏同盟将要瓦解,世界将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实力集团。立国初期,明确主张联邦德国跟东方走的人很少。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强烈抨击阿登纳紧跟西方,舒马赫甚至在联邦议院辩论中公开指责阿登纳是“盟国的联邦总理”,可他们自己也绝不主张倒向东方。更多的人是主张中立,主张奉行介乎东西两方之间的“桥梁政策”。这些人的想法是,中立和“桥梁政策”有利于实现德国重新统一,至少能使联邦德国摆脱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从两方面都得到好处。阿登纳认为这些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他坚持一边倒向西方,同西方紧紧结盟的既定主张,决不保持中立,决不搞“桥梁政策”。他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实现“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而不是“以牺牲自由去换取重新统一”。这是他坚定不移地奉行的方针。

早在1945年10月缘日接见美国记者的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就表示:依我之见,西方国家应将它们占领下的三个占领区妥当地合并起来,形成一种国家状态。最好是俄国人不愿合作,立即至少把西方三占区建成一个联邦国家。”他还指出:但为了满足法国一方面对这样一个西德联邦国家的安全要求,必须使这个西德地区的经济同法国和比利时的经济尽可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促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和确保和平的最牢固的基础。”1946年10月10日,他在明兴格拉德巴赫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德法问题仍然是欧洲的一个主要问题……整个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德法两国之间真正的和持久的谅解。”他坚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结果；世界包括欧洲已处于美苏两大国的控制下，不论英国或法国，都已失去了历史上的强国地位。面对美苏两个世界大国对峙争夺，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已经过时，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它们都没有力量在两大国争夺的夹缝中坚持存在，保住自身的利益”；“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才能有自己的光明未来”。他批判主张德国中立和奉行“桥梁政策”的思想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不成任何事情。我们不可能成为处在东西两方之间的真空地带。那样的话，我们势必在西方没有任何朋友，而在东方却面对着一个危险的邻居。”

当时联邦政府还没有外交部，对外政策的职权还掌握在西方三国高级专员手里。阿登纳经常通过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的途径，向公众阐明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见解和主张。1950年10月14日，美国《克利夫兰实话报》记者问他对人们议论纷纷的西德重新武装问题持何看法。他回答说，他“不同意德国重新武装”，但愿意“考虑德国参加欧洲军，分担兵员份额”的做法。这就是当时引起国内外震惊，遭到人们普遍强烈反对和谴责的所谓“防务贡献”。东方大肆抨击阿登纳是不奇怪的。即便在西方，包括联邦德国国内及政府内和基民盟党内，也有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满。作为深受战争之害和战后各种苦难，对一切记忆犹新的过来人，自然不能赞同他的这一主张。当时的联邦政府内政部长、1955年后当选联邦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就是因抗议重新武装于1956年10月退出内阁的。

阿登纳作为讲求务实的政治家，他对问题有现实的看法，不凭感情用事，不抱任何幻想。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全面权衡

作出决定的。他毫不讳言地承认说,他知道联邦共和国“寄希望于西方盟国保护它的安全,西方盟国也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既可以控制联邦德国,又可以加强它们自身同苏联抗衡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但他也知道,“西方盟国决不会为了别人的安全而甘愿让它们自己的人当炮灰,如果别人自身不肯为防务作出贡献的话”。他认为,只有联邦德国本身也有了军队,才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西方防御战线,特别是才能促使美国把心思用在欧洲,促使盟国把联邦德国看成地位平等的伙伴,从而同意让联邦德国拥有主权。可是,联邦德国如果直截了当地建军,必然又要引起其他国家首先是邻国法国的担心,所以他想到了“德国参加欧洲军分担兵员份额”这个办法。也就是说,联邦德国的军队是西欧国家共有的“欧洲军”中的一部分,受“欧洲军”统一节制指挥,不设立德国自己的总参谋部。这样建军可以一举数得,正象他在回忆录中概括所说:“影响我对重新武装这个问题所持态度的因素有三:一、重新武装可以获得主权,二、面对苏俄武装苏占区的形势确保安全,三、促进欧洲联邦。”阿登纳所说的“苏占区”指民主德国,已先于联邦德国着手进行武装,建立了配备武器和驻扎在营房里的“人民警察”。

“冷战”开始以来,西方国家同西德之间的对立关系已发生了转化。1948年11月,原日英法双方缔结的“敦克尔克条约”主要还是针对德国,声明旨在“防止来自莱茵河对岸的威胁”。一年后,西欧五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就强调“集体防御”以对付前苏联了。1950年7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形势更有利于阿登纳排除反对意见,贯彻自己的主张。

这年11月,丘吉尔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提议建立

“欧洲军”，西德军队参加“欧洲军”，加入于 1948 年 9 月 9 日宣告成立的北约组织。9 月西方三国外长举行纽约会议。10 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参战。10 月 25 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缘天后，三国高级专员通知阿登纳：同意联邦德国正式建军，并可考虑结束对德占领，着手谈判“德国条约”，用以取代“占领法规”。谈判是艰巨的，涉及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反复讨论磋商，无论“德国条约”或“防务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同西方国家的谅解，首先是同法国的谅解。然而，由于德法两国之间历史上长期不和，法国对德国深怀恐惧疑忌，虽然阿登纳积极响应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 1950 年 缘月提出的倡议，于次年 9 月 5 日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作为将西欧德、法、意、比、荷、卢六国的重要工业紧密结合起来的第一步，但仅仅是个开端。单是棘手的“萨尔问题”，就直接地、现实地阻碍着德法两国的进一步靠拢。阿登纳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同西方三国和西欧五国长时间谈判协商，从他设想的总目标着眼考虑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作出必要的让步，最后才达成一致，于 1952 年 缘月 9 日和 10 月 21 日，分别签订了取代“占领法规”的“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三国之间关系的条约”——简称“德国条约”，也叫“一般性条约”，以及在法国总理勒奈·普利文 1952 年 10 月 25 日提出的煤钢条约六国建立“欧洲军”方案基础上达成的“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

在同一期间，内政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通过彼得斯贝格协定争得的减免拆卸工矿企业设备项目，使 150 万人免于失业。另外就业的人数也有了增加，建国头一年内即达 150 万人。住房建造进展很快，从阿登纳政府就职起，每年新

盖住房保持在 缘万所左右 ,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国家资助的公共住房(缘年代修建的“ 标准 ”新村住房中 ,仅三分之一强每户有独用浴室 ,近三分之一甚至无独用厕所间。以后从 远年代初开始 ,大批兴建两室一厅带厨房浴室的住宅 ,位于市区边沿。电灶、电视机、洗衣机和小汽车等一切均采用“ 分期付款 ”购买)。近 员万“ 被逐难民 ”得到了安置 ,缘万伤残人员和孤儿寡妇获得了帮助和救济。公共事业部门普遍提高了工作效率 ,国民生活中恢复和改善了法治。

阿登纳十分重视国内团结 ,他认为俾斯麦时代的文化斗争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 ,以及希特勒统治时期排除异己迫害政敌 ,都不利于国内的健康发展。基于这些历史教训 ,加上有意起用某些他认为并无重大罪行劣迹而确有专长或干才的前纳粹人员 ,使他们为新政权效力 ,他决定尽快消除随着盟国 员年 员月进行“ 整肃纳粹 ”以来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他在 员年 怨月 圆日向联邦议院介绍施政方针的讲话中说 :“ 非纳粹化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乱子。对那些在纳粹时期和战争中确实犯有罪行的人应当严加惩办 ,但除此以外 ,我们不要再在国内把人划为政治上清白者和不清白者两类 ,这种划分必须赶快结束。战争和战后时期的混乱已经给了许多人以十分严峻的考验 ,现在 ,对某些过错和不法行为有必要予以谅解。为此联邦政府将审议大赦问题。”但是共产党却不属于阿登纳的“ 谅解 ”之列 ,不仅不予谅解 ,而且还要加以制裁。 员年 怨月 员日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 所有追随德国共产党的人和‘ 民主思想不可靠 ’的人都应予以解除其公职。” 员年 员月 员日 ,联邦政府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 ,要求取缔德国共

产党。

在煤钢工业中推行“共同决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一措施直接涉及国内国外有关方面的利益。工人坚决要求改革，企业主则指责“共同决定”是搞“阶级斗争”，阻力很大，争执十分激烈，有爆发大罢工的危险。但阿登纳和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态度都很明确，断然表示按“阿伦纲领”的规定办事，坚持“企业雇员应有自己的代表参加监督机构例如企业监事会”，大企业中“应采用聘请方式吸收工龄长、为企业作出了贡献的职工进入理事会，参与领导企业”，工会可以派代表参加理事会。社会民主党当然也支持“共同决定”。由于基民盟基社盟和反对党共同努力，加上德国工会同盟主席汉斯·伯克勒积极配合做工作，联邦议院在 1951 年 9 月 10 日通过了“煤钢工业平等共同决定法”。实行“共同决定”在西欧各国是一个创举，受到国外高度重视。第二年，联邦议院又通过了“企业宪法”；“企业宪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雇员在遇到停工、被解雇或企业结构改变时应有的权利。据 1952 年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料统计，每 100 个在业人员中，因罢工而损失的劳动日美国为 15 天，法国为 10 天，英国为 12 天，而联邦德国则只有 5 天。国外评论将这归功于推行工人参与平等共同决定，人们在后来指出，这种伙伴关系联邦共和国一连 14 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劳工动乱。

另外一项牵涉面大的决策是“均衡负担”。就是说，由国家对在战争中财产未受损失或基本上未受损失的特别是对随着经济恢复好转财产不断增加的企业主进行征集“均衡负担金”，用来补偿在战争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财产的以及安置

“被逐难民”。这项工作从 1945 年币制改革后起就完了，关键是既要使企业主、地产主和其他贵重物品持有者拿出很多的钱来，又不能因此而损国民经济的发展。政策规定，按照改革日当天有产者实际财产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计征，1 年内付清。1946 年 5 月 1 日，联邦议院就此通过了相应的“均衡负担法”。据统计，从均衡负担金中单是拨出用于安置“被逐难民”的专款，每年即达近 1 亿马克，连同建国前陆续支出的用款，截至 1946 年止，总计已近 1.5 亿马克。这也意味德国人民的财产结构发生了变化，相当于平均每个有产者拿出自己近半数的钱财，用于“被逐难民”和其他战害者。

推行“均衡负担”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数达 100 万无业的“被逐难民”来到西德，得到安置定居，生计有了保障。他们亲身体会到政府的关心和广大阶层同胞的好意相助，由衷感到高兴。最初，面对潮水般大批难民涌来，三国高级专员中，有两个主张关闭边境，不让难民进来。他们指出，联邦德国本身就有许多难民尚未就业，而大规模驱逐难民显然也是存心给西方造成无法解决的困难。只是由于阿登纳总理坚决不同意，才没有采取关闭边境的做法。

早在联邦共和国建国以前，西方三占区已分别在有关军方领导下采取措施，对纳粹时期遭受迫害损失的犹太人个别进行补偿，并制订了相应的法令。1946 年春，联邦政府开始同以色列国代表就赔偿问题进行接触。1946 年 5 月 1 日，以色列照会战时四大盟国，正式提出“要求德国赔偿纳粹给犹太人造成的损失”，但没有直接照会作为当事者一方的联邦共和国。按一般情理说，新德国未尝不可以声明对旧德国

的所作所为不承担赔偿责任,只从道义上进行批判谴责就够了。可阿登纳不抱这样的想法,他在同年 猿月 圆日联邦议院讲话中说:“德国人民绝大多数厌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他们没有参与这一罪行……但无法名状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德国人民有责任从道义上和物质上作出赔偿。”为此他宣布,联邦共和国准备同以色列国和世界犹太人代表会商研究解决物质赔偿问题。

阿登纳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声明要进行经济抵制,采取政治制裁。参加阿登纳政府的德意志党和自由民主党也表示不予同意。甚至连犹太人士有的也拒绝接受物质赔偿,予以抵制。

员怨年 猿月 圆日下午,慕尼黑两学童(一个 员圆岁,另一个 员猿岁)在街头玩耍,遇到一陌生人,交给他们一只邮包和“猿马克‘酬劳费’”,请他们去火车站邮局代为投寄。两学童手捧邮包不知如何寄法,向附近电车站一位工作人员探问。这位工作人员看到邮包上写明“波恩联邦总理府康拉德·阿登纳博士收”,寄件人具名“法兰克福河畔伯格霍夫博士”,感到事有可疑,当即向警方作了报告。警方取去邮包拆开检查,只见包中是厚厚一本用绳子捆扎的《小百科全书(下卷)》。一名警官动手解开绳子,顿时发生强烈爆炸,警官当场毙命。四天后,巴黎多家报社收到从日内瓦寄出的署名“犹太游击队组织”的传单,传单上写道:“猿月 圆日,本组织同志在德国境内执行了第一号任务:将一本装满炸药的书寄给刽子手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博士……我们同刽子手处于一场历时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战争状态”;“德国人惨无人道地屠杀了 远园

万犹太人……现在他们同‘犹太民族代表’举行谈判,企图以此欺骗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我们要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罪行是不可能和永远不可能得到饶恕的”,赔偿再多,也洗刷不掉他们的罪孽。犹太民族断不容许德国回到各国人民大家庭中来……。”

阻力虽然很大,但阿登纳没有动摇。他坚持认为,出于道义原因,对深受纳粹政权种族迫害之苦的犹太人作出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他邀请慕尼黑两学童和他们的母亲来波恩联邦总理府作客,感谢他们,向两学童赠送金表留念。他还指示警方停止悬赏缉拿肇事凶手,表示对案件不加追究。另一方面,他亲自出面代表联邦德国同以色列国及世界犹太人组织代表谈判,经过努力,于当年缘月员园日在邻国首都卢森堡市政厅签订了“卢森堡协定”。同时,经联邦议院通过决议,第一批付款赔偿猿园亿马克给以色列国,赔偿缘亿马克给以色列除外的犹太人。这一做法有助于提高联邦德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国外舆论指出,赔偿金额本身巨大自不待言,尤为难得的是,西德还处于恢复阶段,并未预料到以后会出现“经济奇迹”。阿登纳自己后来回顾说,他在员愿年就任政府首脑时,心中考虑的主要任务有三,即“重新统一德国,同法国和解,以及调整同犹太人的关系,也就是同以色列和解。后两项任务不完成,就不可能完成前一项任务”。由此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视。

国人在造船业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而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已拥有一支由圆园多艘轮船组成的商船队,总吨位达源园万吨。

阿登纳的经济强国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经过战后代人的努力 ,德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 ,这个国家有了供它扩张的无限的“生存空间” ,依靠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库、机车、重型工业设备、机械、发动机等出口物资 ,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桥头堡 ,这些桥头堡比希特勒的数百万军队在西欧、东欧和非洲进行的军事征服中建立的桥头堡更可靠、更持久。

四、独具匠心摇双层政府

西德在战后很早就回到了世界舞台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登纳创造的独特的政府体制 ,这种体制带来了普通内阁制所没有的行政高效率。实际上 ,这是一种双层政府体制 :上层在年迈的总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阿登纳的掌管之下 ,主要负责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 ;下层在经济部长艾哈德的指挥下 ,依靠他的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威廉·福克的得力协助 ,负责处理西德的经济。

政治家不干涉经济事务 ,经济学家与财政专家们不参与政治事务 ,这就是设在寂静的大学城波恩的阿登纳政府的显著特色。不过 ,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分工 ,但是政府的两层对于重大的政策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它们各自的所有计划和活动都是致力于使这个战败和破产的国家重新在政治上受到尊敬 ,在经济上健康发展并拥有偿付能力。这种双重体制并非完全是阿登纳别出心裁 ,严格说来 ,他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波恩宪法第 65 条规定 :一位部长在任时应奉行总理制定的“总

政策方针”，但他同时应独立自主地处理本部的事务。阿登纳不过是在大权独揽的同时，给了他的部长们以较多的自主权力而已。

阿登纳牢牢抓住掌管和控制国内政治事务与西德外交的大权，仅仅是在经济工作影响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基督教联盟的政治实力时，他才关心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弃儿的国家的总理，这位身材高大、表情严峻的莱茵兰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向世界证明，一个新德国，一个同军国主义的、侵略成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彻底决裂的德国是可以创建起来的。他确信，西德的经济事务掌握在艾哈德和他的同事这样一些可靠的人手里，他本人完全可以放手不管这方面的事情，而集中精力去处理德国的国际问题。同时，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对多少有点深奥的经济学懂得不多，几乎是个门外汉，要是经济专家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只能把事情弄糟，因此他对经济事务很少过问，而把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完全交给了艾哈德。

66岁的阿登纳担任总理兼外长，挑起了繁重的工作重担。然而，凭着他的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资深履历，加上他那充沛的精力，这位政界元老却能游刃有余地驾驭他的新政府和政府中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人物，他曾悄悄地对他的密友说：“我在本政府中掌管着百分之七十的事务。”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波恩的上层人士不久就承认，他的确是一家之主，是政府这个家庭的公认家长。事实上，逐渐形成的制度被称为总理民主制，这显然是指在总理一人支配之下的民主政体。然而阿登纳能够、并且确实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别人，但是

只交给那几个参与经济管理的有才能和他信得过的人。

阿登纳放手让艾哈德等部长管理经济事务 ,并不是他与经济问题完全绝缘。事实上 ,他同西德企业界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联系 ,从而能够了解下层的真实情况。他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是科隆的罗伯特·普费尔德门格斯 ,此人是一个财大气粗的金融家 ,是萨尔·奥彭海姆银行的合股人 ,该银行同鲁尔区的重工业有密切的联系。普费尔德门格斯担任联邦议院的议员 ,在那里 ,他同总理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银行家 ,他对经济问题有比较独到的见解 ,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看法 ,对阿登纳的观点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阿登纳创造的双层政府体制使艾哈德的一个夙愿得以实现。这位胖乎乎乐呵呵的经济部长一直主张结束希特勒统治下实行的由政府指导和控制经济的做法 ,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 ,现在由于掌握了经济全权 ,可以大展宏图了。事实上 ,阿登纳还多走了几步 ,不仅他的政府不再控制经济生活 ,他自己也不干涉内阁部长对经济的管理。然而后来阿登纳开始对他失去对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控制表示不满。比如 ,~~1951~~¹⁹⁵⁰年 缘月他在科隆的一次宴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 ,那时他第一次对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公开提出批评。他对福克的贴现政策、艾哈德的降低关税做法和舍费尔的复杂的所得税条款强烈表示不满 ,这些问题本应在秘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这件事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似乎他的双层体制就要结束。但是艾哈德毫不退让 ,他表示阿登纳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阿登纳在同这些专家的

对抗中最终退却了。

阿登纳一方面加班加点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实际上扮演一个在外地主角色。他虽然不过问经济管理事务,不打扰他的“佃户”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的具体工作,但却以政治红利的形式“收租”,这种红利随着西德的经济恢复的迅速加快而增加。在国内,无人能动摇他的政治地位,以致使他高踞总理宝座长达 17 年之久,成为德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位总理,直到 1963 年才以 81 岁的高龄告老退休。在国际上,全世界的报纸对联邦德国令人惊异的经济恢复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阿登纳个人的国际威望也日趋上升。1953 年 9 月,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访问,在那里,他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被当成一位朋友和潜在的盟友,这自然是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但也反映出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55 年 10 月,阿登纳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

五、西出东进摇重返国际

1953 年 9 月 20 日,举行第二届联邦议院大选,基民盟和基社盟再次获得胜利,阿登纳连选连任联邦总理。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他继续小心谨慎保持和扩大已取得的成就,首先是积极努力争取使联邦共和国终于成为主权国家。

阿登纳对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寄予厚望。六个缔约国签字后,其中已有五国国会讨论批准了条约。可是 1954 年 8 月 30 日,法国国民议会却以 318 票对 294 票和 10 票弃权,否决了这项条约,“欧洲防务集团”就此功败垂成。这是对阿登

纳的一个沉重打击。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共同防务”告吹,而且首先是获得主权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他管这一天叫“欧洲不幸的日子”,说这是他“担任联邦总理期间最沉痛的失败”。出现这一变故其实并非没有预兆,法国总理比埃尔·孟戴斯·原弗朗斯(1954年12月—1955年12月)早已有言在先:如果缔约伙伴不准备作出某些让步,要说服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是困难的。孟戴斯·原弗朗斯在这里所说的“缔约伙伴”就是指联邦德国,所谓“某些让步”就是指法国一方主张的“一旦德国重新统一,各缔约伙伴均有权退出欧洲防务集团”。阿登纳当然不能同意法国这一主张,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正中苏俄下怀”。不过从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条约的方式来看,也充分反映出法德两国间隔阂之深,宿怨之重,即根本未就条约本身进行辩论,今后也不再进行任何辩论,直截了当予以否决。

阿登纳虽然感到十分痛心,但并不完全绝望,他继续努力搜寻补救办法。在这关键性时刻,一些认为“共同防务”攸关自身利益和同情联邦德国处境的西方政界人士,尤其是1953年初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和1953年10月重新上台的丘吉尔及其外交大臣艾登,热心给阿登纳出主意。1953年12月底,阿登纳到伦敦出席“欧洲防务集团”缔约六国加上美、英、加拿大九国外长会议。丘吉尔在会见阿登纳时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恭喜您欧洲防务集团破产!”丘吉尔和艾登纳建议以常规盟约取代“欧洲防务集团”: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布鲁塞尔条约”,并将该条约改组成为“西欧联盟”,联邦德国通过这条道路进入北约组织;“为防务作出贡献”。九国外

长会议于 怨月 愿日开幕 ,经过反复磋商 ,分歧仍然很大。主要矛盾在于对“军队”和“军备监督”问题看法不一致 ,争执不下 ,会谈几度濒临破裂。直到 员园月 员日 ,阿登纳在会议上声明保证联邦共和国不生产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 ,此外并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 原弗朗斯就德法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 ,九国外长才终于就“正式结束对德占领和恢复西德国际法地位”、“德意两国加入“布鲁塞尔条约”从而“促进欧洲在此基础上的联合”、“德国加入北约组织成为平等成员”以及“盟国军队驻留德国”和“军备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 ,随后于同年 员园月 圆日就此签订“巴黎协定” ,经各成员国议会批准后生效。

员缘年 缘月 缘日 ,波恩联邦总理府绍姆堡宫前升起联邦共和国国旗 ,庆祝联邦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猿天后 ,德国无条件投降 员园周年之日 ,阿登纳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北约组织成员国理事会会议。联邦德国在北约组织军队中所拥有的师和大炮 ,比欧洲防务集团“欧洲军”计划报议分给它的数字不是少了 ,而是更多。

回顾这段艰苦曲折的道路 ,阿登纳对联邦共和国终于获得主权和德法谅解之不易 ,是深有感触的。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德国条约”定于 员缘年 缘月 圆日在波恩签字 ,但直到 缘月 圆日 ,还有“许多法国人”对德国重新武装“恢复旧日的强大感到不安” ;“法国怀疑和批评德国 ,势必危及长达几个月之久取得的会谈成果 ,因而使整个条约的缔结成为问题”。他声称他早已“现实地看到” ,联邦共和国“加入西方联盟固然是德国利益的需要 ,但也是西方三国切身利益的需要”。

他毫不掩饰地说：“使未被俄国占领的这部分德国政治上经济上安定和恢复健康，这不单是未被俄国占领的这部分德国的根本切身利益所在，而且也是英国和法国的根本切身利益所在”；西方三盟国也逐渐认识到，面对苏俄，它们是需要德国的。我完全坦率地这样说，因为不言而喻，在当时战争结束那种情况下，战胜者首先并不是为我们着想。说到底……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一定是为本国的利益着想……三国认识到，德国和德国重新统一是阻止苏俄向西方推进的堤坝，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批评当时国内许多人采取的“与我无关的态度”，指出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和归根到底不会有前途”。他认为“在经过纳粹主义统治 12 年之后，对德国来说已不存在任何十全十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只存在祸害较小的政策”。他还强调指出：“这些年来联邦共和国国内有一种流行很广的幻想，即许多人认为美国不论如何都会坚定地留在欧洲，或者甚至留在易北河畔。然而美国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的信念是：自助者，合众国助之！”

这年 8 月 20 日，苏联向阿登纳发出邀请，欢迎他访问莫斯科，他立即决定接受。他想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扩大联邦德国政治上的活动空间，加之他一向认为，重新统一要靠西方三国的积极支持；而实现重新统一的关键则在于莫斯科”，西方三国既已在“德国条约”中明确承担了德国重新统一的责任，现在联邦德国又已正式成为拥有主权的国家，正好借此机会直接同苏联谈这个问题。所以，他不顾政府中和自己党内的激烈反对和苦心劝阻，力排众议，于 8 月 25 日启程赴莫斯科。

科。由于担心西方可能误解他搞“拉拢”政策,他在启程前声明:即便在他访问过莫斯科以后,联邦共和国也不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事实说明,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直接结果,却是以联邦德国同苏联正式建交作为代价,换回了一批留在苏联的德国战俘。这些战俘及其家属亲友对联邦总理自然是感激不尽的,但从阿登纳此行的本意来衡量,却未免“得不偿失”。因为他存心谈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苏联根本不同他谈,而他希望避免引起西方猜疑却恰恰未能避免,至少招来了西方的抱怨和不满。西方三国驻莫斯科大使密切注意阿登纳同苏联人会谈的情况。美国驻苏大使波伦在获悉阿登纳准备同苏联建交时,气愤地问阿登纳的随员外事助手布兰肯霍恩:“如果你们为了几千名战俘而承认苏联,那么你们准备为了几百万德国而付出什么代价呢?”

有人还认为,阿登纳同意与苏联建交,实际上就是默认德国分裂和存在“两个德国”,说阿登纳“事实上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早承认了欧洲现状”,因为苏联在同联邦共和国建交后并未改变自己的强硬态度。从1955年10月起,西柏林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交通一再受到人为的干扰。1958年前苏联压阿登纳参加苏联、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三方会谈或东西德双边会谈。第二年10月,苏联对西柏林发动“外交攻势”,一个月后赫鲁晓夫提出震惊一时的“柏林最后通牒”。最终激化了1959年10月14日构筑“柏林墙”。而另一方面,“遏制政策”积极倡导者之一的美国前驻苏大使凯南在1955年提出同苏联和平共处的方案,1956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雷德福提出裁减美国常规部

队和驻欧军的计划 ,即“ 雷德福计划 ” ,却使阿登纳骇然不安。其实凯南和雷德福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计划主张 ,其根本论据都是一点 :既然联邦共和国认为可以从同苏联取得协议中得到“ 好处 ” ,那么美国方面为什么不可以照此行事呢 ? 当然 ,在阿登纳看来 ,莫斯科之行至少还有另一个他事先没有料到的重大“ 收获 ” ,那就是 ,从赫鲁晓夫同他的谈话中 ,直接证实了苏联领导人“ 对赤色中国担心 ” ,从而肯定了他对“ 中苏之间存在分歧 ” 的预感和判断 ,认为这有利于他从长远着想实现重新统一德国的希望。这就是阿登纳此后在许多场合下以及在同许多外国领导人会晤中都要谈到的他在莫斯科得到的“ 亲身体验 ” 。

阿登纳第二届政府任期内的另一项重大外交成就 ,是妥善地解决了严重阻碍德法谅解的萨尔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经凡尔赛条约规定 ,萨尔连同萨尔地区的煤矿被交给法国管理 ,直到 1935 年通过举行公民投票表决才归回德国。1945 年德国战败投降后 ,法国再次把萨尔从法占区中划出来 ,另行单独成立军政府 ,不久又设立由法国人组成的行政机关 ,采取种种措施使萨尔经济上并入法国。法国态度很强硬 ,声明“ 如果不从有利于法国一方着眼解决萨尔问题 ,就不可能有法德谅解 ” 。加以英美两国当时在萨尔问题上也支持法国 ,所以阿登纳考虑暂时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出于这一考虑 ,他没有坚持在法国把萨尔塞进“ 欧洲理事会 ” 的情况下 ,联邦德国决不加入欧洲理事会 ,而是决定将萨尔问题“ 留待以后从欧洲组织范围内 ” 求得解决 ,并于 1949 年 5 月说服内阁成员同意他的主张 ,联邦德国由此顺利地加入了欧洲理事

会。出于这一考虑,他在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协定”签字前,同孟戴斯 原弗朗斯就萨尔问题达成了一项“在西欧联盟范围内的萨尔法规”,使萨尔摆脱法国的直接控制,改为由对西欧联盟理事会负责的“萨尔专员”管理,法国可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开采萨尔地区的煤矿,同萨尔进行对等贸易,保证萨尔居民享有自由权利。这就是人们通称的“萨尔法规”,双方商定,由萨民自由投票表决接受或拒绝这个法规。

这样处理萨尔问题符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也符合既要德法谅解、又要使萨尔最终回归德国、而且有利于促进欧洲的一贯思想。1919 年 1 月 18 日,萨尔举行公民投票表决,阿登纳总理在前一天发表讲话,声明赞成“萨尔法规”,并“建议公民作出相应的选择”。表决结果,百分之六十七点七的萨尔人投反对票,否决了法规。随后,又按 1919 年 1 月协定中的规定再次举行自由选举,在此基础上,萨尔于 19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德国。

可是联邦德国国内有人攻击阿登纳,硬说他在表决前夕的讲话是“出卖萨尔人”。这种说法显然缺乏明智的思考,正是由于阿登纳以总理身份发表了讲话,以高姿态赞同经他达成的法规,法国一方看到联邦德国和政府确实没有施加影响,萨尔公民投票完全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意愿,所以才不再节外生枝设法阻挠,从而使萨尔问题妥善得到解决。平心而论,阿登纳这样做,恰恰证明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高明之处。

六、借风行船摇重新武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军备受到了严格限

制。为了取得军备平等地位 ,德国不惜同其他欧洲大国闹翻 ,最后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同样是战败国 ,同样被剥夺了发展军备的权利。众所周知 ,对德国实行非军事化 ,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二战期间就已确定的处理德国的主要原则之一 ,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第一次对德国人发表的宣言也表达了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不过 员园年 ,西德却堂而皇之地重新武装起来 ,并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重要一员。这一鲜明对比 ,体现了阿登纳外交的特点 ,即善于借助外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员园年 ,国际风云剧变 ,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 ,美国开始把对苏遏制放在它的外交战略的首位 ,东西冷战正式拉开了它的帷幕。不过此时美国的西欧盟国还没有跟上来 ,他们仍对德国怀有余悸 ,还在采取防范德国东山再起的措施。这年 缘月英法两国签订的为期 缘年的敦刻尔克条约 ,就是一个完全针对德国的互助同盟条约。但几个月后 ,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 ,西欧便和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防止德国再起的问题在西欧主要国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员源年 猿月 ,英、法、荷、比、卢五国根据美国的要求 ,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 ,该条约中虽仍有“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之类的用语 ,但其主要矛头已指向了苏联 ,而不是德国。员怨年 源月 源日 ,布鲁塞尔条约又进一步扩大为北大西洋公约 ,西欧国家正式同美国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

联邦德国成立后 ,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便提上了日程。美国的反苏战略是以西欧为前哨基地的 ,而在西欧各国中 ,西德的地位尤其举足轻重。它有巨大的军事潜力 ,一旦重新武装

起来,美国在欧洲就有了可靠的支柱。因此,美国非常希望西欧各国为西德重新武装开放绿灯。对于阿登纳来说,他当然希望他的国家能有发展军备的平等权利,因为这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他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的头脑中记忆犹新,西德的重新武装必然会引起欧洲各国人民,尤其是法国人的强烈反对,如果急于实现这个目标,势必在欧洲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他表示:“我的国家血流得太多了,再也不愿意重新武装了。”直到1950年10月,他还说:“即便所有盟国都要求德国对西欧防务作出贡献,我也反对建立西德国防军。”可是他又立即补充道:“我所能考虑到的全部问题,仅仅是建立一支欧洲人统帅下的欧洲联邦范围内的德国自卫队。当然,这只能是作为一种特例。”后面这句话实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但是由于法国人的强烈反对,阿登纳的这些声明变得毫无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法国意识到,重新武装西德势在必行,只是在具体方式和时间上有待商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为了先发制人,提出了建立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它规定,西德在重新武装后,应将其所有军队分成很小的单位,全部交欧洲军统一调配,这样即使西德重新武装起来,也不会对法国造成任何威胁。

普利文计划提出后,阿登纳认为西德重新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该计划出自仇德情绪最厉害的法国之手,国际社会自然不会怪罪于西德。1950年11月20日,阿登纳发表讲话,一方面对普利文计划表示欢迎,同时提出了西德将来同西方进行军事合作的条件。他要求德国享有同其他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国家“绝对平等的权利”，签署一项条约，保证一旦俄国人入侵，盟国就保卫西德，结束占领法规和盟国的监督管制，并在德国建立它的防御力量期间给予财政支持，最后，盟国不得采取一致行动阻止西德走向完全自主。

阿登纳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条件，是因为他已经摸清了美国的底细。他同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关系密切，几乎每天都保持着接触，后者经常向他说明五角大楼打算在北约联盟的范围内建立一支德国陆军的目标，并暗示美国政府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阿登纳提出这些条件，也是要向他的同胞稍稍展示一下重新武装能够给西德带来的美好前景：早日结束盟国的军事占领，恢复德国主权，使德国人享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是这些设想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同一般老百姓每天不得不忍受的严峻现实相比，这些想法似乎是遥远的、无法实现的事情。每天早晨，当他们走出家门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废墟和由此产生的灰心丧气情绪，这一切把他们对未来所抱的美好理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时间的推移还不能使人们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和它对幸存者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对这场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一切产生了普遍的恶感。民族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连军国主义者也感到幻想破灭。提出重新武装，犹如在一个吊死者家中提到绳子一样，令他们恐惧和讨厌。人们清楚地记得，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原先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终于蔓延到了德国本土，炸弹和炮弹开始落在德国人的家园和工厂、发电厂、自来水管、下水道等设施上。希特勒和他的军队在鹿特丹、华

沙、斯大林格勒、贝尔格莱德和整个欧洲进行的总体战得到恶报,德国的城镇乡村变成了一片瓦砾。战争结束时,人们没有像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那样欢迎这场战争之后幸存下来的圆缘万德军士兵。军人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道高喊“我不参加”的流行口号,普遍反对重新武装德国。

阿登纳讲话后,在国内立即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政治势力的夹击。社会民主党以及拥有近四万之众的工会组织认为,组织欧洲军不过是要德国军队充当“法国用以镇守殖民地的外籍兵团”,主张西德在冷战中奉行类似瑞典人的中立政策。以勒尔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力量则抗议“把德意志民族当做雇佣军的材料”。德国的大企业,其中包括曾经向威廉二世皇帝和希特勒的武装部队提供过武器的鲁尔区的大公司也不希望恢复武器生产,因为鲁尔河同铁幕之间只有很短一段飞行距离;对敌人轰炸机最有吸引力的目标莫过于军火工业了”。此外,逐渐恢复的德国工业虽然生产能力有限,但是正处于生产的高峰,正在为国外供不应求的市场生产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转而生产武器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一部分日益扩大的市场和失去重建与刷新遭到猛烈轰炸的德国工业体系的势头。

直到员缘年源月煤钢共同体条约签订后,阿登纳终于能够拿出证据说服左右两翼同意西德参加西欧集体防务。这年缘月圆日,参加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西德议会很快批准了条约。但是作为条约发起国的法国议会却对该条约的批准一拖再拖,尽管美国

以不承担“保护”西欧的义务、减少对西欧的援助相威胁，~~1948~~1948年11月14日的法国国民议会最终还是否决了条约，反复折腾了三四年之久的“欧洲防务集团”至此告吹。

法国议会的决定使阿登纳极度痛苦不安，他责问法国：“难道德国的威胁比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还重要吗？”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外交家，阿登纳很快恢复了理智，没有过多地指责法国议会，而依然同法国一起，维持着舒曼计划带来的欧洲统一的势头。他在等待时机。

法国态度的反复，对美国无疑是一盆冷水。但是，把西德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大西洋联盟的重要一员，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考虑，是必定要坚持的。在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以后，艾森豪威尔即指示美国国务院“考虑用什么东西代替欧洲防务集团的问题”。国务卿杜勒斯经过数十天紧张的外交活动，由丘吉尔倡议的九国外长会议于~~1948~~1948年12月15日在伦敦召开，这九国是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加上美、加、德、意四国。会议在以下几点达成一致：一是结束对德国的占领；二是邀请西德加入北约，并允许其提供~~15~~10个师的陆军和一支拥有~~1500~~10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同时欧洲最高盟军司令官的权力将扩大到足以制止德国武装力量的独立部署；三是接纳西德、意大利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紧接着在~~1948~~1949年10月14日，阿登纳又同美、英、法三国代表签署了巴黎协定，从而正式结束了盟国对西德的占领。这项协定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伦敦会议和巴黎协定归还了阿登纳渴望已久的主权，向他敞开了北约组织的大门。作为报答，同时也是为了解除西

欧国家对德国仍然存在的戒心,阿登纳很明智地主动宣布,他保证德国充分支持和参加西欧的共同防务,以对付苏联的侵略威胁,并保证德国将绝不生产原子武器和生化武器,如有必要,他还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欧国家结成联邦。

员缘年源月,西德正式成为北约的第员缘个成员国。借重美国这个外力,阿登纳在政治上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第七章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领导艺术

撒切尔夫人(员圆缘~),英国前首相,曾任保守党领袖。婚前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员圆猿年进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攻读化学。员圆源年任该校保守党协会主席。获牛津大学理科学士和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任一家化学公司研究员和律师。员圆缘年起,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议员竞选活动,两度遭到失败。员圆缘年同玛格丽特结婚。员圆缘年加入林肯法学协会。员圆缘年当选保守党下院议员。员圆缘年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员圆缘年任保守党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动力事务发言人以及教育事务发言人。员圆缘年远月至员圆缘年圆月任保守党希思内阁教育和科学大臣。员圆缘年圆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员圆缘年缘月任首相。员圆缘年和员圆缘年连选连任。

一、初出茅庐摇坚强如钢

1929年,年仅28岁的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迈开了走向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的第一步,引起了英国新闻界的关注。报刊、杂志上开始出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照片。只见这位新议员身着雅致的深色衣服,胸前别着饰针,颈上挂着珍珠项链,头戴时髦的扁圆帽,显得神采奕奕,风姿秀逸。

10月10日,议会重新召开,撒切尔夫人充满信心地进入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很快就令人们刮目相看了。从进入议会的第一天起,她就认真而勤奋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熟悉了议会的环境。按照英国议会下院的惯例,议会开会时,普通议员只能在后排就座,他们的意见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初入政坛的撒切尔夫人自然属于“后座”之列,但她在议会发表的首次演说却引起了阵阵轰动。这次演讲安排在一个星期五下午举行,通常这是下院冷清的时候,多数议员都夹着皮包提前回家度周末。可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场面。大批议员怀着极大兴趣前来听讲。撒切尔夫人围绕允许新闻记者人士参加地方议会的问题,不用讲稿一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她那从容不迫的神态,条理清晰的论述把议员们镇住了。他们从未想到这位初出茅庐的女议员的“处女演说”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甚至可以和那些前排议员们相媲美。她的这次成功的讲演,立即引起了当时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注意。

自此以后,撒切尔夫人便成了保守党内日益倚重的人物。

1975年5月,麦克米伦首相改组内阁,撒切尔夫人被任命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这是她在政府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除负责部里的日常工作外,她还协助大臣制定有关政策。她那良好的记忆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她为了说明保守党政府在养老金问题所作的努力,滔滔不绝地背诵了从英国历届养老金开支情况到外国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开支一长串统计数字,令在场的人们目瞪口呆。

1979年麦克米伦政府因经济政策上的失败被迫下台后,她又先后被任命为保守党住房与土地事务、财经事务、燃料和动力事务以及教育问题发言人。多次在下院舌战执政的工党内阁成员,言辞之尖锐激烈,常令工党内阁成员难以招架。

1979年5月,英国再次举行大选,保守党重新执政,爱德华·希思出任首相。撒切尔夫人被任命为教育大臣。她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二位内阁女大臣。她一如既往,以充沛的精力和献身精神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三年半的任期中,撒切尔夫人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磨炼和考验。

撒切尔夫人上任之初,希思政府就决定削减财政预算三亿英镑,其中多达三分之一即一亿英镑须从教育和科育部的经费中削减。为此,在工党政府已取消免费供应中学生牛奶之后,保守党政府决定取消对7岁小学生的牛奶供应,这样每年可节省开支1.4亿英镑。撒切尔夫人认为绝大多数家长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支付牛奶费,因此便实施了这一措施,但她这一举措的实施,立即引起了许多家长的不满,被示威者称之为“牛奶掠夺者”,那些小学生的父母们简直恨透

她了。接着 ,政府又把学生的伙食费从 怨个便士提高到 员圆个便士。三个月内 ,便有近 员圆万孩子停止在学校用膳。各种谩骂纷至沓来。一些报刊也趁机推波助澜 ,称撒切尔夫人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撒切尔夫人因宣布取消过去由地方政府向各大学学生提供的活动基金 ,由各大学自行解决 ,结果又遭到大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在几所大学演讲时 ,不仅受到大学生们的抵制 ,甚至还遭到侮辱和暴力袭击。她自己的两个孩子正是读书的年龄 ,他们在学校遭到嘲笑和奚落。她本人每天回到家 ,总是脸色苍白 ,气色不好。开内阁会议时 ,撒切尔夫人变得易动情感、易发脾气。她家里驻进了一队保安人员 ,因有人扬言要绑架她。见到这种情况 ,连一向支持她的丹尼斯也建议她可能的话退出政坛。

但是撒切尔夫人坚持着 ,咬紧牙关坚持着 ,她相信自己是能顶过去的。她用铁的意志在自己周围建起一层盔甲。顶着举国上下的谩骂 ,忍耐着名誉、人格的屈辱 ,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游行示威。那些个艰难的日日夜夜 ,她终于熬过来了。那真是一段令弱者发颤、令强者心寒的日子 ,她不愧是英伦三岛的铁女人 ,正如别人评论的那样 :“就在这期间 ,铁进入了她的灵魂。”

此时 ,以希思为首的整个保守党政府也陷入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工人罢工此伏彼起。在此情况下 ,员苑年希思政府宣布提前大选。结果保守党在大选中败北。这时候 ,保守党及其领袖希思处境艰难 ,但撒切尔夫人却脱颖而出。

二、挑战强者摇问鼎相位

1979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以后,党内有多数人感到迫切需要一位新的领袖和一套新的政策。尽管爱德华·希思曾在大选中失败,但他雄心未泯,仍抱着“当一名出色首相”的宏愿,准备东山再起。

究竟由谁来担当保守党的领袖呢?人们议论纷纷。最初人们提得最多的是基思·约瑟夫爵士,他在保守党内有相当高的威信。起初,撒切尔夫人也明确表示支持他担任保守党领袖。可是,基思·约瑟夫在一次讲演中出言不慎,提出要给处于贫困阶层的妇女免费提供避孕药物,防止她们盲目生育,以保持英国人种素质的问题。他的这篇演讲产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基思·约瑟夫被谴责为“优等种族论”的鼓吹者,他的名声一落千丈。尽管他一再辩解自己的讲话被人歪曲,但也无济于事。

在此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出来竞选的问题。她仔细分析了英国的局势和保守党的状况,认为除她之外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能带领保守党重振英国,于是,她决定向希思的领导地位挑战。

正当希思认定再也没有人向他挑战时,有一天,一位妇女走进希思的办公室,她彬彬有礼地对希思说:“阁下,我来向您挑战!”这位妇人就是撒切尔夫人。起初,保守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对她的这种行动方式感到十分震惊。按说这种事通常是在暗地里干的,可她竟采取如此的坦率行动。明人不做暗事,由此足见撒切尔夫人的作风。

撒切尔夫人在其 15 年的议会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辩才和风度 , 原已博得保守党后座议员的好感 , 她向希思挑战的勇气和魄力 , 连前座议员也交口称赞。一些平时对希思不满的保守党人 , 一下子就倒向了撒切尔夫人一边 , 一时间玛格丽特的名声大振。

1975 年 10 月 , 保守党选举自己的新领袖。投票在保守党下议院议员中进行。在男子汉的天下——保守党的 100 万党员中 , 撒切尔夫人勇敢无畏 , 以 151 票对希思的 103 票获胜。两小时内 , 当了 15 年保守党领袖的希思被一个女人撵下了台。这是第一轮投票 , 而在第二轮投票的最后一天 , 她已坐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席位上 , 开始策划向唐宁街的最后冲刺了 !

这场争夺党魁的斗争中 , 背景是复杂的 , 胜败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机会 , 也有才能。希思当保守党领袖期间 , 在全国 源次大选中 , 他失败 猿次 , 使工党上台 , 这是人心向背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选 , 就是为了要有人代替他。而在一些有经验、有资历的竞选人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的时候 , 撒切尔夫人却挺身而出。

特别在与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 · 希利唇枪舌剑的论战中 , 她显示了自己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善战斗士 , 驳得丹尼斯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 给了垂头丧气的保守党人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竞选中 , 她傲然声明 : “ 全国普遍感到 , 保守党没有旗帜鲜明地、坚韧不拔地维护这些理想 , 英国正纳入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平庸道路 , 这种趋向不仅必须制止 , 而且

必须扭转。现在是保守党必须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这篇强有力的声明的发表者，不仅是希思的竞选对手，也是工党的对手，她显示了一个领袖的头脑与远见。

撒切尔夫人胜利了，她成为英国有史以来大党中第一个女性领袖——保守党领袖，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党魁。对于视政治为生命的撒切尔夫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保守党一旦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她便是英国当之无愧的首相。王位只是大不列颠的象征，首相却是英国的执政者。而且由于首相同时又是因他所属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而产生的，因而更具有党魁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然而，从反对党总部到唐宁街 10 号，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需要她继续拼搏。刻意问鼎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她立即致力于恢复竞选领袖而遭到严重损失的党内团结，弥合与失败者的裂痕。

尽管在竞选期间，希思的竞选班子曾给青年保守党免费发送短袖圆领衫，上面印着“我支持杂货商，但不支持他的女儿”的字样，把撒切尔夫人的家庭身世翻出来，作为攻击目标。这种做法，当时使撒切尔夫人十分气恼，但她获胜后却从大局出发，以一种捐弃前嫌、不念旧恶的气量，邀请希思参加她的内阁。她还在 1979 年的保守党年会上，赞扬希思过去的成绩，在此情况下，希思也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内外政策声明。至此，撒切尔夫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确定。在安顿好党内以后，这位女党魁便开始向她的最终目标——唐宁街 10 号进发。

1979 年 1 月，撒切尔夫人在肯辛顿市政厅发表了题为

《英国觉醒了》的演说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她首次就英国外交政策所做的公开演讲。她针对工党威尔逊政府同苏联“缓和”的政策 ,尖锐地提出 ,苏联人集中力量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 ,他们先要大炮 ,其次才是黄油 ;她提醒英国要吸取教训 ,不然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联对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作出强烈的反应。苏联驻英国使馆向英方提出抗议 ,各种宣传都极力丑化她 ,撒切尔夫人在动画片中被画成一个邪恶的女巫。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还给她起了一个冷冰冰的绰号——“铁女人”。自此以后 ,这个“铁女人”的雅号不胫而走 ,名扬四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都把目光盯在这位“铁女人”身上。苏联这一着显然失败了。撒切尔夫人对此感到很自豪 !她非常乐意别人叫她“铁女人” ,并骄傲地说 :“英国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位铁女人。”

1974年新年伊始 ,英国货车司机、火车司机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职工 ,反对工党政府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 ,相继举行了全国大罢工。撒切尔夫人瞅准这个时机 ,提出了对工党政府的不信任案 ,这个议案在下议院以一票之差通过 ,卡拉汉政府被迫下台 ,宣布提前大选。

大选定于 3月 10日举行。竞选开始 ,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力量进行宣传。保守党极力宣传这是一次关系到英国前途的选择。为此 ,撒切尔夫人几乎每天天不亮就离家外出 ,带着她的竞选班子成员从一个地方匆匆赶到另一个地方 ,发表演说 ,举行集会 ,会见记者 ,接待选民 ,往往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钟。为了消除人们头脑中固有的“铁女人”不近人情的形象 ,撒切尔夫人不时地挂着购物篮子上街买菜 ,并随时同碰到的

人亲切交谈。随行的摄影师立刻抢拍下这些镜头加以宣传，从而使她具有了一个温柔而又平易近人的家庭主妇形象。

1952年 缘月 猿日，大选结果正式揭晓，保守党击败了工党，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三、处事果断摇铁腕手段

上任之初，撒切尔夫人对着千百个伸向自己的话筒镇静地说道：“凡是出现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亲善而努力；凡是发生过错误的地方，我们都要予以纠正；凡是产生过怀疑的地方，我们都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凡是有悲观失望的地方，我们要赋予希望。”停顿了一下，她接着说：“不论大家在大选中投了谁的票，我都要向你们——全体英国人民呼吁：现在大选已过，希望我们携手并进，齐心协力，为我们自豪的国家的强大而奋斗……”。说完，她向欢呼的人群挥了挥手，转身消失在唐宁街 10 号庄严的大门里，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能干的撒切尔夫人当选了英国首相，联合王国并不安宁。北爱尔兰的独立危机，激进分子的恐怖活动，以及在监狱里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们的绝食活动接踵而来。英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罢工和城市骚乱，在野党对她领导的政府进行无休止的攻击和弹劾。

在国际上，她的大英帝国也已经不是过去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每况愈下。不能再无愧地称为第一流世界强国了。

内外交困的处境并没有使撒切尔夫人的脑袋炸裂，她毕竟是“铁女人”。她用自己“铁”的意志，冷酷无情的“铁”手

腕 ,镇压了一次次骚动 ,度过了一个个危机。

更大的危机爆发了。1982年 3月 ,阿根廷的加尔铁里总统突然宣布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 ,并很快出兵 ,迫使岛上的英国驻军投降。

这一事件无疑对撒切尔夫人乃至她的内阁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铁女人”不会忘记 1982年的那一件事 ,——由于美国总统卡特在伊朗人质危机中表现的过分软弱引起了人民对他的失望 ,继而被里根在大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

世界上有多少人的眼睛注视着她 ;“铁女人”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

走向战争 !在英国 4月5日的电视台的演说中 ,撒切尔夫人饱含热泪向全体国民呼吁 :“支持我吧 ,支持我也就是支持英国。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团结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维护英国的利益。”她以斩钉截铁的声音 ,在议会大厅中宣布 :“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对阿根廷宣战 !”

几天以后 ,她组织的强大特遣舰队出发了。虽然战争凶吉难卜 ,但她下了“铁”的决心 ,还是命令舰队远涉重洋 ,出征万里之外的马岛。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动使加尔铁里惊呆了 ,他不可理解 ,可能他忘记了她的绰号——“铁女人”了吧 ?!

阿根廷竭尽全力 ,作了顽强的抵抗 ,但最终还是屈服了。1982年 6月 19日在投降书上签字。关于马岛之战的是非功过 ,自有世人评说 ,我们姑且不评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但就撒切尔夫人而言 ,这位“铁女人”又胜利

了,她在本国人民中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使她的联合王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从而更巩固了她在英国的铁的统治。

撒切尔夫人是西欧对苏联持强硬态度的代表人物。她曾多次指出:苏联“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不能相信俄国人“分文不值的好话”。出任首相之后,她便把美国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主张同美国保持“最密切的合作”。这位女首相还宣称:“作为政治家,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欧洲人了解俄国人不断扩军的事实,使他们警觉起来。”她甚至发誓般地说:“今后我还要继续讲这方面的事实,要老讲,老讲!”

苏联对此颇为恼怒,指责她“拼命复活冷战”,是“可怕的冷战巫婆”。《真理报》评论员还挖苦地说,这位铁女人在冷战的道路上“走得真是太远了”,以至于连苏联近年提出“冷战”的丘吉尔“要是有一天知道有这么一位女人当首相,他也会感到不高兴”。

撒切尔夫人对苏联报刊“铁女人”长、“铁女人”短的攻击并不介意。1985年她在新德里接见记者说:“我认为这是苏联对我的恭维。”当记者问她:“你对‘铁女人’这个形容词是喜欢还是恼火?”她说:“两者都不是,我只是接受了这个形容词而已。”她自己还解释说:“这个‘铁女人’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而是一个有坚强观念的政治家。”

为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她主张借助美国的核保护伞,坚决支持美国的军备政策。然而,在盟国的内部,当美国的高赤字和高利率政策损害英国的经济利益时,她又毫不含糊地谴责里根的经济政策“损人利己”;当里根无视英国的劝告,

悍然出兵侵占英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时 ,她率先公开反对。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员国内部 ,为了夺回海湾地区被法国人所抢走的军火市场 ,女首相竟然在 员元年一年之内两度出访海湾国家 ,向英国的伙伴国家法国“ 发动了全面的贸易战 ”。马岛战争结束不久 ,路透社记者再次问及女首相对“ 铁女人 ”这个称呼的看法时 ,撒切尔夫人回答说 :“ 对于你所信仰的东西 ,你就应当十分坚决的维护。”

四、实施改革摇号脉治“ 病 ”

撒切尔夫人进入唐宁街的首相府邸之后 ,摆在她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内阁和处理政务两大问题 ,为了弥补自己初涉政坛的经验不足和缓和保守党内部矛盾 ,加强保守党内部的团结 ,撒切尔夫人在其内阁成员中除了自己的亲信和干将外 ,还吸收了前首相希思的一些重臣。可当有人建议邀请希思入阁时 ,她坚持予以反对。她深知“ 一山容不得二虎 ” ,作为首相 ,她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 ,正值英国经济处于长期衰弱的年月 ,通货膨胀 ,工业生产停滞不前 ,国际舆论纷纷把这种现象称为所谓的“ 英国病 ”。她上任不久 ,又遇到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这便更加剧了英国的危机。于是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决心实行改革 ,以挽救英国的生命。

撒切尔夫人拿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开刀。

战后初期 ,英国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工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 ,将英格兰银行和煤矿、民航、钢铁等 愿个基本部门国有化 ,同时还推行了一整套社会改革方案 ,建立了社

会保险和福利补助制度。随着《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和《住房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通过和实施,普通英国人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破产以及 16 岁以下青少年的义务教育,都有了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有人形容这种社会保险和福利补助制度使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所保障。1945 年 7 月,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式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在这一时期,英国人民的确享受到福利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此间,工党政府实现了充分就业,妇女有机会参加工作,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所增加,普通劳动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1945 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英国的经济就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其经济实力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二位。1946 年,英国的生产总值仍然保持仅次于美国的水平。

但是,国有化和几经发展、范围越来越广的福利体系在以后的年代里逐渐表现出它们的弊病。在工党政府和以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所广泛采用的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主张以赤字财政和国家干预保证充分就业,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繁荣并以此避免经济危机。在这种政策实践下,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加之国有化企业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福利制度和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培养了某种“依赖心理”,使国家无力负担不断增长的财政需要,但又不能降低业已提高了的生活水平,显得颇有些力不从心,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从 20 年代开始,英国经济便走入一种怪圈,几十年都无法摆脱,人称“英国病”。“英国病”使英国经济的

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英国是“落在后面的跛脚女人”,还有人说英国“正在从第二世界掉入第三世界”。

撒切尔夫人正是在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在英国所带来的全部问题暴露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她的“革命”就首先拿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开刀。

从 愿园年代初开始,撒切尔夫人在“货币主义”经济政策指导下开始了大踏步的私有化进程。私有化的具体做法是将一些国有化企业的财产卖给个人,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使公有企业承租给私人经营管理。在撒切尔政府 员怨怨年上台时,英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员豫左右,其职工人数占英国总劳力的 愿豫,其固定资本约占全国固定资本总额的 圆豫。而到 愿园年代末期,英国国有企业中的 员豫已转为私有企业,近 远多万职工从国有企业转入私人企业。保守党政府私有化的纲领之一即所谓“大众资本主义”,曾经有人将它称为“撒切尔夫人的革命”的“核心”。“大众资本主义”旨在使更多的人拥有股票,主要方法是向社会出售国有资产和普及房产拥有权。撒切尔夫人曾说:“工党让工人反对业主,而保守党则让工人成为业主,方法就是购买股票”。“资本已不再是少数人专有的权利,而已成为大多数人可以展望到的真实前景”。员怨怨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初始时英国股票持有者为 猿园多万,而到 愿园年代末期已多达近千万。大公司私有化和出卖股票既稳定了财政状况,使许多人成为股票持有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保守党的社会基础。

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撒切尔政府于 员怨怨年 远月正式

公布了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绿皮书 ,并根据其精神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保持国家基本养老金制度不变 ,改革工党政府所制定的国家收入养老金制度 ,强行推行职业养老金制度 ,向职工提供获取个人养老金的机会。这使国家对养老金领取者的负担有所缓解。此外 ,保守党政府还在国民保险和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撒切尔夫人的“ 革命 ”在 愿园年代前 远愿苑年的确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效果。在 愿愿年 ,国有企业英国钢铁公司曾以赔钱最多(年亏损 源园亿美元)而被载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而在它成为私营企业以后 ,在 愿愿年 ,其利润和生产效率均名列世界前茅。从 愿愿年开始 ,英国经济持续增长了 苑年 ,成为 愿愿年以后为时最长的“ 繁荣时期 ”。愿愿年 ,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猿愿豫 ,超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平均实际增长率(猿豫)。通货膨胀也已从她上台前的 圆豫下降到 源豫。这是几十年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国际上有人评论说 ,撒切尔夫人使英国这个“ 昔日落在后面的跛脚女人 ”变成了“ 西欧经济的火车头 ”。于是 ,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更加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英国 ,人们乐于对所谓“ 撒切尔现象 ”、“ 撒切尔主义 ”、“ 撒切尔革命 ”等进行研究和探讨。到 愿愿年 ,虽然关于撒切尔夫人的专著已出版了十多部 ,但仍然在以每 猿个月一部的速度不断增加。

五、扼制工会摇一箭双雕

早在 愿愿年 ,撒切尔夫人刚刚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时候 ,保守党高层智囊团就告诫她说 :“ 工会是最致命的敌人 ”。的

确,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英国工会历来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工会的罢工行动曾经迫使政府垮台。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拟定其社会经济政策的时候,都把其对工会的政策置于全盘考虑之首。撒切尔夫人十分明白,以工会为代表的英国工人是英国社会中收入层次相对较低的群体。他们是受益于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政策的。因此,要改变英国的现状,即拿已在英国实行了数十年的福利制度开刀,所站出来反对的首先将是工会。当时工会会员数目庞大,总数多达 1600 万,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可能给保守党的统治带来危机。在撒切尔夫人的参与下,保守党人士就工会政策制订了一系列原则。一些保守党右翼领导人认为,在英国,劳工市场像其他市场(如石油市场)一样,也是由“垄断集团”控制的,而这一控制劳工市场的“垄断集团”就是工会。工会“歪曲”了劳动力价格,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所以,“改革劳工市场”即改革工会是“进行其他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因此,在 1979 年的大选中,保守党把削弱工会权力作为其基本政纲之一。

大选获胜后,撒切尔政府开始频繁的立法活动。短短几年内,陆续公布了 1976 年《工会改革方案》,并于 1976 年、1978 年和 1980 年先后颁布了两个《就业法》和一个《工会法》。这些法律和议案严重地削弱了工会原有的权利。例如,法律要求工会采取“不记名邮寄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应该举行罢工,邮费由政府补贴;工会会员可以阻止工会不经投票就举行罢工;工会必须在得到大多数工会会员的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工,等等。

1984年12月,由于保守党政府要关闭经济效益较低的矿井,致使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虽然坚持了整整一年,最后煤矿工人工会竟同意无条件复工。煤矿工人工会是英国最大、最老的工会之一,素有“超议会力量”之称。罢工失败后,该工会主席、罢工领袖斯卡吉尔被迫亲自出庭,向高级法院大法官表示“道歉”。其实,这个结局似乎是注定的——罢工工人或许没有料到,他们所面对的千千万万军警宪特的身后实际上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女人。这些矿井是否应该关闭,在英国历来是有争论的,这里暂且不去评论它。但从撒切尔夫人对罢工问题的处理上,可以看到她的某些风格。

为在这场较量中取胜,早在1980年代末期,在撒切尔夫人的安排下英国就开始进行准备,例如大量储存煤炭、进口燃油,并计划抽调军队顶替可能参加罢工的电力工人。至政府决定关闭矿井前夕,英国电力部门已储煤1000多万吨,加上矿井储煤1000多万吨,以及其他方面的储存,全国储煤总量多达2000万吨,相当于英国煤炭年产量的1/3。罢工开始以后,撒切尔夫人又下令从波兰、荷兰以及美国继续进口大量原煤。有了这种准备,撒切尔夫人在声势浩大的罢工面前拒不让步,并把罢工工人称为“国内的敌人”。她还在派遣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实行野蛮镇压的同时,对少量继续上班的非工会会员工人和决定复工的工会会员付以高薪,让手持警棍的警察护送他们上工。1980年代初以来保守党政府陆续颁布的工会法,严重地扼制了其他工会对煤矿工人罢工的支援。于是在多重压力之下,煤矿工人终于惨败。这一失败给英国工会运动带来的是一段为时不短的沉寂时期。

其实 撒切尔夫人打击工会势力还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她的工会政策还有更深层的用意 这就是借打击工会去打击工党。英国工党成立于 1900 年 是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 也是英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工党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很大的加强 曾多次击败保守党单独执政 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保守党抗衡的政治势力。工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 其活动经费也主要依靠工会政治基金的赞助。撒切尔夫人赞赏这种看法 即应该把工会当成保守党打击工党的“靶子” 瓦解工会使工党失去其社会基础而变成一股“被阉割了的政治势力”。

1980 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规定：“凡设立政治基金的工会组织 必须在 1982 年 7 月底之前进行一次全体会员的秘密投票 以决定本工会是否应该继续设立政治基金”。政治基金是英国工会合法的特别基金 用于政治赞助。在传统上大多数工会都把这些钱捐给工党用于竞选 以期在工党执政后能够通过有利于工会的法律。《工会法》的上述规定是撒切尔夫人政治上的一着“妙棋” 其矛头直指工党与工会的传统关系 是对工党地位和命运的严重挑战。撒切尔夫人还巧妙地利用社会上对工会权力过分膨胀的反感 挑拨它与工党的关系。在保守党的猛烈攻势下 工党地位不断下降 工党与工会频频失和。继 1979 年大选失败以后 工党又在 1983 年和 1985 年先后两次在大选中失败 至今尚未彻底恢复元气 在野时间已长达 16 年。

撒切尔夫人扼制工会、进而打击工党的一箭双雕的策略 的确从各个方面巩固了她的政治地位。这一策略赢得资本家

们的欢迎 ,就连自称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最大的资本家组织)主席也公开表示 ,他们“衷心地希望撒切尔夫人能够连任首相”。

六、英美联姻摇外交旋风

撒切尔夫人的风格同样反映她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之中。近年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对她的对外政策做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 ,“撒切尔外交”是颇有特色的。

在对外关系方面 ,撒切尔夫人的外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保持了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和基本方针 ,但由于她个人的风格、特点 ,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也带有明显的“撒切尔主义”的印记。撒切尔外交以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力图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她是在英国的国际地位日见低落的关键时刻登上首相宝座的 ,为使英国重振声威 ,她进行了巨大努力。她在国际政治中的全部作为 ,似乎都离不开摆脱这种困境的基本动机。

“英美特殊关系”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英美两国有着基本一致的利害关系 ,以及撒切尔首相与里根总统密切的私人交情。在 1980 年代中期 ,撒切尔夫人俨然成为美国在西欧的代言人 ,这极大地满足了英国的虚荣心。在英美两国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外交行动中 ,双方都为对方提供了力所能及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帮助。例如 ,在 1982 年英阿马岛之战中 ,美国在外交上全力支持英国 ,并为航行数千英里开赴南大西洋作战的英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提供所需的各种后勤保障 ,为英国最

终取得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 1981 年,当里根总统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下令美军战斗轰炸机轰炸利比亚时,在西欧国家的忧虑和迟疑中唯一明确表示支持立场的就是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她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允许美国飞机在英国军事基地起飞袭击利比亚。

然而“英美特殊关系”并不能完全概括英美关系的全貌。撒切尔夫人并非彻底“一边倒”,在涉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时,她不惜对美国表示一点不满、甚至会触动一下美国政府。1984 年,里根希望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公司不向苏联西伯利亚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提供资金和技术,以与美国因苏压制波兰而制裁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如果这样做,必然会使英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于是撒切尔夫人下令英国公司不去理会美国的禁令,继续履行已与苏联签订了的合同,最后里根不得不让步。她甚至还曾对美军入侵加勒比海小国格林纳达公开表示不满,因为格林纳达是英联邦成员国。

撒切尔夫人“铁女人”的绰号来自其国际政治中的某些强硬立场,而这些强硬立场在 1980 年代前几年则更多地是针对苏联对外政策的。1980 年代末,苏联在实行“缓和”的欧洲政策的同时,竭尽全力在中东、西亚和印度支那等地进行扩张。1989 年竟然赤裸裸地奉行侵略政策,悍然大举进攻一个主权国家阿富汗。撒切尔夫人把苏联的进攻态势看成是对英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便在国际上联美反苏,大大地出了一番风头。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英国逐渐改变了其对苏联的强硬立场。

1990 年撒切尔夫人再次出任英国首相以后,便着手对英

国的苏东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其内容包括在坚持威慑、加强防务的同时 ,主张东西方进行更多的对话 ,把改善东西方关系当作英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81年 4月 ,撒切尔夫人出访匈牙利 ,被舆论界评论为“迈出了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重要的一步”。后来她又两次因参加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访问了苏联。1982年 7月 ,她实现了对苏联的正式访问。1983年和 1984年 ,撒切尔夫人又两度访苏 ,她对新闻记者说：“我们坚决支持(苏联的)改革。这是一种大胆而又积极的主张”。“苏联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扩大政治自由 ,为苏联人民的真正繁荣和改善东西方关系开辟了前景。总之我们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于是便有人开玩笑地说 ,这下“铁女人”变成了“甜女人”。

但是 ,如同撒切尔夫人不会“一边倒”向美国的道理一样 ,她也绝不会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她的对苏政策的实质是要苏联的改革逐步纳入西方的轨道 ,以西方的价值观取代苏联传统的价值观。因此 ,撒切尔夫人一方面赞扬苏联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 ,另一方面又极力催促苏联加大改革步伐 ,不断要求苏联在人权问题上“有更大的作为”。

此外 ,在对待欧洲联合问题、帝国遗产问题以及德国统一等问题的态度上 ,撒切尔夫人也是如此。她的态度强硬也罢 ,缓和也罢 ,僵直也罢 ,灵活也罢 ;坚持也罢 ,让步也罢——都离不开英国自身利益这个轴心 ,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绝不会有一丝松懈的。